

台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106 學年度高一多元選修

大亞之國讀本

多層次的亞洲・台灣

王竣霆老師

2017/7/1 Saturday

本教材不做商業流通。內容除教師自編之外，資料來源皆已在標題處說明，取用日期皆與讀本同。如有侵犯版權之虞，懇請原作者或電子媒體以 E-mail 告知。我將立即給予修正、改進。

目錄

一、一名高中生的觀點：翻轉教室，還是「翻桌教室」？	1
翻轉教室的歷史	1
自主學習與翻轉教學沒有絕對關聯	3
被誤解的翻轉教室	4
翻轉教育宗旨需要被修正	5
學生應該要學什麼？	6
人要避免被人造的東西勒索	7
作者聲明	8
後記	8
二、中文研究所的外籍生：台灣教育方式真的很「傳統」，但四年後我卻深受啟發	10
三、【台灣現場 造假篇】濫捕、洗魚、造假——觀察員眼中的真相	16
逐利：遠洋漁業的赤裸驅力	16
臥底：汪洋中最孤獨的存在	17
潛規則：視而不見的洗魚與濫捕	19
破口：無力的事後監管	21
困局：保護漁權還是守望海洋？	23
台灣準備好了嗎？	24
四、【走入印尼 懸案篇】未解的謎團：一名印尼漁工之死	26
他到底怎麼死的？	26
3 支證明被虐待的影片	27
草率簽結的人命	28
不過死了一名漁工	30
沒人對他的死亡負責	30
讓他們賭命的聘僱制度	31

家屬只要一個公平	32
五、汪浩觀點：1996 年臺海危機是怎麼結束的？	34
六、中文學校（上）：ABC 成長的煩惱	38
同學們分幫結派	38
我的夢魘	39
七、中文學校（下）：ABC 的自我鬥爭	42
陌生的中國	43
複雜的命運	46
八、國家與華僑：讀《一線之遙——亞洲黑戶越界拚搏紀實》	48
九、本省人篇：從《宮前町九十番地》見證東亞的台灣	51
十、外省人篇：從《巨流河》看中華民國的台灣	70
十一、光棍村：中國農村「剩男」的哀歌	90
計畫生育下男女比例的失衡	90
流動性下生成的光棍	90
變相的禮俗	91
農村父母的負擔	92
婚姻詐騙橫行	92
農村光棍：經濟、社會和全球化發展下的受害者	92
十二、端專訪：如何打敗 ISIS	94
中斷《末日之戰》的演繹	94
巴黎恐襲違背教義	95
拒絕吸收難民對 ISIS 有利？	95
ISIS 的自然死亡？	96
獵殺伊斯蘭國頭領並無幫助	96

大亞之國讀本

延伸閱讀	97
十三、【中國 評論】浙江小城見聞錄	98
十四、書評：君子之道與台灣人	100

一、 一名高中生的觀點：翻轉教室，還是「翻桌教室」？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0365>

作者：葉田甜（台南女中人文社會科學班）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是近幾年大家熱衷討論的教育相關主題。在一般大眾的認知中，翻轉教育法，就是能讓學生自動自發的接觸課程知識，進而破除填鴨式教學缺陷，最後拿到學習的主動權。舉例來說，只要上網搜尋關鍵字「翻轉教室」，出現的幾乎都是來自各界資深人士的好評，翻轉教育法似乎讓台灣的教育制度有了變革的可能性。然而，今年就讀高一、身為翻轉教育潮流中一員的我，認為社會仍須再釐清翻轉教室目前的宗旨，並共同省思可能存在的盲點，正視問題的根源。

翻轉教室的歷史

翻轉教室的概念於 2007 年由美國 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 的兩位老師提出，目的是為了解決學生的缺課問題。他們將教學影片上傳網路，讓學生在家能先完成單向的基本知識學習，在課堂時間即可與老師互動討論，如此可以更有效率的運用時間吸收繁雜大量的知識。後來，越來越多教學影片被分享在網路平台上，知識被整理成可以迅速打包外帶的物品。十分有名的 Khan Academy 即是一個囊括各科教學影片的線上學院，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在台灣，翻轉教室的實際推動者如台灣大學電機系葉丙成教授、或中山女高張輝誠老師都長期致力於翻轉教育，透過各種演講、或是課程事件宣揚翻轉教室的理想，希望改變這個世界。

葉丙成教授在「超越教育！線上學習新革命 at TEDxTaipei 2013」中提出他對翻轉教室的看法：「文明累進的時候，我們人類也就累積越多的知識.....學習的東西變多了，可是時間卻一樣，那我們的教育就開始變的追求效率。」

「回想我們以前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都很愛玩遊戲.....我們都很愛慕虛榮，我們都喜歡同伴說你好強、你好棒，對不對？所以愛玩、愛慕虛榮、愛比較是我們的天性。這三個願望有沒有辦法一次滿足呢？有的！」

「我覺得讓學生自己設計問題，會比你塞給他個題目做學得好。.....全班同學看著你領先那麼多，那個虛榮感喔，就出來了。」

「我們以前小朋友拖拖拉拉，教他寫作業他都要等到 deadline 前一天才做，現在需不需要？不需要！他看到別人都已經做十幾題、二十幾題，我才做個五六題，他就開始緊張。所以同儕的壓力，才是逼迫學生跟小孩子最好的方式。.....。但是我真的很感動，我們真的有機會做到讓學生、孩子沉

迷於學習。」

翻轉教育法的問題

從葉丙成教授的論述，以及多方查詢佐證的資料來看，筆者認為翻轉教室想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現有體制中最有效的運用所有資源？如何讓學生有效率的主動學習？」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所有人深思熟慮的問題，不過筆者想針對整段翻轉教室的歷史與由來提出幾個問題：

- 一、翻轉教室的教學影片最初是為缺課的學生而存在。在這種情況中，翻轉教室是為了替逃課小孩擦屁股、讓老師不那麼傷腦筋而成立的。所以問題應該聚焦於「學生為什麼缺課」，而非「如何防止學生缺課」，翻轉教室存在固然有其價值，但是原本的起因仍值得討論。
- 二、翻轉教室的線上教材需要學生先看過，再於課堂中和老師討論，整體來看，學習花費的總時間並沒有減少，只有課堂上的效率提高了而已，對學生整體生活而言其實僅僅是將學習時間從學校延伸到下課後。現代學生有大把大把的資料需要吸收，下課時間拿來趕課或考試也是會發生的事，翻轉教育法其實並沒有解決教育在效率方面的問題，只是把時間分母變大了而已。
- 三、如今，「翻轉」概念的影響力仍不斷擴大中。「讓學生先看影片」成為其中一種方法，但許多教學法也都開始吸納翻轉的精神，以老師認為最適合自己班上學生的方式，造就「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堂風貌。問題在於，如此改變可能只成為學期中的某一次嘗鮮，而不是真的為落實翻轉。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國高中時期經歷過很多名義上為翻轉教學的課程，但是老師的安排方式是要班上分成小組分配不同的單元上台報告，同樣以學習者為中心，但是學生在課堂上仍然是單向吸收，從來沒有和老師討論過。很明顯的，翻轉教學在教師之間的傳遞方式有嚴重的錯誤。
- 四、葉丙成教授認為虛榮心是翻轉教育法中引起學習動機的一大因素，但是，由虛榮心控制的學習方式能夠維持多久呢？筆者認為，學生之所以學習，是因為在被啟蒙之後發現自己的無知，進而想要了解這個世界。透過學習了解並同理過去即可掌握未來，防止歷史悲劇一再重演、正視所有恐懼與問題的根源，學習以理性溫柔的角度看待議題且勇敢發聲。上述理想或許被認為過於天真，但是是筆者真正的理想。

（編按：附上葉丙成教授的回覆。經葉教授與作者說明後，作者補上聲明與後記，詳見文末。

2017/6/11 10:31）

葉丙成：我在 2013 TEDxTaipei 的演講，談的是遊戲科技與教育的結合，那個演講未曾有一字一句談到「翻轉教學」或「翻轉教室」。有人把那場演講當成我對翻轉教室的看法，實是很大誤解。我在數百場專講翻轉教室的演講提到，翻轉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調學習，不用每個人被強迫在教室用同樣的步調學習。另外在教室直接作題、練習、討論，老師可以第一時間看到學生學習的問題出在哪，幫助學生，這可以解決在家裡做作業有問題卻沒有人可以解答的狀況。這才是翻轉教學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我在專講翻轉教學的演講中，有提到同儕之間的肯定，對學生自己設計作業題目的動機有幫助。但我從未講過「虛榮心」是翻轉教學的主要學習動機來源。讓每個人能按自己的步調學習，才是翻轉教學的真正核心。看到有人對此有所誤解，我自己要再多檢討是否曾有演講傳達不夠清楚，造成有所誤會。但也請諒解，我確未在任何專講翻轉教學的演講中說過「虛榮心是翻轉教學的主要學習動機來源」，也請大家不要對翻轉教學有這樣的誤解，謝謝。

五、翻轉教室利用人總是害怕比別人差的人性促進學生的答題意願，藉此促進學習效率。在這種方式下，學生仍然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但因學習動機跟實際行動圓滑接軌，所以看起來好像很自主一樣。

回顧翻轉教育的目標：「如何在現有體制中最有效的運用所有資源？如何讓學生有效率的主動學習？」在現有即被提倡的翻轉教室中，問題在於「根本」並沒有被試圖解決，甚至也缺乏討論。然而學生老師們皆順其自然的將翻轉教學法視為救命稻草，所以這種體制下的遊戲本身可能導致的問題，也較不容易被看到。身為高中生的筆者，想以自己切身經驗為例，來看所謂的「自主學習」與「翻轉教學法」。

自主學習與翻轉教學沒有絕對關聯

筆者目前就讀台南女中一年級，甫參加台師大舉辦的第二屆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比賽，和

夥伴們一起拿下了團體賽第二名，也獲得個人賽第一名，筆者在為期半年的讀書計畫施行期間，有一些關於翻轉教學的想法。

參加此次經典閱讀會考是由目前就讀高一的筆者主動發起，找到另外四個隊友，籌組計畫並發函邀請「哲學哲學雞蛋糕的腦閭」朱家安與政大中文系博士生李雨鍾兩位老師，為我們從不同方面講述哲學。再邀請校內老師當帶隊老師，協助我們處理事務、申請三萬元的經費。在閱讀期間，我與夥伴們嘗試將問題從文章中提煉出來，分項目詢問該科專業的老師，很感謝帶隊老師不辭辛勞幫我們處理行政事務。

筆者與夥伴們在閱讀過傅柯《何謂啟蒙》、康德《何謂啟蒙》、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啟蒙的辯證》、吳爾芙《自己的房間》、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之後，決定將書本的論述與二二八事件連結，做為團體賽的報告主題。在參考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後，決定以戲劇的方式呈現，以說書人、知識份子、遺孀、高中生等四種角度來詮釋二二八事件。

在這次的經驗中，活動完全由學生自主發起，老師可以退居次位協助檢視成果，從原來單向給予知識的角色，轉為等待學生自行挖掘的智慧寶藏山。筆者認為，由學生主動提出課外問題，反而能從老師身上得到更多相關的陳述與經驗。

或許我們的經驗看起來就是一場學生自主的翻轉教育，也達成了翻轉教育法想要的目的，在體制內有效運用有限資源。但事實上教育者所提出的翻轉教育法並非如此，差異如下：

- 一、翻轉教育法是要老師將教學當成一門藝術、吸引學生，而非學生在覺醒之後主動提出訴求。
- 二、筆者參加經典閱讀會考，主要目的是想藉由經費購得書目，得到一個和大家一起看書討論的機會。我們真正用心的思考書本內容，也將其與現實生活連結，不斷思索。而翻轉教育法只是改變課堂內學習的方式而已，無助於學生思考學習課程內容的必要性。
- 三、筆者與夥伴們真實的同理到書中所言之物，促使我們看書的動力不是為了得獎，而是搞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從書中作者之言看出時代端倪，試圖同理過去進而臆測未來。然而翻轉教育法是藉由壓迫感與虛榮心督促學生上進，風險就在於效果與反省能力不一定會成正比。

被誤解的翻轉教室

身為一名學生行動者，筆者認為我們得到的結果即是翻轉教育想要的結果，但我們並非以滿足虛榮心、追求效率為前提目的。另外，翻轉教學在課堂中的討論這部分並無明確定義，由於現今翻轉教育種類多元，方式不盡相同，以筆者目前總共四年的國高中生活經歷，認為翻轉教學課程問題大致

如下：

- 一、老師參與討論過程，但是討論型式其實已先被老師預設，學生在無意中跟著風向走，或許真的完成一次思辨之旅，然而卻非真正知道如何自行完成恰當的思想實驗。
- 二、老師讓學生成為授課者，但是課程內容仍為學生對學生的單向傳授知識，教授的內容也不會被討論，只不過將老師的角色換成當日負責上台的組別而已，實質上沒有什麼意義。
- 三、老師讓學生討論腦力激盪的問題，如此容易時間不足。筆者校園生活的下課時間常常被老師拿來補課或考試，輔導課時間當然也有進度進行，大部分老師將翻轉教學視為一個嚐鮮的項目，所以就算討論沒有結果也只能草率結束。
- 四、學生自訂題目，如此討論的範圍模糊，容易失焦，常常發生問題本身就有問題的狀況。

很明顯的，翻轉教育法的原意在因地制宜、開枝散葉的同時產生了誤會，如此導致了更多的問題。另外，教學者其實只是想了另一種方法讓大家記住內容，思考只是附加的。翻轉教學需要長期經營，但是，有哪個學校敢花整整三年，讓學生真正實踐翻轉教學然後背負眾望去應考？（其實三年還嫌少呢）

除了上述的教學現場誤解問題，我覺得有部分的衝突起於想要完善保護小孩的家長與學校。家長可能認為學生在校就必須專心讀課內書，好好考大學再找份穩定的工作，不要吃飽沒事去檢討體制。校方也常以家長施壓為由限制部分敏感的議題討論，保守作為的同時卻侵害到了學生的言論與集會自由。這些可能被壓制的活動實為學生思路最活躍的場合，為了說服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或吸收來自校外前輩的經驗，學生會有強大的自主動力。

然而事實則是，學校會打壓一些較為「不當」的言論，控制學生倡議，而要求以一種理性中立客觀的角度解讀每一件事，造成學生無法共感，最後導致學生為了考試，只願意反覆背誦那些複製在課本裡的知識、或是不想觸碰爭議性話題。然而那些話題之所以充滿爭議性，不就是因為他們是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嗎？從學校對學生的保護措施來看，過度保護也可能成為一種變相的阻撓，而讓學生逐漸失去自我尋找資源的動力。

翻轉教育法做為一種創新的教學過程，必須注意在制度下玩求生遊戲的問題。筆者的經驗結果符合翻轉教學的需要，然而我們並非刻意為之。所以筆者認為，活在體制下的學生必須思考如何用體制翻轉體制，除了上課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學習的內容。

翻轉教育宗旨需要被修正

從以上現象及歷史，我們發現「如何在現有體制中有效運用資源」無疑是所有體制內人員必須深思的

問題，但是筆者認為，翻轉教學的宗旨有部分需要改變，或是重新定義。盲點在於：

- 一、翻轉教學在台灣的國高中校園環境實施，被使用者誤解機率高，造成高中生不諒解、老師學生無法溝通。另外，如果學生討論的問題超過老師掌握範圍，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會導致沒有結果的無意義爭執。
- 二、學習對於學生而言，動力來自虛榮心而非對世界的喜愛、或是對歷史的同理，這種結果，真的是大家期望的嗎？
- 三、這樣的教學，使大家為了要得到虛榮感，改變了餵食飼料的方式，讓學生成為「為了新奇飼料去按按鈕的白老鼠」。學生學習，同樣是為了目的性的利益，更慘的是，從頭到尾得到的都是一樣的飼料。可見效益固然出現了，成績或許變好了，但是真的引起學生的學習熱忱了嗎？
- 四、由學生自主學習，老師退居次位，方式改變了。然而不論改變與否都同樣都存在於體制下，翻轉成功了，很好，但是不成功的人在不變的體制下該如何是好，自求多福嗎？
- 五、在遇到爭議性的議題時，建立翻轉教學的前提是每個人可以和平理性的溝通，在平台上交流不同的意見，在高中校園，這部分顯然並非大家都做得很好，無論是學校對於學生言論的管制、或是對於學生自主的干涉等等。
- 六、雖然翻轉教學很理想，但是回歸現實，所有人都是以高分為重，如果要製造一個溝通良好的共學環境，虛榮心絕對不會是引起學習動機的原因之一。

學生應該要學什麼？

在這個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專家產出各式各樣的知識，到了教育部手中馬上神奇的濃縮刪減成統一的課綱，分配給四、五家出版社，找四、五十個老師、教授就想寫完課本。在教學現場，老師餵食學生被選擇過的知識，學生也沒有反動或是和老師溝通的能力，這不是一個能夠自由追求知識的體制。值得討論的還有：為什麼老師既要傳授知識，還要為學生的學習態度負責？

將學生收歸於這種體制之下，有好有壞，但是我們要想想為了課本內容被關在學校裡的歲月是否真的值回票價。從小到大只接收被挑選過的知識，讓學生成為容易被洗腦的個體，他在將來也容易被控制，且在被控制的同時無力反擊。「我們要學什麼？」是每個人必須回答自己的問題，而不是等著老師在課堂上出新招讓你把知識記起來。翻轉教育，可以讓人對課程內容有飢餓感，但是大家多少也得衡量一下營養不均衡或餓死的危險性。學生學習的東西，不是教育部說了算。

所以，翻轉教室，在筆者眼中是一座工廠，學生就是工人，老師就是管理員。這個工廠產出以

知識為名的貨物，看起來很多樣，實際上還是一樣的內質。

我們都必須思考，翻轉教育法，是真的翻轉了制度嗎？還是我們自己的原則被制度扭曲了呢？學習被挑選過的知識會造成對真實世界理解不足，我們並非將重點放在改變學習方式，而是真正回到本質上思考自己要的是什麼。所以，翻轉教學法是為一個體制下求生的方法，老師想辦法讓學生沉迷，換個角度看，沉迷是成功了，可是好像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沉迷的對象了，知識本身的溫柔與關懷已經不見了，我們真的該努力得到的不是優良的逃生術，而是思考與改革的勇氣。

人要避免被人造的東西勒索

在體制下，翻轉教育被認為需要存在，也有其優點。翻轉教學以另一種型式追求大量學習的效率，以虛榮感促使學生沉迷於學習之中。然而，被誤解、玩弄的學生又有多少能力反動？這些學生在缺乏彈性的狀況下，又有多少自知能和使用翻轉教室的老師對話？在這種學習狀態下，如果虛榮感消失了，自主學習還存在嗎？再一次，為什麼學習必須用虛榮心帶動？如果讓學生不喜歡上課、對知識麻木的因素不變，翻轉教育法能翻轉什麼？這樣的學習是健康的嗎？

推動翻轉教學的目的是出自善意，然而重點還是必須放在最基本的體制問題。台大電機系副教授葉丙成曾說，過去以老師講述、趕進度、考試為中心的學習，都該被翻轉成「以學生為中心」，正是翻轉的真諦。大家都希望翻轉的真諦會成功影響學習，但是如果體制仍維持原狀，就算越來越多人被順利翻轉了，他們也只能算是在制度下僥倖逃脫的人，台灣的教育制度難道是要訓練大家的逃生能力嗎，難道教育會考和學力基本測驗的機制是為了甄選出優秀的逃脫者嗎？

一直以來，課綱的大方向為：「促進台灣民主法治與多元文化價值。」民主法治與多元文化價值毫無疑問需要思辨能力，思辨能力當然與考試機器的訴求不同，但是如今體制仍以考試為重，這是互相矛盾且十分弔詭的現象。

為了減少被體制勒索的可能性，學生們能做的大概是妥善利用體制內的資源壯大自己、不被體制扼殺。要翻轉體制看來很困難，但並非不可能，目前有許多不同的教育改革聲音，各家方式或許不盡相同，但是共同訴求都是讓現狀能夠更進步。

筆者認為，在真正的學習中，沒有指導人士，所有人都是夥伴和不同面向的參與者，老師不必扛那麼多責任，又要行政又要教學。最好能讓整個群體一起討論，討論的過程是重點，最終的理解只是過程。重點是，行動者本身要去尋求、整合資源，這才是自主學習和翻轉的方式。

這樣的學習是真實的學習。但這樣的翻轉學習在體制裡真的能夠發揮效用嗎？筆者認為，體制若不改變，大家只在底下變花招，所有人都走不出名為義務教育的密室。

(2017/6/11 補充)

我是筆者台南女中葉田甜，葉丙成教授認為我在文中對翻轉教學理解有誤，也特地私訊向我說明、並與我討論。我尊重葉教授的解釋，也感謝葉教授對教育的盡心。我在經過思考與沉澱後決定不更改文章內容，但在此特別補上「作者聲明」與「後記」讓文意表達更完整。

作者聲明

我是台南女中葉田甜。我在下筆寫文章前除了先備知識外，另閱讀了三十四筆有關「翻轉教室」的資料，其中有十筆包含葉教授對翻轉教室之見的文字資料與演講；另外有八筆是學思達及其相關組織的資料與演講；四筆 BJT 介紹與學生心得；四筆 PaGamO 有關報導資料；另有一筆為中山女高張輝誠老師個人撰寫談論教育的文稿；除了中文版本還有五筆英文版本資料與影片，其為老師或學生對翻轉教育之看法；其餘兩筆為起源歷史資料，在此不附上連結。

我決定不修改文章內容。我認為，在閱讀三十四筆一手與二手兼具的資料後仍有「主旨上的誤解」，是一件值得檢討的事。我的認知即如文中所提，然而也完全尊重葉丙成老師的聲明。文章刊出後造成不少討論。我與葉丙成老師積極交流，主要針對「虛榮心是翻轉學習的前提」進行討論，希望翻轉教育不再是一個被誤解而限制大眾的框架。

我要重申的是，討論重點是「教育的內容不能被思考」。再者，目前許多討論翻轉教學的文章皆是由執行的老師或教授們提出，少有屬於被教育者的觀點，我想提出屬於一名高中生的想法與經驗，也希望自己在學習之路上面對恐懼時不會無力抵抗、漸趨冷漠。

這篇文章刊出後，正反兩極的聲音都有，因此我更有義務要將文中的爭議與誤解釐清、負起身為作者的責任，讓更多人知道每一個人都可以是有條理的行動者。當然，仍有部分言論讓人驚愕，若社會還是只能對於這篇文章加諸「台南女中」或「第一志願」這種標籤，而不是正視每一名高中生都可以是思辨者的話，我想這是很令人難過的事情。任何人在思辨的過程中，都可能有誤解。但如何清晰地指出誤解來源，我想這是更值得珍惜的。謝謝大家，我們才能讓台灣的教育越來越好，不論是透過老師、教授或是學生的角度與經驗，這些都是寶貴與重要的。

後記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就是你走在路上擦肩而過、吃麵坐在隔壁桌的人。

我的家人給予我很大的空間、讓我衣食無缺，和他們在一起我學會愛自己的生命。還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樣，而且不只在所謂「第一志願區域」，而是分散在不同領域裡，不分年齡、不分學歷，只

是被體制消磨、麻痺而已。總之，我走在我的路上，我會看向光明、不被黑暗吞噬，但是我也不會忘記黑暗，因為它們是不能被遺忘的恐懼根源。我寫的文章，並不是多縝密的思辨，只是身為一個觀看者對生命直接的疑問而已，我相信這種疑問曾發生在每個人的心裡過。我是葉田甜，我會維持初衷繼續做我認為對的事。最後，我要向關鍵評論網的編輯們、還有許多與我一起成長的老師、和朋友致上真誠的敬意與感謝，在此不一一指名，但我相信你們都感受得到。

二、 中文研究所的外籍生：台灣教育方式真的很「傳統」，但四年後我卻深受啟發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3960>

作者：畢靜翰

我是來台灣念研究所之後才發現，原來台灣的學術界與美國的很不一樣。

申請念研究所時，我傻傻的以為，台灣的教授只不過是會講中文的美式 Professors，也以為台灣的同學會跟美國的研究生一樣都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不斷的與教授在互動與辯論，進行很精彩的學術鬥爭。

當然，在台灣開始上課之後，我就發現這種情形在台灣非常難得遇到，所以當時的我，真的是千萬種的不習慣與不悅。

※

在美國，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通常很平等，基本上兩個人都會從「兩個成人」在互動的基礎開始講話，教授與學生都知道，他們的想法不可能 100%一致，因為大學會刻意讓生活背景及價值觀不同的學生進來念書，教授們都知道（也喜歡）班上會有很多衝突，而且教授自己的想法怎麼能跟一大堆年輕人一樣呢？所以上課基本上是教授與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試試看誰的論點最強。

甚至有很多教授，會故意在學生當中「挑撥離間」，然後等到快要下課就宣布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會點出哪個同學的哪個想法比較有趣或有創意，也會評評誰的想法比較不完整，可以回去參考哪些資料補充補充。

當然，很多學生還是會堅持自己本來的想法，甚至會向教授說：「我覺得你是不對的」，但這樣的行為不會讓他們被列入黑名單，只要他們可以跟教授說出個道理來，那個教授會很喜歡他們。

美國的很多教授有個想法：「其實重要不是學生真的有沒有同意我的想法，重要的是學生可以看看資料，然後立刻說出一個有邏輯性的論點。」

我曾經有個同學，在塞滿著三百多學生的大廳裡，當她聽到某個有名的哲學系教授說她覺得很沒道理的論點，就舉手打斷教授的話說：「我不同意！」然後這位教授就開始跟她進行很激烈地辯論。

從台灣人的角度，我覺得這件事情最有趣的點應該是，她那門課最後也是拿了個 A+，我自己當年也是天天都去抨擊同學的想法，也天天被抨擊，寫論文、寫考題也是針對教授們，刻意看看能不能挑釁他們，從不寫標準答案或重複教授的話，而剛好相反，刻意挑起衝突。

※

回想到當時自己說的話、寫的論文，大部分都是不對的，而且恐怕我也這樣跟教授與同學們這樣「玩了」很久才回到比較正宗或接近真實的想法，但這些「真實的結論」一個一個都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而不是別人灌給我的，因此我學到的東西是我自己的，而不是跟別人借來的想法與論點。

很多台灣人，如果可以看到那個過程的話，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班的學生在嘴砲罷了，但其實事情並不是如此，美國的那種小班的研討課程的目標本來是透過一種演化論般的過程，訓練大家的思考能力。

對於資料的部分，上課的時後教授不會把這些講出來，該看的資料、該讀的書都要在家準備，如果沒看過的話，在討論的過程中，教授會注意到，然後記在心裡，給你低分。

所以我剛來台大的時後，因為台灣的學術界不是我所習慣的，更不是我所期待的，我就很不開心，一兩個學期過去了，我也變得天天帶著很負面的情緒去上課。

大部分中文所的課程都是在某個小小的會議室教的，這個會議室是很狹窄，莫名也當了系所的書庫，牆壁都放滿了書櫃，書櫃都塞滿了書籍，書櫃前面也堆滿書與雜誌，還有一排椅子，中間有個大方桌，桌子下面也放滿了書籍。

所以上課時膝蓋會一直碰到老箱子，在會議室的前面有個黑板，旁邊有個窗戶與快要死去了的空調，這空調我剛來的時後，都以為快要換了吧，因為每次上課它的嗡嗡聲大得無法忍受，雖然教授就是坐在桌子的對面，大家偶爾難以聽見他的話，而且這奧妙的空調只有兩個設定：冰河時期與微波爐。

基於台北位於熱悶悶的盆地裡，冰河時期是大家默認的模式，但這組空調從第一年一直到最後都沒換，掛在上面的螢光燈的燈泡也似乎很久才換一次，所以會議室一直給我一種很奇特的感覺：一個非常吵、非常冷、非常暗，也非常狹窄的封閉空間。

台灣教授上課的方式很傳統，中文系的老師更傳統，然後台大中文系的老師就最傳統，這個「傳統」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用多解釋吧。

從第一堂課開始，我立刻感覺到，教授跟我的 level 就差很多－教授高高在上，教授是老師，我卻是個有所不知的小朋友，一個學生。

本來以為可以在任何的情況下自由地發揮很快就懂得閉嘴，每個教授說的話，我跟其他的同學一樣，一直盯著看老師，一直聆聽老師，也一直搗蒜般的點頭——我變成了搖頭娃娃。

一般來說，老師們很少問學生的意見，所以從開始上課到快要下課，都會一個人講話，也常常會離題，講自己課外的事情十幾分鐘。

因為這樣一直講話也有點困難，所以有些老師會叫學生念文本或講義，也會有些老師叫大家寫一個報告，然後上課的時間就是聽某位同學把自己的報告朗誦出來。

這種行為有時候會頗為誇張，甚至我曾經上過某個老師的課，他自己幾乎都不上課，也不準備講義，他就是乾脆把題目交給同學，讓學生去準備報告，所以一整個學期就是聽同學朗誦自己的報告，而且這種報告都會有很多錯誤的訊息，也不會提供很完整的資料，所以對我來說，我很難說我當時是無聊多一些或糊塗多一些。反正，這就很傳統吧——超級！

不過有趣的是，這種上課的方式基本上已經正式的被學校淘汰了，每個研究所的課程都是「美式的討論課」，很多教授偶爾會提到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是...討論課的模式...大家有什麼意見嗎？沒有...？那...下課吧。」

「系所現在要求大家都要發自己的意見？沒意見？好吧。」

「上課的時間還剩下四分鐘...我們該來點討論吧。」

※

那聽我說這麼多，你是不是開始覺得，我非常痛恨這種上課的方式？確實，我不會輕易再次參加這種教學制度，但經過四年的傳統教學，我慢慢地開始發覺，這個過程其實有給我不少的啟發。

我史記研究的教授從第一天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每次來上課，都會剛好準時到，走到桌子的前面，把椅子拉開，又把一個濕毛巾拿出來，擦擦擦桌面，這個過程結束了才坐下來開始講課。

他上課的方式，就是非常認真，他史記裡面的每個紀、表、書、世家與列傳，都辛辛苦苦的準備了一份講義，講義又非常細膩，講義與講義之間又有關連，內容也很豐富，然後他每個講義都會自己念給同學聽，或讓同學輪流念。

這個教授基本上都不講題外話，但有一天，他正在念講義時，突然把講義放下對大家說：「有些人很怕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一直懷念過去的情人，所以會要求自己的配偶不要跟那個人有任何的接觸，當然有時候，這會讓配偶更想要去找過去的情人，所以這個想法非常錯誤的。」

我們都莫名的看著老師，等他繼續。

「你的配偶一旦有這種想法，就立刻讓他們去見個面吧，我告訴你們，在腦海裡的那個情人，一定是個非常美、非常帥的青少年，但現實世界的那個情人都已經胖了，也可能是禿頭了，他們一旦看到了過去的情人變成了這種老人，就會放棄這個念頭。」

老師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想什麼事情，然後加上了一句話：「不過總是有例外，嘿，嘿，嘿。」



有趣的愛情解說之外，從西方人的角度，這個過程很奇怪，為什麼我不能在家裡看？為什麼要在課堂上聽人念講義？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但上了兩個學期這教授的課之後，我就懂了：其實停下來，不講話，聆聽別人的想法，還有古人的話，也會給人很多新穎的啟發，而且會鞏固學者的專門知識。

如果沒有仔細針對過，古書的很多段落，很容易看一下就給忘卻了，但當有人迫使你一直聽、一直聽，也不要求你說出任何自己的意見，你就開始懂如何「接受知識」還有「細看文本」。

我後來年年都去上這個老師的課，我也開始懷疑，是不是我之前在美國太愛聽自己講話，太自以為是，同時實在太無知了？當每堂課都塞滿了我從沒看過，但都非常重要的訊息時，我就開始覺得，站起來說話前，我真得應該先把文本與歷史背景搞清楚，不再去白打嘴砲戰。

碩二時，我去上了當年系主任的課程，這位教授的思考方式非常西式，跟其他的教授比，我想她比較能夠懂我的困境，可以用外國人的角度去聽我想表達的意思，但我也發現，她的研究方法也相當傳統的，她不會像很多西方教授忽視文本或突然天馬行空，用現代人的思緒套古代人的話，我覺得結合了很多西方與東方的特點，也用了很敏銳的智慧進行文學研究。

因為我上了她的課，我就體會到了，西方與東方的研究方法及態度本來不是一定要用二分法去看，我那麼不愉快，那麼不願意接受，其實是個很浪費的思考方式，我本來就是兩邊的好都要，而且我意識到了：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其實不是我以為的那麼清楚。

在我上這位教授的課期間，發生了兩件讓我更懂這個道理的事情。有一天，教授跟大家說，某某有名的美國中文教授要來台大開研討會，所以請同學都一定要來參加，剛好，這位教授是我在美國認識的，我也相當喜歡他，也喜歡他寫過的書籍，所以我當天就早早的飛到文學院占了一個位子，準備好很開心的聽這場非常難得的演講。

演講果然很精彩，但離開了會場之後，沿著耶林大道走回宿舍時，我聽到了三個本地的台灣同學批評這位教授：

「我覺得他講得很浮誇。」

「根本沒什麼內容。」

「只是耍耍嘴皮子。」

「真的～～」

我默默的在後面聽他們講話時，我看到了我剛來台大的任性，那種堅持自己習慣的教育方式，貶低與自己不一樣的人與想法的衝動，我看到了這種從另外一個角度的負面態度，然後覺得很厭煩－對他們、對自己。

那年有一個來自美國常春藤盟校的交換研博士生，他跟剛來台大的我一樣，對中文文學很感興趣，很會講話，但其實古文底子很弱，不過他有了一個很特殊的身分－一個來自美國 Ivy League 研究所的博士生。

所以他講的話，就算是很怪也非常錯誤的，老師也不會說什麼（反正他幾個月就要回去了），同學們也不會說什麼（畢竟他有那種身分，他們不好意思太直接說什麼），但既然如此，有不少人偷偷的翻白眼。

有一天，老師請他介紹他的博士論文題目，他講了幾分鐘之後，全班同學都糊塗了，基本上，他想把某位法國的作者與杜甫的詩連在一起比較比較，也算是一種研究計畫。

但已經經過快三年在台灣的我，雖然比其他的本地學生能夠懂他想幹嘛，同時也開始用比較台式的想法去看這種研究，一來這個傢伙不會法文，二來這個傢伙沒看完杜甫的全集，更何況去看杜甫的那些不同印刷本或怎麼樣，他文言文的底子也不好，所以我當時真的想把一本書丟他的頭，說：「你到底在搞什麼鬼東西啊你，別再胡扯！」

但我那天回家之後，開始想想這些事情也就承認了，我當年也是那般荒謬，那樣令人想翻白眼。

※

既然我在台大的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個讓人想翻白眼的人物，有一個老師一直不會對我翻白眼，也對我很好－我的導師。

我的導師其實是個非常開明的老師，他真的會去問學生的想法，也會記得學生的論點，會跟同學們進行討論，而且從頭到尾態度都很友善，也不會給人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他就是那種比「傳統」還「傳統」的老師，不是那種朱熹之後的死板儒家傳統，而是孔子與孟子跟徒弟一起討論，一起分享智慧的那種更古老的制度。

從很久以前認識他到現在，我對我導師的評價就是，他真的很像孔子！他很尊重別人，知識豐富到不行，也很會辯論，對各式各樣的議題都有研究與想法，同時他不會小看別人，不會驕傲，也不會用老師的身分來壓著別人。

這跟其他的教授的傳統師生關係、高下分明的階級意識教學不一樣，也跟西方人吵來吵去，非常平等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

我導師確實是個比我們聰明很多，一個比我們學生學問大很多的人，我們也都願意承認老師的話非常權威的，但這個感覺與平等不平等就是沒有關係的，老師不會假裝他跟你一樣無知，但他學問比你大這件事情，不會讓你跟他無法進行溝通或聊天。



我現在無法在西方的學術界混，因為我覺得他們很多時候懂了太少才去宣布自己的「權威的研究成果」，但我也不太能在東方的學術界過日子，我畢竟那麼愛講話，也有點憤世嫉俗的傾向，但我同時也知道，這裡的教授的知識難能可貴，可以聽到老師們講話本來就該閉嘴聆聽，不該插嘴搗亂。

所以我最後採取了一個道家的措施，決定靜靜無為，自己看古書，自己想想裡面的意思——這樣我已經很滿意了。

三、【台灣現場 | 造假篇】濫捕、洗魚、造假——觀察員眼中的真相

<https://www.twreporter.org/a/far-sea-fishing-taiwan-truth>

作者：李雪莉（共同採訪：鄭涵文、蔣宜婷）

《報導者》與印尼調查報導媒體《Tempo Magazine》合作，深入兩地調查。過去 10 年，台灣實施了遠洋漁業觀察員制度，隨船監督捕撈與運搬。這個重要且立意良善的制度，原來出現重大漏洞。過去數個月間，《報導者》追蹤了一群離職觀察員，不少觀察員先是遲疑，「(內幕) 這麼黑，你們真的敢寫嗎？」在記者一路了解與說服，並歷經數個月的訪談，不少離職觀察員以及遠洋漁業現場工作者，願意以化名現身。

他們提供過往的經歷、手邊的公文、報告與紀錄，揭露出遠洋漁業的真相：從漁獲數字、船長身份都能造假。從這群觀察員眼裡，目睹台灣監理的嚴重疏漏。這個漏洞不只讓台灣被國際制裁、衝擊台灣經濟，也帶來海洋生態的浩劫。

2015 年 9 月，靠近秘魯的太平洋上，一艘掛著萬那度國旗但台灣經營的小釣船在轉運鮪魚時，發生了一件離奇的失蹤案。美國籍漁業觀察員戴維斯 (Keith Granger Davis)，在漁獲卸載完準備簽名放行前，意外落海。41 歲的戴維斯是觀察員中知名的環保倡議者，有 16 年豐富的觀察經驗，他落海那天，無風無浪。

戴維斯的失蹤，是因擋人財路還是意外落海，迄今真相未明。美國《哈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 還以「漁業的黑暗面」報導他的案件。

遠洋漁業的黑暗面，在於它鮮為人知的叢林文化。

逐利：遠洋漁業的赤裸驅力

在台灣，也有一批遠洋漁業觀察員 (註¹)，隨著遠洋漁船出航，日夜觀測與記錄業者的捕撈，是政府派駐在遠洋的眼睛。他們的報告最後會一層層回報到相關政府部門，再匯整到國際漁業組織。這份第一手報是國際組織對海洋資源評估的重要依據，也是各國每年捕撈配額的分配基準。

¹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為了人類在海洋上的過度捕撈 (過撈)，自 2001 年就宣示要打擊非法漁撈。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RFMOs) 進一步對漁撈國加壓，要求派任一定比率觀察員登船，把岸上的監管延伸到幾千公里外的大海。多數觀察員被賦予「科學漁業觀測」的任務，只有極少數是可以舉發、開罰單的「執法觀察員」。觀察員除了在漁船上，也有駐在運搬船上，他們是負責在漁船將漁獲轉運至運搬船時，盤點並簽名，只有獲得他們的簽名，漁獲才能進港口販售。目前世界上已經有超過 50 個以上的觀察員計劃。

人口佔全球 0.36% 的台灣，卻擁有全世界最多、超過 1,500 艘的遠洋漁船。這個驚人的漁業王國，在別人眼裡卻是「大尾鱸鰻」。國際組織要求台灣落實觀察員制度，於是 2005 年，台灣正式推動遠洋漁業觀察員制度，目前有 54 位。

觀察員的工作環境並不好，每趟觀察長達 4 到 5 個月，一年出航 1 到 2 回。過去，他們被要求每天要海上觀測 12 小時（2014 年改為 8 小時）（註²），若搭的是小釣船，就住在只有 60 公分寬、棺材般狹小的臥鋪，經常被臭蟲叮咬，巨浪滾進船艙時，得穿著雨衣睡覺。船邊偶遇鯊魚環繞。但大自然的惡劣，比不上人性的貪婪。因貪而起的風險，常讓觀察員更接近死亡。

在海上，一艘遠洋漁船造價動輒數億，加上滿載的漁獲利益，經常成為海盜與歹徒的目標。有的船長非法配有槍械，也有船務公司提供武裝保全的服務，保全在斯里蘭卡上岸，每位每天 600 美元，3 人一組，配有 1 支輕機關槍和 2 支 AK47 衝鋒槍。擔任漁業觀察員 7 年的林木添（化名）清楚記得一次上船，船長就配給他一把左輪和兩盒子彈，讓他把玩和防身用。

高風險、高利潤，遠洋漁業不是人人玩得起。漁撈情況最好時，一艘圍網船一年可以進帳 3 億元。一位退役觀察員說：「海上是 24 小時不會停止操作，你（船東）睡覺時，有大量漁工在幫你賺錢，那是比做毒品更好的生意，是會上癮的，就像飛龍在天。」

一出航便長達 2 到 3 年遠離人類社會，與天與海搏鬥，很難維持優雅和文明。無邊際的網、竄逃的魚、強力的鈎、無情的浪，還有甲板上的血色與魚腥，惡劣環境，讓出海久的人，作風也可能變樣。海上的使命是戰勝自然和魚群，船長與漁撈長的目標是「滿載而歸」。

家族兩代出了 5 位大型圍網船漁撈長的葉明志，捕了一輩子的魚，他說：「賺少不行，輸人家，人家一年抓 1 萬噸，你抓 5 千噸，可以看嗎？……你抓沒有，還要保育？連飯吃都沒有！你抓不好就換人，換人啊……換別的漁撈長。」

拼量的工作倫理主導遠洋漁業的文化。如果有漁工不小心讓上網的魚逃走，船上的麥克風會放送連聲國罵，幹部一激動，就可能隨手用漱口鋼杯往漁工的頭砸去。甚至，上過船的人常說：「一條大目魷和一位漁工同時落海，記得去救那條魚。」一隻百公斤的大目魷價格好幾萬元，菜鳥外籍漁工的月薪才約一萬。

臥底：汪洋中最孤獨的存在

充滿風險的觀察員工作，起薪 4 萬 6，出海加給後，可達 6、7 萬，但流動率很高。但真正讓他們恐懼、擔憂的，不是體力上的挑戰，而是他們往往是一群不受歡迎的存在。

²觀察員海上工時原本不受陸上工時規範，但近幾年，有多位觀察員因工傷與工時過長與漁業署打官司。接二連三的訴訟後，漁業署在 2014 年 3 月縮短觀察員在船上的工作時間為 8 小時。

台灣觀察員主要由「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對外漁協)(註³)負責招募和訓練，再由漁業署以約聘僱方式，簽訂一年一聘的契約(註⁴)。官方定位他們是「科學漁業觀察員」，上船主要工作有兩種，一是科學資料的蒐集與記錄，包括在特定洋區捕撈上的魚種與數量、隨著魚群意外混獲上來的海龜或鯨鯊、魚類的生物採樣等；另一個重要工作是監測漁船，包括船名的標示、船位定位等系統的正常運作、船長與船上人員是否遵守捕魚及轉載規定等。

在船上，他們是一群沒有執法權，卻擔負監督工作的觀察者，孤身一人面對與自己利害衝突的船長、語言不通的外籍漁工，也難怪被視為如影隨行的「抓耙仔」。被視做臥底者的風險，來自目睹海上龐大的非法漁撈利益。

40多歲的陳文中(化名)一開始，便參與建立台灣的觀察員制度。他受僱於對外漁協，但實際上，工作6年多，都在漁業署前鎮辦公室工作，是觀察員與官方間的橋樑，負責派觀察員上船和回岸。陳文中向《報導者》透露他和船上觀察員的互動細節：「每週一，觀察員都要傳真船位和觀察內容給我，我們有暗號和代碼，會知道他們是不是出了問題。通衛星電話時，我要他們別說話，只要回覆我『對或不對』。」

若船上發生違法的事，陳文中總會跟觀察員說「你就當做沒看到，先回去睡覺」。他表示：「沒辦法，我要保護觀察員的安全。因為一落海，船隻只要停在那個經緯度停3天、72小時，最後寫個海事報告，船就可以開走，就結案了。我不希望觀察員被推落死掉。」

我看到的其他觀察員都作假，為了生存妥協、配合船長……船長只要找一個不怕死的漁工「處理」我們就好。(3年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離職觀察員們表示，負責招募和訓練的對外漁協，會要他們上船前，先到船東或船長那送茶葉、拜碼頭。在觀察員行為準則裡，漁協總耳提面命，上船要以「和睦、融洽為前提」、「需有安全第一的絕對概念」。

而熟悉觀察員制度的官員指出，「這制度人命關天啊。船上其他人都聽船長的，觀察員非我族類啊，船長會認為你是來監視我們的。如果科學觀察員都做不了，執法觀察員更難，可能被海拋！」

在漁業署訂定的行政命令裡，漁船得接受觀察員登船觀察，一旦拒絕會被裁罰。但一位在漁業署工作的資深員工透露，原本觀察員應隨機抽樣、登船，達到真正中立的觀察，但運作上，仍得拜託

³ 對外漁協的全名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由政府捐助成立，目的是在從事沿海國漁業合作、漁船暨船員在國外遭難或被扣事件的協助，以及遠洋漁業漁獲資料的蒐集、漁船監控系統的規劃。台灣觀察員計劃也由對外漁協建立、招募和訓練。

⁴ 漁業署依「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及「漁業觀察員管理要點」兩項規定，聘僱觀察員。薪等是3副10級，約4萬6千元薪資起跳。過去是每年出海觀察兩趟，每趟3到4個月，近來修正為平均每年出海1到2趟，每趟觀察5個月。其餘陸地上時間則支援行政業務、監督卸魚及協助港口檢查等工作。

船公司配合，才能上船；而且從沒有任何船東因拒絕觀察員，被政府開罰過。

少了公權力的強力後援，觀察員成了海上最尷尬而孤獨的存在。而靜靜凝視與觀察的他們，又見證了哪些漁業的不法利益與荒謬失序？

潛規則：視而不見的洗魚與濫捕

西非象牙海岸南方，600 噸的台灣漁船正在附近的大西洋海域航行，出海兩個月，漁獲量出乎意料豐厚。這晚月光引路，忙了一天的漁工開始晚餐，這餐吃的不再是冷凍食品，船長下令把捕上的鯊魚製成魚翅火鍋，佐著豐盛酒水。

「有這麼好康？」搭上這艘船的觀察員王增辛（化名）嗅出不尋常。熱鬧間船長對他敬了酒，強烈暗示著：「今晚別再觀察，早點去睡了吧！」王增辛識時務地折回船艙，躺進狹窄的臥鋪，決定暫時把良心鎖上。但他無法入眠，因為沒多久，他便感覺船外的動靜，船隻慢慢迫近，船側的碰墊撞擊磨擦，同時響起機器起網的嘎嘎聲和漁工雨鞋的踩踏聲。

憶起那一夜，王增辛說：「我知道他們又在『洗魚』了！」

海上的「洗魚」和陸地上的「洗錢」概念相似，指的是這批魚由誰、在何地、用何種方式捕撈，無從得知。在海撈的世界裡，受監管的漁船才有漁撈權，有產地證明的漁獲才能進港販售，每一道程序都要白紙黑字，向台灣政府或沿岸國提出申請。但眼前這批未報備的漁獲即將「洗」去另一艘船，出售獲利，並進到消費者的肚子裡。

洗魚的現象，代表著龐大的漁撈黑數。這些在檯面下的不法漁撈行為，正是海洋資源枯竭、生態瀕危的主要因素。

為了確切掌握漁撈的實況，隨船的觀察員得填寫船隻在洋區內的位置、捕魚方式、漁撈數量，記錄各類魚種以及保育類鯨鯊等，完成漁撈日誌。

但問題就出在漁撈日誌的真實性。

看著台灣漁船公然違法、船長對官方觀察員毫不忌憚，王增辛雖挫折但不意外。他在上船觀測第 2 年就遇到船隻違法洗魚。問他為何不勸阻或回報，他搖頭嘆氣說：「我們回報的資料不是被（漁業署）竄改，就是被鎖起來。」

例如，超過捕撈配額後船隻是否不再撈捕？撈上來的若不是該船隻的目標魚種，是否按規定拋回海中並填表回報？撈上的保育類魚種是否妥善處理？

多位觀察員告訴《報導者》，船長很少拋棄「過撈」或「誤撈」上來的漁獲。觀察員林木添說：「一條 90 公斤的大目魷大概就是一台摩托車的價格，怎麼捨得丟掉？」

少數漁船將過撈漁獲非法轉載至其他船上，船隻數量多的船東則會調度船隊彼此載貨；也有轉

載中國船上的漁獲到台灣船上，當做自己捕撈的漁獲。這些被視為違規的行為，在茫茫大海裡，太多方法可以規避。

這兩、三年是洗魚高峰期，尤其在大西洋的南非開普敦那裡，違規的漁船和運搬船不少。(漁業署工作多年員工，仍在職。)

觀察員們告訴《報導者》，由於觀察員沒有執法身份，船長敢於一意孤行。常見的做法是船長安排船隻會船，相會時，關掉漁船定位器，讓漁業署暫時偵測不到，或謊報定位器故障。非法轉載速度快，一個網撈上來是兩、三噸，1 小時內就搬得完。

事實上，有時連人在岸上的船東，都無法掌握船長的海上行為。一位轉任潛水員的前任觀察員王惠育(化名)指出，「每個船長有自己的私密帳冊(私房錢)。他們回報船東的是一套，回報漁業署又是一套。我就遇過船長釣到單價高的馬加鯊，釣了 5 條，只回報船東 1 條，其他 4 條就透過會船，這邊交魚，那一邊用竹竿把裝著錢的牛皮紙袋遞過來。」

除了過撈，遠洋漁船常見的違法，還包括對混獲上來的海龜或保育類鯨鯊的非法處置。

2012 年，台灣為了響應全球對鯊魚的保育，率先推出「鰭身不分離」政策，要求鯊魚「鰭」與「身」的重量比例不得大於 5%，而且在 2013 年 7 月正式開罰，一旦鰭身分離，會收回或撤銷漁業執照。但多數卸任觀察員說，此政策難以落實，因為部份船長或漁撈長的保育觀念不足，加上鯊魚鰭的價值遠高於鯊魚肉，魚肉太佔空間，船員通常割鰭棄身，留下魚翅。

王惠育曾在中西太平洋執行過鯊魚保育計劃，根據他的經驗，魚艙最上頭擺著幾條鰭身不分離的鯊魚，進港後，由岸上檢查員照張相後便收工走人，但大家沒注意到艙裡藏了許多被割下的鯊魚鰭。在海上岸上都無法監管惡意捕撈，讓熱愛海洋的王惠育說：「我上去兩年，覺得很失望，覺得沒什麼正義感，就決定離開了。」

另一位目前在港口工作的前任觀察員說，「他們(船長)本來很多在做假資料的，我們一上來，做假就有困難嘛，這完全違背他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上船時會直白地告訴船長，『你想做任何事都 ok，但也要讓我做事，至少讓我拍照、取樣，演完戲大家各自卸妝。』」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分隊長曹宏維告訴《報導者》，目前海巡署與漁業署每年共同執行 3 次「遠洋漁業巡護」，他們透過巡護船登檢，查察違規。但就像是警察抓違規攤販，曹宏維說，你追他跑，陸上都不一定能抓到，海上現行犯更難抓，再加上蒐證難，進到法院成案的例子更少。他認為：「漁船上應該要派觀察員一艘一艘監督，否則是大海撈針。」

船長對我態度非常冷漠，並限制(我)若非傳送漁獲報告外，不得登上駕駛台，

不得使用電話，每週僅准許用傳真機一次……本航次混獲偽虎鯨一尾，船長竟完全無視我在場，當場宰殺，只為拔取偽虎鯨牙齒。我跟船長溝通困難故只得拍照紀錄，無力勸阻……（7年半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其實歐盟早在 2012 年開始，就連續 3 年追蹤台灣，他們發現台灣並未盡到打擊非法漁撈的責任。於是在 2015 年 10 月對台祭出黃牌警告，要求加強監管，其中一項是落實觀察員監理。

為了強化監管機制，立法院在今年（2016）年中修正通過《遠洋漁業三法》（註⁵），加大規範與罰責。眾多監管機制之中，也增加了觀察員的比例，目標在未來半年內從原有的 54 位增為 130 位，涵蓋率要達到漁船數的 5% 以上。

現制已運作 10 年以上，但卸任觀察員以幾乎控訴的方式，向《報導者》揭開遠洋亂象。未來漁業署將每年約要花上 1 億 3,000 萬元，擴大觀察員計劃，同時新增「強化國際合作打擊非法漁業」，5 年 23 億元的監管計劃。但，監管不力的漁業署，能進一步落實管理嗎？

破口：無力的事後監管

事實上，台灣不缺法、不缺制度，只是欠缺監管的決心。除了上述漁獲數字偷天換日，連登船工作者的身份，造假情況也很嚴重。

依漁業署《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遠洋漁船上的船長職務必須由台灣人擔任，且輪機長、船副等幹部的外國籍比例，不得超過二分之一。但現況並沒依法令在走。

實務的運作是這樣：漁船從前鎮開出，由持有船長等幹部船員執業證書的人上船，經過海關檢驗出港後，船開至小琉球或新加坡，船長、輪機長被「放港」，再由中國、韓國等其他國籍者上船更換。業界稱這個做法為「頂票」，一個人頭的行情約 5 千元。

頂票是整個漁業界都在操作的事。一位在前鎮擁有多艘魷延繩釣船的船東告訴我們，光是他近 10 艘船的船長中，只有兩位是台灣人。

面對人才聘僱未依法規走，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的回覆是：「法令規定船長一定要是台灣人，目的是希望要傳承，希望台灣漁業至少還是台灣人在指揮。外面有傳說（找外國人）……，有可能，但這個被查到是要被處分。」

但離職觀察員說，即便他們目睹冒名頂替的幹部名單，並主動回報，漁業署也很少查明。

除了觀察員制度，漁業署其實握有不少監理工具杜絕違法，卻無法落實。

以漁業署投資高額經費設立的漁船定位系統（VMS，Vessel Monitoring System）為例，每一

⁵ 新增《遠洋漁業條例》、《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及《漁業法》部份條文修正等 3 項法案。

天，漁業署的台北與前鎮兩個辦公室，有超過 10 位替代役男及數位全職員工，透過該系統來監控台灣一千多艘出海漁船的船位，確保漁船不在禁漁區、未違規進入他國經濟海域捕撈、沒有違法會船等等行為。

台灣漁船每 4 到 6 小時，要回報衛星定位訊號給對外漁協，但弔詭的是，漁業署未選擇即時監控，而是隔天才監看漁協提供的船位報表，追蹤可疑船跡。

副署長黃鴻燕說：「船位定位系統的訊號是即時的，同仁要看，隨時看得到，還可以看到過去幾天的船跡，發出警告。」

但知情人士告知，漁業署並非即時監管，多半是「監控前一天漁船位置」。他說，漁業署不像警政與海巡體系有 24 小時的輪值人員，即時監看需要經費，緊急與船長通話的衛星電話，一分鐘得花費上百元。他也指出，歐盟對台發出黃牌後，曾派專人赴台，當歐盟得知監看實情時，曾質疑監管的緩慢，而要求立即改善。

那麼發現船隻異常作業，漁業署怎麼處理？

遠洋漁業管理科助理楊克誠表示，一旦他們發現疑似違規的船隻，會先以平信發函給船東，請船東要求船長駛離該水域；船東必須在文到 3 日內至漁業署說明，若未執行，漁業署會再發雙掛號信催促。

但從《報導者》拿到的一份公文顯示，漁業署的監管顯得拖延：

◎9 月 13 日：一艘小釣船違規進入菲律賓海域作業

◎9 月 20 日：發函要求該漁船離開；9 月 23 日該船仍在原海域作業

◎9 月 23 日：漁業署以電話通知家屬，要求船隻立即駛離。

從發現到要求船長駛離，這中間已過了整整 10 天。即便基層監管人員再努力監督，冗長的簽核流程已讓監管失利。

我們是一群沒有辦法執法的海上觀察員，我們看到一堆不該看的。幾乎每個人都看過洗魚。(10 年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深入漁業署，會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氛圍。《報導者》採訪漁業署前鎮辦公室當天，替代役和承辦人員已向疑似違規的 6 艘船主，發出 6 封雙掛號信。前鎮的公務員負責監管小型鯖釣船，小釣往東南到索羅門、向西到非洲，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盯著螢幕，從 800 多艘小釣船的船位軌跡，查詢疑點。

基層人員即便發現違規船隻，常因漫長的公文旅行，等同在發函警告一項「已完成的違規行為」。

一位小琉球的陳姓船長告訴我們，現在的利潤很低了，加滿油的船開出去就要拼命抓魚，所以

他出海時不會理會官方警告，即使回航收到漁業署寄來的雙掛號，他的作法是，「通通撕掉」。

漁業署祭出公權力，業者不太買單。不少船東很會虛與委蛇，交待了事，不但政府難以懲罰，更改變不了非法捕撈的傷害。

此外，基層人員辛苦簽核公文，特別是懲處的公文，也經常被擋下。

目前違反《漁業法》最高罰鍰是 30 萬元，或透過行政命令連續罰鍰。但任一個處分要成案，從承辦人、組長、科長、單位主管、法規科主任，再送到主秘、副署長、署長，整個流程走完至少要蓋 10 個章。

一位資深員工說：「私下大夥兒都在抱怨，上頭會以各種理由要求我們重簽，但簽 4 次被退 4 次，無疾而終的例子不少」、「每一關都可能把案子擋下來，因為船主和業者會透過立委，直接向官員關說」。

遠洋漁業管理科的楊克誠從替代役退役後進入漁業署，在他身上，看到基層公務員有心執行。我們問他，是否相信上頭的長官會核准他簽上去的處份？他思索幾秒後回覆：「嗯，我相信我們署長！」

困局：保護漁權還是守望海洋？

受訪的離職或現任觀察員，多數充滿熱情，他們認為如果落實監管，像是善加利用觀察員的第一手紀錄，能真實了解各洋區的魚群生態，也能提供政府政策制訂的線索。

於是我們回頭詢問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觀察員的資料是否準確？他斬釘截鐵指出，漁業署絕對不會叫觀察員做假。他說，觀察員是船上唯一中立的角色，資料一定比船長公正，只是不排除有時候有些人為的因素（如沒經驗或與船長掛勾），如果做假，會被撤職。至於觀察員一旦看到違法事件，黃鴻燕說，漁業署會進一步徹查漁船上的異常。

然而，根據長期參與觀察員制度的前員工陳文中（化名）說，漁業署很少進一步調查漁船上的造假，甚至會協助「修正」資料。

陳文中指出，若是漁撈量、海龜海鳥數量過多，署裡會針對明顯高於其他國家的釣獲率，請對外漁協幫忙「修正」、「整理」後，再提供一份全新的數字給國外組織。他說：「為了不讓國際組織看到台灣漁業的黑暗面，數字通常會這麼表現：捕撈的漁獲與年度配額配得剛剛好，撈上的保育類動物則會少報。」陳文中說，選擇離開漁業署是他知道太多祕密了。

我曾在太平洋赤道上下 5 度的大目鯖魚區，一天看到他們抓超過 50 隻的欖蠐龜，就是電影《海底總動員》裡的那種。我回報後，署裡不理不睬，上頭的管理者還跟我說：「你這樣我們很難做，你把海龜資料報給我，我也不敢拿到國際上，會被

罵死。」所以我開始學乖，到觀察員的後幾年，不管船上抓到多少保育類攔蟻龜，我填寫的數量就是 1 隻。(7 年觀察員資歷，已離職)

有觀察員等各式監理工具，卻執行不力，漁業署是有苦難言或掩耳盜鈴？

專訪漁業署時，《報導者》最常感受到的是，官方和業界都瀰漫一股被國際不公平打壓的義憤，以及保護台灣漁權、不容國際配額被砍的愛國心。

在漁業署一路看著遠洋漁業成長的黃鴻燕說，現在一旦台灣船違規被舉發就是連坐法，所有船隻受懲罰。他拉高些聲量說：「小船大船都是台灣漁船啊……漁業署這個管理的位子很難做，因為台灣船太多了，這個位子當然辛苦啊！」

黃鴻燕認為：「(台灣) 不守規矩，祖產給人沒收走了，將來就不能再作業，你要從這觀點來看……我今天在我這個位置，如果讓它 (漁船) 亂搞搞到最後，祖產給人家沒收了，誰要負責任？」

維護「祖產」的至高共識，以及不少漁民尚未跟上的能力和觀念，多少造就低報或錯報的文化，也成為官方與業者漠視保育的託辭。

從漁業署預算的分配情況，可以看出台灣始終以「發展」優於「永續」的心態領導漁業。2016 年，漁業署近 51 億元的預算中，漁船用油補貼佔去一半，達 25 億，遠高過相關的監理、保育計劃的額度。

走向全球的漁業大國，卻有個資源不相稱的管理預算。2016 年，漁業署總預算佔農委會 1,200 億預算裡的 4.1%。

資源不足的結果，漁業署經常得搭著業者便車才能見到歐盟執委，國際漁業糾紛也得由船公司的駐外單位協助。這種左手要和業者「搏感情」，右手要對業者「開罰單」，讓漁業署的角色充滿矛盾。

面對無法積極行動的沉痾，專長國際漁業談判的國立海洋大學教授黃向文說，政府的想法經常是 60 分及格就好，但現在國際標準嚴苛，對一個最大的公海漁業國來說，若只能被動回應，會很辛苦。

台灣準備好了嗎？

2017 年 1 月 20 日《遠洋漁業條例》將上路，未來的重大違規會處以 150 萬到 4,500 萬元罰鍰，相較過去罰款額度 3~30 萬元，天差地別，此外還有數百條新增的條文與嚴格規範即將實施。漁業署也因應歐盟壓力，2016 年開始推動「強化國際合作打擊非法漁業」，但計畫目標仍充滿形式主義的痕跡，包括：觀察員海上觀測任務 60 船次、掌握漁船卸魚聲明 4000 筆……等。漁業署說已積極宣導，並強調未來一定加強執法。

但台灣始終不是沒有法令。與中西太平洋島國觀察員的執行力相比，差異在執行的決心。

台灣最大的民間造船廠——中信造船，旗下船隊長年在密克羅尼西亞等島國經濟海域捕魚。中信漁業部專員黃種智比較兩邊觀察員後說：「他們（島國）權力很大，他們寫的東西是真的到下一個港口就能扣船的東西，你（台灣）寫了是給自己看而已，誰會去執行？違法，然後怎樣？你會重罰嗎？罰 2 萬？罰 10 萬？這些錢船東怎麼會有感？」

而中西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的觀察員南陶卡納（Tamarua Nantokana）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說：「政府對我們的支持是讓我們做各種紀錄，特別是能得到罰鍰的那種。」

翻開漁業署的法定預算書，每年因《漁業法》收到的罰鍰約在 1 千到 2 千萬元之間；但在太平洋島國，不論是錯誤的漁撈日誌、過期漁業證照，船長和漁船都可能被長期扣留，而捕撈一隻鯨魚開罰的金額甚至達 100 萬美金。而這樣的重罰，不論島國是出於生態保育或罰金利益，都讓業者上緊發條，加強訓練漁工，避免以身試法。

永續漁撈是未來趨勢。從觀察員的眼中看到的漁業真相，殘酷赤裸，他們對官方一再坐視遠洋上頻繁發生的洗魚、違規、造假的文化，感到憤怒。

面對即將上路的新法，台灣能否擺脫過時的漁撈文化、整頓充滿造假與虛應的監理，漁業署能否擺脫與企業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這將影響台灣遠洋漁業的存續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公信力。

四、【走入印尼 | 懸案篇】未解的謎團：一名印尼漁工之死

<https://www.twreporter.org/a/far-sea-fishing-indonesia-fishermen-death>

文：蔣宜婷（共同採訪 / 李雪莉、鄭涵文）

2015 年 8 月底，一名印尼漁工在台灣遠洋漁船上死亡，距離出航才 3 個月。這起屏東地檢署在 2 個月內就快速簽結的案件，近日卻受到國內外極大關注，從國際媒體 BBC、印尼地方媒體，到台灣監察院跟勞工團體，都察覺事有蹊蹺。為了解開謎團，《報導者》與印尼調查報導媒體《Tempo Magazine》合作，深入兩地調查。

2015 年 8 月 25 日深夜，一艘從台灣屏東東港出發、到中西太平洋捕撈鮪魚的 11 人小型遠洋漁船福賜群號上，死了一名印尼漁工。1 個月後，棺材車載著這具從台灣送來的屍體，開進印

<https://youtu.be/UmMKhpf1roE>

一位印尼漁工之死（攝影、製作／林佑恩）

尼中爪哇直葛（Tegal）郊區的小鎮，停在一間機車修理行前。

剛過晚上 9 點，是肥皂劇的熱門時段，但鄰里因為這事騷動起來，鄉下地方，還沒有從國外回來的屍體。棺木裡，這名叫做 Supriyanto 的漁工，穿戴整齊，罩著一件灰色西裝外套，給人打上了領帶。家裡 20 幾人，一起看著他。

也不是這身打扮太突兀，但他們幾乎認不出人來。

他到底怎麼死的？

「遺體很小，很像他最小的孩子。他的皮膚很黑、很乾，好像只有骨頭一樣，眼睛好像掉下去，不在原本的地方，」時隔 1 年多，2016 年 10 月，《報導者》前去採訪，在機車修理行前，Supriyanto 的堂弟 Setiawan 試著告訴我們，那是具多麼詭異的屍體。

Supriyanto 個子雖然不高，也有 160 公分，中等身材，出海前的體檢報告裡，被填上健康狀態良好。但半年後，家人收到的，是一翻身就差一點支解的屍體，甚至沒附上驗屍證明。

生前，Supriyanto 原本是長途巴士的收票員，每天經由爪哇島北岸綿長的產業道路，往返直葛與首都雅加達，一個月賺 700 元台幣，勉強養活 3 個孩子。Supriyanto 因為父母早逝，又是長子，國中畢業就擔起家計。但他沒多少技能，運氣也不好，工作一個個換，妻子離開，步入中年，一直沒存上錢。

於是，2014 年，Supriyanto 第一次來台灣漁船工作，4 個月領到 7,000 多元，相當於他當車掌近 10 個月的薪水。

Supriyanto 想，台灣漁船是他翻身的最後機會。他要挽回前妻，一家人住在一起。出發前，大家都勸他打消念頭，他已經 43 歲了，而且小鎮裡的人都知道，「台灣漁船很危險」。

但他仍執意出航，Supriyanto 到另一個城市，辦理出海文件，還住進仲介所宿舍，家人來不及送他一程，也從此斷了聯絡。

當他們再次聽到 Supriyanto 的消息，就是他的死訊。

3 支證明被虐待的影片

Supriyanto 在船上過世後，漁船返航回到屏東東港。2015 年 9 月 9 日，屏東地檢署到場進行相驗屍體跟偵辦。兩個月後，11 月 10 日，屏東地檢署簽結此案，認為 Supriyanto 是病死的，這案件沒有他殺嫌疑。他的死因是：「於船上高處曬衣時失足跌落，導致膝蓋受傷，嗣因傷口感染菌血症，最後因敗血性休克而死亡。」

法醫驗屍報告指出，Supriyanto 雙腳膝蓋上，各有一個近半面掌心大的傷口，是感染菌血症、最後引發敗血性休克死亡的地方。除此之外，Supriyanto 從耳朵、手臂、背、膝蓋、到腳跟，都有外傷，而且死時嚴重營養不良。

遠洋漁船被認為是 4D 工作，骯髒(Dirt)、危險(Danger)、辛苦(Difficulty)、離家遠(Distance)，走進漁港，處處可見少一隻小指，發生過工傷意外的漁工。

但 Supriyanto 渾身的傷口，無法單純歸於意外。一名同船漁工用手机錄下 3 段船上影像，那 3 支影片，成了 Supriyanto 生命最後、託人帶上岸的口信。

Mualip (同船印尼漁工)：「有很多人打你嗎？是誰？你要講出來。」

Supriyanto：「……」

Mualip：「說啊，那些人叫什麼名字？講啊。」

Supriyanto：「引擎部門的人。」

Mualip：「還有誰？」

Supriyanto：「Agus 及 Munawir (另外兩名印尼漁工)。」

Mualip：「船長有參與打你嗎？」

Supriyanto：「船長有跟著打我，就是虐待我。」

(影片一片段，攝於 7 月 21 日 7:36，Supriyanto 死前一個月)

影片一，7月21日，出海70天。Supriyanto 直視鏡頭，他說，船上有4個人打他。除了台灣船長跟輪機長之外，還有另外兩名印尼漁工動手。那時，他頭頂流血、雙眼紅腫出血、走路歪斜。

影片二，7月23日，出海72天。Supriyanto 坐在甲板上，不發一語。錄影的漁工說，Supriyanto 剛被打過，整個臉腫起來，已無法行走。

影片三，8月25日，出海105天。Supriyanto 呈現死前彌留狀態，他雙頰凹陷、全身乾癟、瘦到骨架清楚。身旁的人要他快向真主禱告，但他已經無法說話。

Supriyanto 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在家鄉時，一下班，就到清真寺去，沒有其他興趣，個性內向。他大兒子告訴我們，爸爸很少陪他們出去，「都一個人看很難過、很難過的電影」。

Supriyanto 或許沒想過，自己也成了人們記不起名字、匆匆結尾的悲劇電影。大部分情節已經丟失了，某些重要的情節，又被高速快轉。這3支能夠證明 Supriyanto 在海上遭虐待的影片，當時負責偵辦的屏東地檢署，幾乎直接跳過。

監察院今年（2016）調查 Supriyanto 死亡案件時，認定這3支影片極為爭議，是此案重要證據，便找了專業印尼通譯重新翻譯這些影片。負責此案的監察委員王美玉向《報導者》表示，當他們比對屏東地檢署翻譯內容，發現屏東地檢署連基本的語言翻譯，都粗略處理，完全沒搞清楚影片內容。

監察院請來的通譯，在翻譯影片時頻頻落淚，但屏東地檢署請來的通譯，由於不懂 Supriyanto 的家鄉話——中爪哇語，第一支影片10幾句話都被跳過、沒翻譯出來，其中包含了 Supriyanto 被虐待的自白、誰毆打他等重要訊息。

第二支影片中，該通譯甚至寫下了：「這段全部都是中爪哇話，所以聽不懂。」同船漁工陳述 Supriyanto 被毆打，臉腫起來、無法走路，都被「聽不懂」所帶過。

王美玉質疑，一年有60幾萬名外籍移工來台灣工作，他們在這生老病死，一件死亡成謎的案件，卻請不到一個專業翻譯。

據知情人士透露，屏東地檢署知道翻譯不全，但因為這3段影片未拍攝到 Supriyanto 膝蓋上致命的傷口，所以認為沒必要再請人重新翻譯。且地檢署取得影片時，同船的印尼漁工早已結束訊問，返回印尼，無法根據內容進行提問。

草率簽結的人命

既然 Supriyanto 的膝蓋傷口是本案重點，那這傷口如何造成？為何始終沒癒合、最終感染致命？都應該被詳細調查。

然而，屏東地檢署沒有等到法醫回函解釋傷口成因，就已經結案。

法醫之後的回函指出，不能排除 Supriyanto 遭受虐待。

報告顯示：「……因傷口有慢性潰瘍的變化，確實不能排除燙傷後有再遭人為踩踏或被罰跪的情形，造成傷口長時間無法癒合。」及「……死者外表皮包骨成惡病質，有極度營養不良的情形，所以無法排除該漁船船長有虐待 Supriyanto 且沒有給其東西吃的情況。」

不包含可能參與虐待的 2 名漁工，另有 4 名漁工在檢方訊問時說出，Supriyanto 被虐待。甚至有人提到，死者膝蓋的傷口，是船長陳凱治造成。

「打他的是船長、輪機長、Agus Setiawan、Munawir Sazali 等 4 人都有打他，這是我親眼所見。」

「死者常常被船長跟輪機長打，用工具打，理由是死者常常打瞌睡，被打耳朵及頭部，……我沒看到怎麼被打（膝蓋），但有腫起來。」

「（其他漁工）都有打死者，打死者的嘴巴，害他往後跌倒後腦撞到流血。……是船長教唆的。」

「（死者膝蓋傷口如何造成？）不知道，只知道是船長造成的。」

不過，屏東地檢署並沒有採用這些說法，他們認為外籍漁工說詞不一，有利船長的說詞仍佔多數。船長在檢方訊問時，解釋 Supriyanto 是曬衣時跌落，膝蓋受傷，後來因為生病，無法走路，只好在地上跪爬，可能因此讓膝蓋傷口更嚴重。船長陳凱治說：「我從來沒有打過他，只是輕拍。」

我們電訪了船長的父親陳金德，他同時是招募 Supriyanto 的台灣仲介。他強調，船長已經跑船好幾年，漁船環境封閉，整艘船只有船長和輪機長兩個台灣人，船長不可能冒著被漁工殺害的風險，虐待漁工。

不過據知情人士透露，船長雖然一再否認虐待，但他沒有通過測謊，而輪機長因為教育程度不高，根本不能理解檢察官的問題。另外，這些漁工在第一次訊問時，都還沒領到整趟出航的薪水，未必一開始就敢說出實情。

監委王美玉也認為，屏東地檢署並未查證 Supriyanto 的死亡與遭受虐待是否有因果關係，偵查並不完備。

事實上，偵查尚未結束。Supriyanto 的案子，檢察官並沒有做成起訴、不起訴處分，而是將此案行政簽結，這種檢方實務常用的方式，不時帶有爭議。

「有死亡的案件，做行政簽結本來就很詭異。」處理過另一起海上漁工喋血案的律師曾威凱說。他解釋，通常只有被告不詳、毫無事實根據、明顯是民事糾紛的案件，才會用行政簽結。但 Supriyanto 的案子攸關人命，檢察官應該查過所有關係人，確定都沒有責任，做成不起訴處分，而非簽結。

監委王美玉也對行政簽結充滿懷疑。她解釋，檢方沒有起訴，而是以行政簽結暫時結案，唯有

找到新事證，才會繼續調查。但 Supriyanto 已經死亡，其他漁工都回到印尼或再次出海工作，他的家屬上哪去找到新事證？

不過死了一名漁工

船開出去，離岸越遠，漁工的命只會越來越薄。Supriyanto 死前一個月，一名同船印尼漁工，就在收網時，因為風浪過大墜海。

跑過鮪釣船的船員曾向我們形容，這不是「人幹的工作」，台灣老闆讓船開出去，就一定要賺夠錢。下鉤、起鉤超過 24 小時的捕撈作業，漁工輪班工作，一天往往只能睡 2 小時，船再晃、浪再大，站著都能睡著。

但四望無岸，如果不棄船跳海，多數人只能咬緊牙關。Surpiyanto 工作的漁船，是船長一家貸了好幾百萬，準備與天博命、不到百噸的小釣船。急切又沈重的滿載壓力，把這艘小船逼得喘不過氣，一名漁工在訊問時就說，「其他（漁工）都是新人不是很適應，全部的人情緒都忍耐到極點了。」

Supriyanto 動作較不俐落，只能做些簡單的工作。他曾告訴一名漁工，全部人都會罵他，其他人工作生氣時，手裡有什麼就往他身上丟。這些行為，無論是加以管教、情緒失控還是惡意施虐，都把 Supriyanto 逼入絕境。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分隊長曹宏維說，一般人認知海上喋血案，都以為受害者是船長。他也曾抱持相同印象，直到自己出海救援一名遭漁工挾持的船長。

「我們實際看那個情形，很明顯知道，就是虐待漁工，漁工反抗，他（船長）趕快叫我們過去（救援），」他說。

船上權力關係幽微，雖然幹部與漁工人數比例不對等，但船長仍是船上，唯一能夠打衛星電話，對外求救的人。

仲介、船長、海巡隊員、海上觀察員，這些真正上過船的人都隱隱知道，外籍漁工在船上被虐待，事實上是比船長被殺害更常發生的事。但漁工難以對媒體發言，漁業署也只統計了我國船長遭受外籍漁工傷害的事件，但外籍漁工若被虐待、殺害、死亡、失蹤、受傷，一概沒有統計數字。

沒人對他的死亡負責

沒被填下的數字，卻是一個個真實活過的人。

Supriyanto 的遺物，家人幾乎沒有動過。小小的腰包，是他僅有的行囊，裡頭仍裝著他的證件、戒指、前妻照片、可蘭經文、護身符和幾張皺皺的紙。其中一張摺得爛爛小小的紙裡，像怕忘記，寫著家裡地址。

他雖然安靜，跟其他家人也不親，卻是念家的人。出航前，Supriyanto 告訴妹妹，「如果我沒有回來，幫我照顧兒子。」現在妹妹靠賣印尼小吃，幫他照顧兩個兒子。

去年 8 月初，Supriyanto 身體狀況開始惡化。船長在知情後，叫 Supriyanto 在船艙休息，還拿了些成藥給他吃。訊問時，船長說，他當時聯絡其他返航的船隻，要讓 Supriyanto 先返台就醫，但都聯絡不上。

然而，漁業署、漁業電台都沒有這艘漁船上有漁工生病，要求返航或就醫的通報紀錄。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指出遠洋漁船上如果漁工有重大傷病，需要向電台通報，做醫療諮詢，必要時送醫；但該船船長未做適當處理，也沒有緊急送醫，「對於人命沒有這麼重視」。

Supriyanto 屬於境外聘僱的漁工，跟一般境內外籍勞工不同，不受到《勞動基準法》保障，但在境外聘僱的管理辦法裡，仍明確指出，外籍漁工如果生病，船主必須負責及時就近安排治療。

但屏東地檢署僅調查 Supriyanto 是否為他殺，並未針對船長或其他人，調查是否有人業務過失致死。

律師曾威凱說，Supriyanto 即使毫無外傷，單純病死，「都要因為船上特殊環境，去追究船長有沒有過失。」監委王美玉也認為，檢察官明顯怠責，業務過失致死是非告訴乃論之罪，檢察官為國家代表，卻未依法偵辦，應該重啟調查。

對於監察院的要求，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韻如回應，他們仍在考慮。

截至目前，沒有人為 Supriyanto 的死亡負責。

Supriyanto 因為是境外聘僱漁工，不享有勞健保，自然也沒有任何死亡給付或津貼。境外漁工唯一投保的 50 萬元意外險，因為他被認定為病死，無法領取。無法規可循，他的家人也不能得到任何賠償。

讓他們賭命的聘僱制度

Supriyanto 跟其他遠洋漁船的外籍漁工，都是經由境外聘僱的方式，來台灣漁船工作。但這個充滿漏洞的制度，卻把漁工們放進極端不公平的遊戲規則裡，讓他們被不斷剝削、賭上命、簽下不平等契約。（【走入印尼 | 仲介篇】台印聯手剝削萬名漁工）

《報導者》和印尼調查報導媒體《Tempo Magazine》各自深入兩地進行調查，發現與 Supriyanto 接觸的台灣與印尼兩地仲介，都是違法仲介。Supriyanto 的台灣仲介陳金德去年並未接受仲介評鑑，漁會不曉得他招聘漁工。Supriyanto 的印尼仲介，也不在當地政府部門核可名單上，是非法經營。

透過非法仲介，Supriyanto 也以假的船員證出航。根據調查，印尼政府網站上查不到 Supriyanto

船員證號碼。招聘他的印尼仲介受訪時指出，Supriyanto 自行提供船員證跟護照，但他們未查核，就送他出海。

同時，我們也取得印尼仲介與 Supriyanto 所簽署的契約，發現仲介利用押金制度，防止漁工任意離船，更附帶處罰條款。

談到 Supriyanto，家人都說他「很安靜」，與人起爭執，也通常不會反擊，個性較為軟弱。但這紙契約，無疑讓漁船成為他海上囚困的牢。

Supriyanto 每個月薪水該領 10,500 元台幣，但攤抵仲介辦理證件的費用，他第一個月，實際只能拿 3,000 元。而上船 2 年，他要支付高達 3 萬元台幣的押金，唯有撐到滿期，才能領回。

所以他不能反抗船長，如果被送回印尼，沒賺到錢，還可能負債。合約寫著：「我充分瞭解，當公司或船長叫我做事或工作，不管那些是否為船員的工作，我隨時可以上任」、「如果船長發現我無法工作，我願意被送回印尼，如果未滿 1 年，我願意自己支付來回機票的費用……」。

合約上也規定，他如果做錯事、偷懶、逃跑，或是要求回家，都會連累家人，家人最高必須要支付印尼仲介 3 萬元的罰款。

監察院因為 Supriyanto 的死亡，對漁業署提出糾正案，指出漁業署失職。漁業署作為境外聘僱漁工的主管機關，卻不知道這些漁工簽署了不平等契約，也未落實仲介管理跟評鑑。

家屬只要一個公平

監察院啟動調查後幾個月，Supriyanto 的台灣仲介陳金德在 2016 年 8 月，以 10 萬元和 Supriyanto 的家人和解，這已經是 Supriyanto 死後將近一年。陳金德告訴我們，這之前，他們一直找不到 Supriyanto 的家人。

「和解」使人相當困惑，因為 Supriyanto 的家人不斷重複，他們離真相仍然很遠。

我們向 Supriyanto 的堂弟夫婦詢問這件事。他們解釋，台灣仲介的確來過家裡，給他們一筆錢，並要求簽下和解書。在這之前，他們僅從台灣這邊收到 4 萬多元的薪水。

和解書是雙語的，以中文跟印尼文，寫著 Supriyanto 生病死亡。內容指出，家人領了這筆錢後，「不得再向甲方及承保公司要求其他賠償及一切所生之法定責任，並不得再有異議及追訴等情事。」和解書內容等於要他們放棄追究 Supriyanto 的死亡。

「那你們為什麼會簽名？」

「她（仲介）叫我們簽，不用管文件上的文字。她還是會幫我們，我們相信她，她做出承諾。」

Supriyanto 不顧一切簽下的不平等契約，跟家人明知不妥，卻接受的和解書，成了悲傷的交叉剪接。對這家人來說，台灣太遠，只要有人說自己從台灣來，無論是誰，都成了他們的寄望。

我們結束採訪、離開印尼已經一個多月，他的家人仍不時傳英文簡訊過來。

「 *I just hope really really need your help to justice. the people was kills my brother, not need any more... please help us.* 」（我只是希望，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幫忙，得到公平。這些人殺了我的哥哥。我們沒想想要更多……請幫幫我們。）

五、 汪浩觀點：1996 年臺海危機是怎麼結束的？

<http://www.storm.mg/article/212199>

作者：汪浩（中國學者，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2017 年 1 月 9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多架軍機進入朝鮮半島西南海域的南韓防空識別區，接着穿越九州對馬海峽上空飛往日本海，南韓空軍緊急出動 10 餘架戰鬥機，向中方示警，而日本自衛隊戰機也緊急升空密切警戒。1 月 11 日，解放軍航母「遼寧號」艦隊進入中華民國防空識別區，沿著海峽中線西側，向北通過臺灣海峽，國軍全面警戒。針對中國這一連串對鄰國的騷擾，美國國務院出面喊話「我們在亞太地區整體戰略是試圖降低緊張情勢，我們當然不願看到任何武力展現，或者任何緊張情勢升高。」中國似乎在測試美國維護西太平洋安全和穩定的決心，這與 1996 年 3 月中國發動臺海危機的目的如出一轍。

1996 年 3 月，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升級軍事演習而引發臺海危機。解放軍第二炮兵和南京軍區分別向臺灣外海試射飛彈及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美國則緊急調動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來臺海應對，一時臺海戰雲密布。當時，中國發動這場危機既是為了測試美國的臺灣政策底線，也是企圖干涉中華民國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但最終適得其反，李登輝仍然高票當選。臺灣大選後，中國開始注意到臺灣民意與他們站在對立面，被迫調整政策，對臺態度此後緩和了近兩年。

1995 年 7 月至 11 月 23 日，中國對臺海發射飛彈及組織軍事演習，抗議李登輝總統訪美。1996 年 1 月 30 日，中國總理李鵬又公開指責李登輝「有意製造『兩岸關係緩和』的假像，但實際上卻在加緊製造『兩個中國』，大搞『彈性務實外交』，大肆購買軍事裝備。」李鵬還威脅說「如果有人企圖以臺灣領導人產生方式的變更為由，為其分裂祖國的活動披上所謂合法的外衣，這完全是徒勞的。」李鵬的講話為中國軍事恫嚇的升級作了鋪墊。

2 月 7 日，李登輝為確保大選順利，召集國安高層會議，討論國安「應變計劃」。會中，根據劉連昆的情報，國安會報告中國可能於「3 月 5 日」全國人大年會開幕時，在臺海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劉連昆是解放軍總後勤部少將，他可能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幫助臺灣的最重要的解放軍將官。劉連昆的身份，被潛伏於臺灣軍情局的中國間諜李志豪暴露，以致他於 1999 年 8 月被逮捕處死。1996 年 3 月初，中國擔心臺灣總統直選後李登輝將宣佈臺灣獨立，因而舉行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嚇阻。這是繼 1954 年金門「九三砲戰」和 1958 年「八二三砲戰」後，臺灣海峽發生的第三次「臺海危機」。

1996 年 3 月 8 日至 1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福建永安和南平飛彈部隊基地進行「聯合九六一」導彈射擊演習。發射四枚東風 15 導彈點火升空，越過臺灣海峽，分別落在高雄西南約 44 公里和基

隆東邊的目標海域。3月12日至20日，解放軍海、空部隊在東海與南海展開第二波實彈軍事演習。3月18日至25日，解放軍海、陸、空部隊展開第三波登陸聯合作戰演習，演習地點平潭島離臺灣的島嶼不足70海浬。

當時，解放軍甚至準備攻佔中華民國所控制的部分島嶼以恫嚇臺灣。1996年3月初，解放軍的「聯合九六一」演習計畫被劉連昆洩露給臺灣軍情局。劉連昆的情報顯示，如果選舉出現「最壞的結果」，「聯合九六一」軍事演習隨時可以改變成真正的軍事行動。當時臺灣軍情局獲得此一計畫後，李登輝立刻讓國安會與美國國安會溝通，並命令中華民國國軍提高警戒。

美國國安會在證實臺灣情報的準確性之後，認為中國的行動違反了美中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默契，臺中對峙有擦槍走火的風險。美國認為，中國的行動不僅威脅臺灣安全，也對美國國家利益和亞太區域和平造成重大的影響。美國時間1996年3月3日下午，美國總統柯林頓、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國防部長佩里、國家安全助理雷克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夏利卡席維利在白宮秘密討論臺海情勢。與會人士認為，中國的演習並非武力進攻臺灣的前奏，但美國不能輕視臺中之間有發生意外或錯估的真正危險。柯林頓說，臺海情勢就如一桶火藥，美國必須竭盡所能防止即將發生的浩劫。因此，柯林頓決定直接介入這場爭端，當場授權國防部派遣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駛往臺海巡弋。他又指示國安會立即與臺中雙方聯繫，要求雙方派特使來美當面磋商，以便對緊張局勢有效降溫。柯林頓政府決定同步對中國與臺灣展開「預防性」外交和軍事行動，遏阻解放軍軍事冒險，也防止國軍反應過度。

3月8日晚，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國防部長佩里、國家安全助理雷克三人同時會見趕到華府的中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華秋，劉華秋態度強硬，表示這次演習只是例行公事，美國不應過度反應。而美方指出，飛彈落在臺灣南北兩端，使解放軍能確定射程，隨後能命中臺島的任何目標，這絕不是一般演習。美方警告劉華秋，如果飛彈試射不停止，美國會有所行動；如果臺灣遭到攻擊，將有嚴重後果。但是，中國不理會美國的警告，接着宣佈了更多海上及空中演習計畫，並且禁止所有船隻接近臺灣海峽。影響所至，臺灣民眾開始恐慌，股市暴跌，國軍進入最高警戒，隨時準備報復中國的攻擊。

自此之後，美國的態度轉趨強硬，美國總統柯林頓、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國防部長佩里等人紛紛發表談話，對解放軍演習表示「嚴重關注」，譴責中國演習是「草率和冒險的」，是「不負責任的行動」。3月8日當天，柯林頓政府派遣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自日本部署到臺灣東北海域，為避免中國誤判美國的決心，3月11日美國又加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從中東趕往臺灣東部海域，預定與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會合。美國同時動員媒體飛到獨立號航空母艦上作報導，美軍透過國際媒體，公開向解放軍炫耀武力，起到了震撼性威懾作用，也極大地提振了臺灣人民的信心。但是，美軍克制地避開中國為演習公佈的海上禁止區。

中國對美國壓倒性武力示威大為錯愕，解放軍潛艇部隊緊急全部出海抗衡，中美兩軍實質上形成對峙局面，雙方劍拔弩張。幾天後，中國政府開始退卻，3月12日，中國宣佈飛彈試射已完成，實際上，中國發射的飛彈比它原先計劃的少了一半。同時，由於臺灣掌握情況和美國的介入，解放軍被迫修改演習計畫，改採「三不原則」，即一、發射飛彈不會飛越臺灣本島上空，二、海軍空軍不超越臺灣海峽中線，三、即使舉行登陸演習，不會實際去占領臺灣的島嶼。解放軍在演習時發射了飛彈，但沒有使用實彈的彈頭。中國發射飛彈後，李登輝為安撫臺灣民心，公開宣講中國發射的是「空包彈」、「啞巴彈」，引起中國反間諜部門的注意。1996年3月23日，李登輝高票當選總統，中國政治目的落空，因而提前兩天結束了軍事演習，美國航空母艦隨後駛離臺海。

與此同時，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悄悄地準備顧問和愛國者飛彈，一旦中國進攻，即可投入臺灣協防。美國國家安全副助理伯格又在3月5日打電話給臺灣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要求他立即來美國面談。這是美臺斷交後，美國國安會最高級別的主動聯繫。雙方經過幾天交涉，丁懋時才於3月11日趕到紐約，與伯格進行了5個小時的秘密會談。伯格告訴丁懋時，美國已經向臺灣海域派遣航母並嚴厲警告了中國，他要求臺灣不要輕舉妄動，美國這樣做並不是給臺灣開空白支票，臺灣不可以為所欲為。雙方集中討論了臺灣大選後李登輝的兩岸政策走向，美方希望臺灣在選後能盡快恢復兩岸對話。伯格表示，基於「一個中國」政策，美國不能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等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組織，他也要求臺灣在1996年一整年都不要推動政府高層訪美。1996年的臺海危機成了美臺外交關係的轉機，柯林頓批准美臺國安高層建立經常性的戰略對話，成為美臺固定的官方溝通機制，這是中國發動軍事演習時沒有預料到的後果。

在臺中美三方臺面下的一連串外交溝通後，1996年5月20日，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的『臺獨』路線」。他表示願意訪問中國，從事和平之旅。中國副總理錢其琛第二天公開回應「對臺灣當局，我們現在是聽其言，觀其行」。

1996年3月，美國同時派出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圍繞臺灣海峽，這是1979年美中建交後美國對中國的第一次軍事威脅動作，體現了美中關係的危機。美國的行為也大大降低了以往美國是否會在中國進攻時協防臺灣的政策模糊性。面對美國的軍事優勢，中國被迫退卻。此後二十年，中國奮起直追，大力發展海空軍力，企圖最終在西太平洋挑戰美國霸權。1996年臺海危機也反映了當時中國領導人對臺灣民意的誤判，導致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宣傳攻勢的破產。遺憾的是，臺灣領導人在民意推動下的短線政治行為，中國領導人習慣性寧左勿右的過度反應，與美國干預程度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穩定的臺中美三角關係通常會因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內部政治局勢的變化而演變成危機，並且不斷重複。

2017年1月11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闡述中國在習近平

主席領導下的安全合作政策。中國政府認為，中美合作對亞太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即使是超級大國，一個大國也維持不了亞太安全」。臺海危機二十年後，中國不再容忍美國獨霸，要與美國分享亞太警察角色，現在就看美國川普新政府如何接招了。

六、 中文學校（上）：ABC 成長的煩惱

<https://cn.nystyle.com/education-career/20161018/chinese-class-usa1/zh-hant/>

作者：林嘉燕（中裔美國人）

我大學第一堂中文課，老師問了一個讓我念念不忘的問題：「告訴我，華裔在美國受歧視嗎？」

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上一個專門給華裔設計的班，學生都是 ABC（即美國出生的華人）。我們八點鐘來上課，還在半夢半醒狀態中。有的學生在啃麵包，有的趴在課桌上，但我們差不多都搖頭表示否認。

老師笑了。「嗯，我知道，你們從小就學到美國是個平等的地方。當你是一位學生，這可能是真的，但一到你畢業了，開始工作，就會發現你還是受歧視。所以你必須學中文，以便人家欺負你的時候還有另一半身份可以給你自我把握。你這樣才有一個完整的身份。」

這位來自大陸的老師敢第一天說這麼嚴肅的話，我們都吃驚了。當時我才上大二，感覺老師解釋的情況離我很遙遠——不過從一開始我就對我的中文班格外注意，一部分是因為我中文老師的觀點跟其他老師確實不一樣，一部分是因為學中文曾經是我最恨的活動。

同學們分幫結派

回到我的童年。跟中文的關係一直是我生活中最複雜的關係，因為它反映了我跟父母在價值觀上的衝突；我對中國的認同感，隨著我的成長經歷也一直在變。我的父母 1983 年從北京移民到加州灣區，1993 年我在加州出生，後來祖父母也從北京移民到美國幫助照顧我。小時候，我們在家說的語言是中文。我正式學了八年中文，也可以說我非正式地在家裡學了二十幾年的中文，但在每一個時段，我的情緒都不一樣。

我上的第一個中文學校是一位台灣老師辦的。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天下課以後我和另外兩位女同學、三位男同學會站在路邊，等著一位師傅開麵包車接我們去這所學校。這所學校的廚房裡總是準備了一大鍋滷肉飯。吃完飯，老師每天會帶我們讀一篇新課文，然後輔導我們練習寫字。如果學生很快把字練好了，老師也會給我們數學題做；聰明的同學都會假裝做不完，然後趁老師不注意的時候在桌下玩兒掌上遊戲機。

我們中文學校的學生都是華裔孩子，家裡情況差不多——父母要上班，所以下課以後沒地方去。很多同學會參加小學的課後項目，但我媽看到這些孩子下課在外面玩兒，還吃糖果和方便麵，覺得浪費時間又不健康，在中文學校至少能學一點東西。

在那段時間，中文學校不只是我放學以後混時間的地方，它也是我們的小社交圈。不同小學來

的孩子會各自形成小團體，搶其他小學孩子的書包。我們也會按著父母的來源分幫結派，因為中文學校一半的同學父母是從台灣移民來的，一半是從大陸來的。在一起玩兒的時候，連小孩子也經常會爭吵海峽兩岸之間的矛盾，其中有一位叫賈森(Jason)的同學對這個話題尤其激動，後來上中學的時候不只是華裔同學，其他種族的同學也喜歡逗他說「賈森，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當時我不懂他為什麼這麼愛激動，覺得好玩兒——但實際上我們也不懂，只是在模仿父母在飯桌上的話。

在我所住的舊金山灣區，普通話的中文學校實際上不少，但父母還是選擇送我到這家台灣老師辦的學校，是因為灣區大多數的中文學校一週只開一次課，不像我當時的中文學校每天下午都有課有活動。令我父母覺得有意思的是，自己是大陸人，但孩子學的卻是繁體字。他們經常讓我朗誦注音符號，覺得好玩兒。

雖然學了跟父母不同的寫字系統，但中文學校對我的中文有很大的幫助。華裔孩子第一個語言通常是中文，因為是父母交流的語言，但一旦孩子開始接觸學校裡說的英文，跟朋友和老師都用英語交流，就會把英語當成主要語言，不再跟父母說中文了。在我認識的華裔中，很多父母也會用英語回答孩子。久而久之，很多華裔孩子的中文水平就會退步，有的孩子會完全忘記中文。我大多數的華裔朋友只會說幾句中文；在我家春節和感恩節聚會的時候，我的堂親聽不懂大人在飯桌上說的話。我自己九歲才開始只用英語跟父母交流，比其他孩子晚了幾年，正是由於課後中文學校的影響。

當時在家裡，我爸也會用英語回答我，但我媽一直堅持用中文跟我交流，甚至我們之間的談話也會很奇怪——兩人說兩種不同的語言，即使就這樣還是幫我保持了聽力和口語能力。小學時候，我還開始喜歡偷看我媽看的武俠電視劇，因為我喜歡那些大俠穿的衣服，比如女英雄輕飄的袖子。當時我媽可能以為看電視劇耽誤學習，但我認為這些電視劇實際上保持住了我的中文。

更重要的是我們住在一個華人多的社區。生活在灣區，即使我不主動鍛煉我的中文，也有機會學。在超市裡排隊交錢的時候，我會下意識地旁聽周圍夫妻的談話，在公園玩兒的時候也會聽到餵鴨子麵包的爺爺和奶奶在講中文。我放寒暑假都是姥姥和姥爺照顧我，他們英文不流利，所以我只能跟他們用中文交流。我八歲時候，爸爸回國搬到成都創業，從此以後我和媽媽每年夏天會探親一個月。在這些旅行中，我還是堅持只跟父母說英文，但在街上買冰棍和鹽酥雞就必須用上中文，跟隔壁住的孩子玩兒也都是說中文。我後來才發現這些看似隨意的經驗訓練了我理解不同方言和口音的能力。

我的夢魘

再大一點（差不多九歲時候），我開始參加課外活動，放學後要拉小提琴、彈鋼琴，還要去啦啦隊訓練，就沒時間每天學中文了。當時我父母跟許多華裔父母一樣，讓孩子從九歲或十歲開始參加對申請大學有利的課外活動，爭取讓孩子變得多才多藝。在這個邏輯下，華裔孩子會說中文沒什麼了不

起的，所以父母會把時間和關注放在別的活動上，最流行的是鋼琴等樂器。我開始忙碌起來，只好換到周末中文學校，每個星期天上兩小時課。

除了幾位我們當時羨慕又討厭的學霸，周末中文學校是每一位華裔初中生的恐懼：要犧牲我們的週日坐在教室裡，同時想到其他朋友正在家裡一起玩兒，感覺非常難過（有幾次我媽忘記了夏令時改成了標準時間，等我們開車到了中文學校，發現已經錯過了一半的課，我記得自己興奮死了）。周末中文學校的老師教課並不差，但是中文學校失去了之前的親密。小時候我的社交圈圍著中文學校轉，而到那個年齡我的朋友是通過少年樂隊與其他活動認識的，中文學校好像是那些書呆子周末沒事幹去的地方。

更關鍵的是，我當時認為學中文沒有意義。那會兒我有著典型的十來歲女孩的叛逆傾向，心想：畢竟我父母這麼努力移民來到美國，想要我在美國成功，為什麼又要讓我倒退學中文呢？過節的時候，許多來我們家的阿姨看到我不主動說中文，以為我不會，就對我媽說，「哎呀，你的孩子不會說中文，多可惜啊！」聽到這種話我就會翻白眼，等她走了之後對媽媽埋怨，「為什麼中國老太太總是覺得孩子必須會說中文？中文對我的日常生活沒有用，我也不會有一天搬到中國住……為什麼要學？」

在這段時間我參加了兩個不同的中文學校，都是兩位很有經驗的大陸老師開的。第一個在附近的高中，課程很輕鬆，大多數的孩子是來混時間的。第二個是灣區最認真的中文學校，一共分十個年級，我當時小學六年級進了七年級中文班，班上同學有初中學生、高中生，還有一位小學三年級的學霸，正在讀《西遊記》，每週上課都會帶著小說來給老師看，老師也讀她寫的文章給大家聽。

周末中文學校的老師大多數是其他學生的媽媽，業餘時間教中文。為了培養師生之間的感情，每半年學生升一級的時候，老師保持不變。我一直很怕我的老師，因為她教課很嚴，有幾次我沒有準備課文，她看出來了，讓我在全班面前朗誦唐詩，害得我在暗戀的男生面前非常不好意思。雖然很痛苦，我確實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七年級背唐詩，八年級開始學成語和《論語》，九年級是寫作班，十年級學毛筆字。這些項目其他中文學校都沒有，老師也反覆強調我們有這個機會很幸福。

學校還有一位白人男生，我們都覺得他很奇怪——畢竟那是 2006 年，在美國初等學校學習中文還不普遍，周末中文學校是一個華裔孩子傳承文化的工具，為什麼一位不是華裔的孩子會來學中文？我們開玩笑地問他父母是不是瘋了才把他這樣一個白人孩子送到這樣的「監獄」裡。幾年後我在一個網站上讀到一個那段時間留下來的評語，我猜是這位孩子的媽媽寫的。她最大的批評是我們的課程強調死記硬背，不是美國的「growth-oriented」（增長型）授課方法，而且課程假定孩子有很強的中國文化背景，其他背景的孩子很難理解課文，加上她自己不會中文，就輔導不了孩子做功課。

我媽一直在強調「有一天你會感謝我」，老師也一直強調「中國文化是你們的一部分，必須好好學」。但在年幼的我看來，生活在美國，我的中國背景對我弊大於利。有一天下中文課後坐在車裡，

我把書扔在地上，對媽媽說，「我不學了。」這句話我說過很多次，但這一次不一樣。這次說完後，我再也不肯翻開中文課本了。我媽怎麼勸我，都假裝聽不見。她沒辦法，就只好放棄了

七、 中文學校（下）：ABC 的自我鬥爭

<https://cn.nystyle.com/education-career/20161019/chinese-class-usa2/zh-hant/>

作者：林嘉燕（中裔美國人）

13 歲的時候，我放棄了周末中文課。在我那些從中國來的長輩看來，這個決定表明我就像許多同齡的華裔孩子一樣，不珍惜我的文化背景。後來我許多年都沒有學中文。在初中選外語的時候，我報名拉丁語，因為我對古羅馬的神話很感興趣。

沒想到幾年後，美國的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決定創建一個中文的 SAT 和 AP 考試。2008 年我上高一那一年，我的高中開始提供「一年級」中文班，每一年想再加一年級，一直到四年級 AP 考試班的位置。所以在我舊金山灣區的高中一共有五個語言項目：西班牙語、法語、日語、拉丁語和新加的中文。

雖然進入高中的時候有機會恢復我的中文教育，但我還是選擇了繼續學拉丁語，因為我們的項目最小，同學之間的關係很親密，我在初中已經交了很多朋友。新加的中文項目在我們校區的華人圈裡的确是好消息，因為這說明美國學制終於把中文放到眼裡了，承認了它的重要性。華裔孩子也不用再費周末時間學中文了，可以直接在高中學。不過新的中文項目也遭致意外的反感。

我高中的中文老師是一位白人，班上的學生大多數是華裔，很多人已經接受過中文教育，所以雖然他們登記了初級班，但水平要高於一年級。很多其他的同學和家長認為這些華裔沒出息，跟沒基礎的學生一起上課，口音又比老師好。他們說，你從來沒見過墨西哥裔的學生選擇西班牙語，這些華裔孩子是為了不費力得 A 才選中文。

當時，ABC 中只有少部分人參加了中文項目，但他們佔了中文班的大多數。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有的華裔確實是想不費力得 A，他們以後打算學理科，認為外語對以後的工作沒用。但也有一些華裔從小到大都跟父母說的是英文，沒有上過周末中文學校。這兩群人被混到了一起，那位白人老師中文水平還是很高的（儘管她口音有問題）。她以前是我們學校的歷史老師，為了發展我們學校的中文項目爭取了很多年，她教課很有激情。

高三申請大學的時候，我媽熱情鼓勵我參加中文的 AP 和 SAT 考試，但我死活不願意。華裔孩子已經有一個不好的名聲——為了進好大學，我們什麼都願意做，有的父母願意付過高的費用「包裝」孩子的申請材料，實際上很多是僱人把孩子的申請書重新寫一遍。

這一切使我更加拒絕中國文化，因為我不想給人家這樣的印象。在這時候，最大的壓力來自其他華裔學生。在我的高中裡，非白人的孩子佔大多數，但大家承擔的壓力是一樣的：你的行為越像你的母國，就越受欺負。比方說，如果你拍照時候用手指做一個 V 字形，或者梳兩個辮子上學，其他

的孩子就會笑話你。(初中七年級的時候，我跟媽媽到中國旅遊，剪了一個當時在亞洲很流行的髮型，我回家哭了，因為怕被其他同學欺負，那整個學期都把頭髮梳成辮子以免人家看見)我們好像爭著誰最「美國化」。

回頭看，當時有很大的誤解，因為華裔孩子學中文實際上也是很不容易的，考過 AP 考試應該表揚才對，而不是看不起。我能理解在外人眼裡，學自己父母的語言沒有什麼了不起。許多華裔孩子本來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學中文，但由於壓力而錯過了。

陌生的中國

離家上大學，一切突然安靜下來了。

我上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離老家開車要一小時多一點，所以我只在過節時候回家。沒有人在背後追，我終於鬆開手把老家的華人圈子丟下了。大學一年級我想都沒有想過中文，恨不得忘了我有這個文化背景。我沒有主動找華裔交朋友。我的專業是心理學。有時候在校園裡我會遇到中國留學生，但他們的聲音對我來說只是遠處的回聲而已。這是我多年渴望的釋放。

又過了一年，我暑假參加了一個科幻創意寫作班，其中一位同學寫了一篇發生在上海的短故事。

在故事中，主人公在一條裡弄裡躲雨。這是一座急速現代化的都市，混亂中充滿了生機。這裡有摩天大廈和穿著西裝的銀行家，也有民工和藏匿於街景一隅的寺廟。

以前，我從沒有把中文課本裡的中國當成一個立體的地方，它只是一篇文字——沒完沒了的生詞、成語和一些喝醉酒的老頭子看月亮——的註腳。我也陪父母去過中國的很多地方，但我沒有把事實的「中國」從我對中文教育的反感分開。當擯棄我先入為主的觀念，從一個外人的角度看望中國，我發現自己對故事中的繁雜街景和快速現代化很有興趣，不敢相信這跟中文課本裡描述的是同一個國家，於是想做更多的了解。

接下來，我讀了一些關注中國的介紹，看了一些照片，發現中國實際上對我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幾天後，我給我媽打了一個電話，「我下學期要報名中文課。」

她以為出了什麼事，著急地問：「怎麼回事？你怎麼了？」

我也沒多解釋，掛了電話就開始瀏覽我大學提供的中文課。

因為我不是初級學生，又是華裔，學校要求我在網上先完成一個分班測驗。考試的指示說，如果我不知道答案就應該把那道題跳過去，這樣才能得出最準的結果，但上了這麼多年的中文課還不會好多題，我覺得很丟臉，就還是猜了很多。奇怪的是，我發現自己的閱讀和寫作退步了不少，但聽力還不錯，測試時沒有猜答案，結果近乎滿分。老師之後通知我，我被分到大學三年級的華裔班，這是專門給我這樣背景的學生設計的。

第二代移民通常已經接觸過父母的語言，尤其在口語方面，所以語法和發音沒有問題，但許多初級語言班把時間集中在這兩方面上。因此，這些第二代移民孩子感覺傳統語言課不夠難，但同時它們書寫能力確實是初級水平。參加大學語言班的第二代移民孩子越來越多，有的美國大學開始把兩群學生分開：沒有背景的學生參加普通語言班，已經有背景的學生參加專門設計的 heritage (繼承語) 班。一個大學提供哪些課在於它的學生人數。美國大學最流行的外語是西班牙語，所以南美後代多的大學一般會提供西班牙語的繼承語班。選擇中文的學生少一些，但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等因素使得中文受到高度重視，提供中文繼承語班的學校在增加。華裔多的大學一般都有華裔班。

從我 13 歲放棄中文到大學第一堂中文課之間，隔著七年的時間。大二第一天早上八點走進中文課教室，大家都覺得有一點奇怪，因為周圍只有 ABC，這是一個美國大學平時見不著的現象。

我的老師姓宋，10 多年前移民到了美國，在伯克利拿到亞洲學碩士，自己有個上初中的女兒，所以很理解我們的想法。老師站在我們面前，她笑了一下，告訴了我們，「我以前是周末中文學校的老師。我知道你們以前都上過周末中文學校。我不喜歡教周末中文學校的課，因為那時你們不想學，都是父母逼你們去的，是吧？所以我辭職了。現在你們長大了，自己選擇坐在這個教室裡。你們現在改變了想法，感覺中文對你重要了，所以我很高興教你們。」

班上的學生開始偷偷地笑，教室裡的緊張氣氛馬上消失了。結果從第一天開始，那個教室裡的氣氛就跟我其他課不一樣。我感覺我跟中文班上的同學有一個特殊的關係，因為雖然我們都是不同的專業，父母來自大陸、台灣不同的地方，但我們背後攢了一套共同的學中文經歷。

我們的中文老師在我們大學生活中佔了一個特殊的位置。我華裔班三年級的老師經常開玩笑說，「我最喜歡教華裔班，因為我總是感覺你們把我當作你們的媽媽。我是不是長得跟你們的媽媽很像！」過年時，我們在美國大學沒有機會回家，都是中文老師給我們帶巧克力元寶吃，她知道大學孩子不吃早飯，有時會喂我們吃甜甜圈油炸圈餅。她還會跟我們聊她女兒成長的煩惱，問我們的建議。

華裔班上的同學變成了我大學最好的一些朋友。課後我們會集合在教室外面聊小時候的經歷：我們在中文學校最恨的小學霸；被鋼琴老師痛罵的經歷；還有姥姥空手打牆上蒼蠅的回憶。也是這些朋友，期末考試後一起到奧克蘭的唐人街喝酒唱 KTV，時不時請老師吃中國餐館和雪糕。我二大的春季學期，我們中文班的同學請老師到我們最喜歡的中國餐館，她對我們解釋，「哎呀，美國人的習慣是孩子們先讓長輩吃，但在中國文化是長輩要照顧你們，所以你們別讓我先吃。你們先吃。」

我們華裔班的課文都是關於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典型性差異，比如中國人不喜歡欠債，但美國人喜歡用信用卡，感覺信用分數高的人更可靠；或者許多美國人錯誤地以為唐人街是一個中國的小模型，但實際上今天的唐人街更類似 60 年代的香港。課文裡再一個令人難忘的話題是雙語教育。那次考試老師放了一個錄影帶，介紹一位媽媽在談異族婚姻和孩子語言教育的交叉；她總結了一個辦

法，就是自己堅持對孩子說中文，這樣丈夫也沒有機會在飯桌上參與她和孩子的談話，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女兒的中文。

這些話題對我很有意義，因為我也注意到了這些矛盾或差異，但沒人對我解釋過。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我每次跟親戚吃飯，我媽會假裝上洗手間，然後跑到前台掏錢包，接著全家追在後面搶她手裡拿的賬單，周圍的老外很迷茫地看著我們。

到了春學期，我們班有了新的老師——張老師，她年輕時候在中國是一名德語老師。她上課第一天介紹文化大革命時，講到她被派到德國做調查，得到特殊旅行權利離開中國。「我想讓你看我當時寫的筆記，」她對我們說，然後在白板上投射她當時拍的照片、寫的散文。在照片中，她拍了許多柏林街頭染了頭髮、穿著皮夾克的龐克，旁邊寫著，「好不文明，這是因為他們太自由了。」回想起當時的想法，她笑著說，「你看，有意思吧？」

我們發現張老師的價值觀是多面的，她那一代和我們年輕一代之間的距離很遠，經常會有摩擦，必須通過交流才能彼此理解。比如有一次她解釋她女兒的英文名字是她中文名字的拼音。在學校受同學欺負，她回家求媽媽起個英文名字，但我老師不同意，說「中文是姓名普遍，個人名字特製，英語是姓名特製，各人名字普遍，你又有個普遍的姓名，又有個普遍的個人名字，那你的獨特性就沒了。你應該對你的名字很自豪，不準訴苦。」而我作為在美國受過欺負的孩子，很同情她的女兒，我們大多數都有英文名字，感覺雖然在理想社會中你什麼名字都能有，美國還是有些方面不平等，孩子有中文名字會遭受同學的欺負和更多的種族成見，所以最好起個英文名字，然後用中文名字作為中間名。

我們課上討論的話題都很雜。其中有：你長大了，會按中國的習俗養你的父母，還是分開住？你把成功還是高興作為生活目的？畢業後想追求什麼事業，父母支持不支持？這些內容表明，設計華裔班課程的老師明白中文在第二代孩子的生活中不只是一個語言，它還關係到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忽略這個文化方面而光教字母和語法是永遠不夠的。

雖然這幾年，中文課是我大學裡最喜歡的課，但我記得我周末中文學校老師說的話：如果當時不抓緊，以後不會再有那麼地道的課程了。她說的太對了。大學的中文課不會每一個字都教筆順。我那麼多年沒有接觸中文，很多字的筆順是亂猜的，到現在還不清楚到底怎麼寫。大學的課程也沒有朗誦唐詩、毛筆字或創意寫作的項目。

華裔班跟非華裔班之間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於我們課程會減少語法的教學，想當然地認為我們發音和口語沒有問題，課文內容也會不一樣。我七年沒有練習中文，最大的困難是雖然可以背某一篇課文裡的生字，到了考試，發現生字都記住了，但單詞往往不會寫，必須用拼音補充，結果還是丟了好多分。因為華裔班的學生有的父母來自大陸，有的來自台灣，我們的課文單周是簡體字，雙周是繁體字，考試也是簡繁輪換。我簡體字更強，所以考繁體字的成績會差一點，輪到簡體字分數會高一點，

台灣裔學生則相反。

不過，華裔和非華裔之間的界線並不嚴格：這兩個課程之間的分別是為了給學生提供更合適的選擇，而不是按孩子的種族把他們分開。我「華三」班秋季學期有一位韓國留學生，他高中在上海讀的，所以中文很強；春季學期有一位 27 歲的法學院學生，雖然是白種人，但他在北京工作了三年，上我們班目的是為了複習以前學的中文。我還有一位朋友是第三代華裔，父母不會講中文，所以她上的是非華裔班。

複雜的命運

一直到今天，我總會想起媽媽當時提醒我的那句話：「你有一天會感謝我。」確實，這是許多華裔孩子的人生聖歌。我們不理解為什麼要學樂器，為什麼要上中文學校，只有父母的保證，「你有一天會感謝我。」

我 10 歲時，每週六必須六點鐘起床上鋼琴課，我半閉著眼睛對媽媽說，「我現在一點都不感謝你。」13 歲上中文課快要寂寞死了，也是同一句話，「我現在還是不感謝你。」甚至 16 歲被小提琴老師罵哭時，也是這一句：「我真的現在不感謝你。」

但是，當我在北京做了一年交換回來之後，終於看清了——我非常、非常感謝媽媽給我機會學這麼多東西，尤其是中文，因為這些經驗給了我一個技能組合，使我全面發展。我覺得很奇妙——我曾經很努力地拒絕中國文化，但後來長大了，投入學習中文，最後還把專業改成了比較文學，這樣我可以同時研究美國和中國的文化。今年六月我已大學畢業。

同時呢，我也理解我的一些朋友，還有其他華裔，現在也不感謝父母逼他們學中文，認為自己的童年浪費在沒興趣的活動上很可惜。這些人找到了其他感興趣的愛好，決定不需要中文，他們也都沒有錯。華裔想在美國成功、幸福，確實可以一點中文不需要，哪怕它會越來越有用。畢業之前，在大學的新生日(New Admit Day)，我代表比較文學本科系招待未來的學生，其中有一位媽媽給我介紹她的女兒，說她未來想當作家，自己最大的快樂就是陪著她改文章，聽到這裡令我心有戚戚焉。近來，我經常不由自主地沉思，如果我當時把時間花在自己喜歡的愛好上（寫作、跳舞），而不是父母替我選的活動（鋼琴、小提琴、中文學校），我今天是不是會更優秀，會更多地感謝媽媽。

我還記得華裔中文班的宋老師在第一堂課上還說了一句話：「華裔的命運是最複雜的，因為你活著活著會發現，你又不是美國人，又不是中國人。」

在這個邏輯下，我們迷失在兩個身份之間，找不到路，而我們學中文的目的是為了救自己。

但我寧肯想，現在一定程度上把中文學好了，我本人就具備了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離開大學的校門，我不再生活在一個單面的世界裡。我可以看中文的小說，讀中文的新聞，想問題時候

不只是從美國人的角度考慮，也從中國人的角度想。之前我很倔強地主張美國人的價值觀，現在我願意退一步考慮跟我不一樣的想法，至少爭取理解它。這些我每天都在感謝。

八、國家與華僑：讀《一線之遙——亞洲黑戶越界拚搏紀實》

<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83324>

作者：邱依虹（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博士）

花了好長的時間細讀由「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所企劃的《一線之遙——亞洲黑戶越界拚搏紀實》，過程當中百感交集。每一則故事都歷歷在目，深深感動了我。我邊讀邊為故事的主人翁，擔心害怕難過無奈，也一邊對照著自己身為新加坡華人，卻三十多年來已變成地球人的處境。不管去到哪裡都不是自己的家，常年寄人籬下的生活，已在我的身心靈累積成了無法解說，更無法解脫之莫名的不安和焦慮。我對於書中的無國籍者，逾期逗留的爸爸媽媽，滯留台灣的外勞和政治難民，他們如何一再地被主流社會標籤為「非法」是感同身受的。

我一直都很反對用「非法」這兩個字來形容他們。畢竟大家都是有父有母的，都在同一個星球出生長大，那有什麼所謂的「合法」或「非法」呢？活生生的一個人，同樣有腦袋，有感情，有手有腳，又怎麼能夠是「非法」呢？難道一國的法律，政客的政策就足以否定了一個人存活的正當性嗎？

先有國才有家，還是先有家才有國的概念，是不適合用於在國際間夾縫中求生存的移工、移民、難民和在地無身份者的。因為（我）他們的身份是取決於國家機器的給予，國家法則與政策的認同。當（我）他們為了生活，理想和愛情而遷移時，便立刻要面對到各個國與國之間的差異。跨國越界的移動要跨越的何止是山山水水？移動的人要克服的是國界，邊界所隱含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那錯縱複雜的張力。那怕只是游過一條河，跨過一座山，走過一個村落，避過一個警察臨檢站或通過重重設防的機場和海關，同一個人，身份卻驟然因為跨越邊境而改變了。別人看你的眼光不同了，被對待的態度也不一樣了。接著命運也就必然被改變。這個轉變時而無可奈何，時而卻是自己積極盤算過後，作出的選擇而造成的。

每一篇黑戶的故事都承載了多重複雜，難以紓解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壓力。他們和一般無需離鄉背井的人不一樣的地方是，後者的國籍和法律身份不會被質疑或甚至被否定。可是這一群移動的人即使是在自己的國家也會被看之為「他者」即「僑客」的可能。書中的他們絕大多數，無論是來自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或泰緬邊境，都是在台灣滯留的「華僑」。

「華僑」這個身份的標籤涵蓋了幾個世紀以來，華人在世界各地，為了避戰亂，找溫飽而移動的血淚史。在亞洲，從國共兩黨之爭到日本戰敗後的國共分裂，從五十年代的南北韓戰爭到五、六十年代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國家獨立鬥爭，甚至到了七十年代的南北越戰爭，「華僑」不但經歷了戰亂所帶來的流離失所，其身份和遭遇往往因為時局及國家政策的驟變，而遭受到超出個人能力所可以主宰的變遷。又因為「華僑」在他鄉總是屬於少數，能夠現身說話以及為自己爭取權利的力量更為薄

弱。因此「華僑」社群爲了生存，早就練就了一身隱形於大眾社會的本領，不沾政治，不過問政府政策，一心只想埋首苦幹把自己和家庭的經濟照顧好。無非是爲了讓下一代能夠在異鄉紮根發展，穩定生活甚至致富，以脫離早年在中國大陸貧窮的困窘或是政治的壓迫。然而，中國大陸雖是祖先之來源地，隨著世代在異鄉的被同化，卻也就對所謂的祖國越來越陌生。

「華僑」遍佈亞洲各地：從印度到孟加拉，從緬甸，越南，柬埔寨，老撾（寮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到菲律賓，也從台灣，日本到韓國。有些地方，他們得以保存了自己的文化習俗，甚至語言和教育，但在其他地方由於不同的歷史，政治，甚至宗教的因素，被迫改名改姓，甚至放棄自己的語言，完全融入在地的社會和文化。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境，不一樣的政府和政策下，就會醞釀出不同面貌的「華僑」。不懂中文的華僑或華人在東南亞比比皆是。但是不管他們如何融入當地的社會，他們那「僑」的身份在在地人的眼中始終是改不了。

另一個不變的是（我）他們的移民／移工的身份和歷代變遷的命運。這個命運，在當今後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底下，更為顯著。在國界還稍為模糊的時代，移遷並不一定會影響一個人的身份和國籍，因為越境跨界並不一定需要仰賴一張紙或一本護照。所以早期的「華僑」得以自由來去。例如在泰國邊境結婚懷孕，待臨盆之際又返鄉到中國廣西那一邊把小孩生下來。或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出生，卻選擇到中國或台灣就學的僑生。也曾經有過明明是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出世長大的華人，卻因為參加共產黨要推翻英國殖民政府被硬生生地「遣返」中國——一個他們從未涉足而又陌生的國家。

自亞洲各國被強權國家殖民後，「華僑」的移動就緊緊地被殖民宗主國的政策拴住。不論是要返鄉或是要定居於他鄉，都視乎殖民政府基於當下自身利益的考量。要嘛就利用「華僑」來分化在地的群眾。二是利用「華僑」來壓制在地人的經濟或政治空間。再不然就索性利用「華僑」為少數異族的身分，加以煽動排華的熱潮，以便轉移人民的視線。「華僑」當中雖也有成為在地社會的經濟權貴之天之驕子，例如在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二次大戰前的緬甸都有因為和殖民政權合作而變富裕的華人。而絕大多數在東南亞的華僑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是當年被賣豬仔般地，被半騙半拐來到南洋當苦力的。

在國共兩黨相爭的冷戰時空底下，「華僑」這個身份又多了一層複雜的政治意義。這其中的奧妙，書中也略有介紹。說白了，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爲了鞏固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的正當性，把全世界在台灣境外的華人都納入為台灣的「華僑」。可是時過境遷，「華僑」作為海峽兩岸的政治籌碼，也隨著二十世紀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台灣的解嚴和民主化而逐漸失去它的作用。緊接著的全球化更促進了全球勞動力的大量移動，也加劇了台灣從東南亞各地吸收外勞和外配的趨勢。

2000年，我到台灣工作一年。當時我領到的證件上就註明我是「華僑」。我當時除了百般不解

之外，心裡是老大不舒服的。我明明是新加坡公民，而且新加坡還是個獨立國家，為什麼台灣政府偏偏把我標籤為以台灣為中心的僑人？這是國家機器強加在移民、移工身上的權威性，是很不對等的關係，單是這一張紙就決定了我接下來在台灣一年的自我認同和想像。這正是這本書所記載在台灣，因為種種原因而被迫流亡或滯留的無國籍，無合法身份的移民及移工的處境。人還是昨天的那個人，可是今天卻因為政策改變了，就立刻被看成不一樣。一個人的價值竟然可以隨著那一張身份證明的改變而改變。命運也就因此而不一樣了。如果一夜之間失去了身份的證明，人也就突然從合法變為非法。活生生的一個人，接著就被逼淪為幽靈，日夜驚慌，擔心被抓或被遣送出境，終日在焦慮害怕中苟且偷生。甚至連親密的關係都不敢或不能要。大膽一點的，也許就狠下心來賭一把，搏一搏，不願放棄要有一個家的本能。但是這下子，國家機器就會直撲過來，張牙舞爪地搞到人不得安寧，更可能被弄得家破人亡。有家回不得，想愛不能愛，有手有腳卻糊不了口，終日把自己關在活牢裡。那是煎熬。

「華僑」的祖輩早期冒生命之險下南洋，當時多是沒有什麼公家認可的身份護照。甚至是後來當了「華僑」之後，比較幸運的被在地的政府配給了身份，成為獨立國家的公民。比較不幸的，可能因為經濟或政治的種種原因，而被剝奪身份，永遠翻不了身。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紀，這些老「華僑」的後代到了台灣，竟然還得承受同樣不公平的對待。著名的印尼作家 Pramoedya Ananta Toer 就說過一句話：「人出生在哪個地方都純屬偶然」但是那一張標籤人從哪裡來又可以在哪裡待的紙，卻是何其重要。它足以主宰一個人的死活。人是有血有肉的，國籍卻是一個隨時可能改變的概念。國界，本來就是一個虛構無存，被想像出來後，再造就出來的實體。它會隨著各種形勢而消失，擴大或縮小。它是被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的結構與權力強加在人身上的異體。它是被建構成實質的界之後，才人為地被賦予正當性。膽敢跨國越界，以自己的身體和生命來挑戰這個人為的國家界限，就得付出莫大的代價。有人就此喪失了生命，有人從此失去了幸福和家園，也有人因此而失智失常。而對於身為華族遊子來說，什麼時候被稱之為「華人」，什麼時候被看待為「華僑」，都深深地影響著（我）他們的生命

九、 本省人篇：從《宮前町九十番地》見證東亞的台灣

編號	主題	引文	頁碼
1.	台灣在東亞地位的轉變	「台灣民主化」的價值，在 1980 年起的二十年是比較容易認同的，也會讓在海外的人有衝勁，不顧一切地奮身前衝。但 2000 年之後就是認同等都逐漸比較困難的時代，要有如張超英的神力不可能的同時，要單純的衝刺也不容易。1980 年代起到亞洲經濟危機止，經濟看好的台灣在亞洲的發言權也很大，或許也助長了台灣各種國際宣傳工作的聲勢，亦即那時的台灣說話可以比現在大聲多了，或許也有時代幫了張超英一把的小因素存在吧！	P50, 一， 5
2.	日本時代中華民國領事館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我老家的舊址，即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水泥公司的對面，占地一千多坪。這個地址在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特殊意義。日本時代，我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元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台領事館，他的本意是「能讓自家屋頂上飄著中華民國國旗」，不亦樂乎。當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是二等國民，滿腹的壓抑，能看到「祖國」的國旗在自家飄揚，不免也是一種紓解。	P52, 一， 1
3.	中國革命勿忘台灣	家父學生時代(1920 年代)靠著在台灣祖父無限制的經濟支援，致力於反日運動，在廣州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並出版《台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勿忘台灣」。這一群學生夢想著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台灣人脫離日本統治，現在看來真是「頭殼壞掉了」。更諷刺的是，二二八事件不久，家父也與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一樣遭受國民逮捕，在死刑前獲救，夢碎也心碎。	P52, 四， 1
4.	毛人鳳借住地	二次大戰後，國共鬥爭，蔣介石節節敗退，他手下的情報首腦毛人鳳奉命先來台灣布署，毛人鳳的落腳地也是我家。	P53, 二， 1
5.	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立場	記得 2000 年那次選舉前，我公開發表「同時支持李登輝與宋楚瑜，對我來說並不矛盾」引起很大議論。其實，我的信念只有一個，凡是為自由、民主、公益理念而奮鬥的人，我都會無條件支持。可惜 2000 年以後，兩人都偏離了這個理念，使我無法接受。	P54, 二， 1
6.	板橋林家的中國人脈	1895 到 1945 年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林熊徵一直是板橋林家的代表人。板橋林家跨清治和日本兩代，都是台灣的最大地主家族。兩代統	P60, 三， 1

		治者都對林家萬分禮遇，林熊徵集富貴於一身，在日本時代就當過地位崇高的總督府評議員。1920 年代，大正天皇的宮內御宴，只有三個台灣人穿燕尾服、帶大禮帽獲邀，林熊徵又是其中一個。 1919 年，林熊徵發起創辦了華南銀行。現任華南銀行董事長林明成正是林熊徵和日籍夫人所生的獨子。林熊徵的元配盛關頤則是中國人，來頭不小，人稱盛五小姐，他爸爸是清末的鐵路大臣盛宣懷。盛五小姐從小就念英文，家教老師則是蔣介石太太蔣宋美齡的姊姊宋靄齡。盛五小姐婚後在上海的秘書則是前副總統連戰的姑丈林伯奏，林伯奏因此當過戰後第一任華銀總經理。	
7.	礦業起家	我家的礦場主要在景美，舊稱「十六份」的地區，總共有「永豐」、「朝日」、「德豐」三處礦區。運氣不錯，曾挖掘到一處很厚的礦層，祖父隨之大有錢起來。根據日治昭和時代的名人錄台灣人士鑑所寫，祖父的事業除了和日本帝國製糖公司、台灣電力公司、淺野水泥(戰後併入台灣水泥)、台糖、專賣局、台北醫院等二十幾家大公司機構座煤炭買賣外，還到香港、廈門、上海、廣州各地經營煤炭進出口生意。祖父在煤礦界具有大老地位，戰前和戰後初期都一樣；日治時代是煤商公會「台灣石炭商組合」的幹事(相當理事)，戰後初期是台灣省煤炭工業同業公會的常務理事。	P66, 二, 1
8.	日本時代台灣出版業狀況	西川純曾任台北市會議員，又在北台灣的雙溪地區擁有武丹坑煤礦。但他的歷史名氣恐怕不及兒子西川滿。西川滿寫小說，也寫詩，於1940 年創辦《文藝台灣》，儼然文壇重鎮，談日治後期文學，不可能不談西川滿。前輩小說家葉石濤當時投稿到文藝台灣，西川滿眼睛一亮，找他去當助理編輯。葉石濤後來回憶說，西川滿因為家裡有錢，才辦了雜誌。也因家庭背景，天生貴族氣質，夏天穿麻料白西裝，英俊瀟灑。	P70, 四, 1
9.	台灣人血統論	祖父長得白皙，幾乎就是白人皮膚。他的五官輪廓也深，有張側面照，看起來彷彿美國前總統杜魯門。	P72, 三, 1
10.	世界的台灣	那個時代，台灣的國際化超過一般想像。自清末以來，台灣和香港、廈門等地就有商業往來，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更有各種輪船，把歐美的啤酒、麵粉、火柴、水泥帶進台灣。	P75, 三, 1

大亞之國讀本

11.	台灣抗日的在地性	父親和友人隨後把高昂的情緒化作行動，搞起組織。他糾集林文騰、李友邦、張深切、郭德金等多人組成「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進而擴充為「台灣革命青年團」……他們還編印了機關雜誌《台灣先鋒》。	P77, 三, 1
12.	全球化台灣搶灘國際聯盟成功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成功把電報拍出去，不會被電報局發現內容是對台灣總督府的控訴。父親又現了一個非常機制的辦法。他告訴蔣渭水，台北郵便總局每天收電報到晚上八點，可以七點五十五分去，那時局長老早下班，複雜打電報的人不懂英文，缺乏政治意識，比較容易偷渡成功。前幾年，我才聽蔣渭水的大兒子蔣松輝告訴我，他那時以十七歲，那天去拍電報的人正是他。	P82, 五, 1
13.	祖國情的意義和演變	把自家房舍近乎無償租給中國駐台外交官，父親曾在回憶文字裡表達了他那一輩人對「祖國」的熱情。他說：「我想在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的住宅屋頂可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台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欣幸！」只不過，欣幸有之，困擾也隨之而來。日本警局密探常去「訪問」他，他往來的朋友經常被查問，他的行蹤也一直遭到監視。	P86, 二, 1
14.	汪精衛政府台北領事館	1940 年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外交部仍然選擇我家庭園房舍做台北總領事館。汪精衛和他的政府官員在戰爭結束那剎那，頓時變成漢奸，台北總領事館的外交官也未倖免。	P88, 二, 1
15.	台灣資本家的共產恐懼	和毛人鳳住在同一院子裡，帶給我家重大的影響。毛人鳳坦白告訴祖父說：「張先生，我們有準備船在宜蘭。」意思是說，萬一有事，他們會馬上跑掉，你們也準備跑吧！國民政府那時在中國已兵敗如山倒，台灣的情勢因後來 1950 年六月因爆發韓戰，美軍進駐台灣，才趨穩定。在韓戰之前，台灣的國際局勢可以說處於飄搖之中。我家算是比較早收知不良訊息的台灣人，祖父擔憂家裡做煤礦生意，是一個大資本家，共產黨一來，恐怕不僅財產充公，全家性命也難保，所以 1950 年初把台灣主要資產礦場全部賣掉，移居香港。事後想起來，真不知道當時早知道消息是福還是禍。	P89, 四, 1
16.	紀州庵屋形	印象中，小時候的休閒旅遊不少跟教會有關。我們和教會的人最常去	P105, 一,

	船	新店溪坐船釣魚，搭「屋形船」。這種傳統日式船現在日本各觀光河川上，還常可看見。像東京淺草的柳橋一帶，就停有各色的屋形船。台灣夏天午後有西北雨，冬天有毛毛雨，不下雨的季節，常又豔陽高照。這種有屋頂的船，擋雨遮陽，增添河上垂釣行船的樂趣。那時，新店溪裡到處有香魚。釣起來後，船家會負責烤魚給乘客享用。然後，慢慢划船，順流而下，可抵達艋舺。整個活動非常悠哉，加上平常因事業忙，少到教會禮拜的祖父都不會缺席，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1
17.	太平歲月的文化教養	回想起來，祖父母寵我，我青少年時期確實有段輕狂乖張的日子。但幸虧祖父母他們都是溫和慈愛的老人家，不打不罵，我的壞，壞不到哪裡去。不至於喝酒賭博或跟人家逞兇鬥狠、打架滋事、耍小流氓，就是任性、好玩而已。	P110,二, 1
18.	曾為日本人的記憶	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長輩們都很開心，但老實說，我們小孩子有點悲哀。祖父一輩的人根本不會跟我們談政治問題，我父親反日，曾被放逐海外，但也不告訴我們為什麼，就如同戰後幾十年來，長輩不敢談二二八、白色恐怖一樣。我們完全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日本教育我們，將來最好的前途是進入日本軍校。學校和報紙有句口號「鬼畜美英，消滅為止」，老師也告訴我們，美國人來，會做強姦一類的壞事。所以戰爭結束，我們有點悲哀，忍不住疑問為什麼沒有如之前發誓那樣，和英國、美國殺到最後一兵一卒呢？所謂投降究竟是真是假？一直看到街上有台灣人打日本人，才相信日本確實投降了。	P123,三, 1
19.	二戰始於太平洋戰爭	1941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人正在上海。同一天，上海是十二月八日，清晨可聽見遠處傳來悶悶的砲聲「砰!砰!砰!」一到學校，就聽說港外日本船打美國軍艦，戰爭已開始。	P124,三, 1
20.	台灣人看新中國的誕生	平心而論，當時(1941年)中國真的非革命不可。到現在我還相信，在毛澤東進北平，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止，中國搞革命，百分之百是對的。中國沒有徹底革命，根本救不了。不要說是中國人自己，就是以來類普世的價值來看，上海到處乞丐，到處餓屍，便是一種罪惡，一個國家弄到這種地步，更是罪惡。(粗體為我的強調，以下同)	P126,四, 1

21.	為什麼不稱國家？	童年的上海經驗影響我對「政府」這個概念，一直到後來我都認為，政府要讓百姓有飯吃，能使人民有尊嚴，行事有正義，才是好的政府，否則就必須推翻。	P128,二,1
22.	二二八的影響	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和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務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拿父親來說，祖父只有他一個兒子，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坐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退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P133,三,1
23.	自由的台灣人	甘瑩三姨的先生蘇子衡早年留學日本仙台的東北帝大，入了日本共產黨，之後轉去大陸參加中國共產黨，加入長征行列，成為中共的老幹部。在大陸，曾擔任過台盟主席和大連市副市長。三姨則在外語學院教日文。	P139,二,1
24.	去日本還是留在日本？	祖父他們的朋友建議我留在日本念書。我迷迷糊糊，不知道該主張什麼，就聽從安排，沒回香港的 Royden House 了。記得父親曾告訴過我，你要念書、知道世界，留在日本勝過去美國。日本引進全世界的文化，去神田書街，可以找到全世界語文的字典。日本擅長翻譯，全世界文學都有日文版。	P142,二,1
25.	留美夢碎的原因	美國的新墨西哥州立大學接受我，我很高興準備去美國，又跑回香港去融入英文環境。沒想到，中華民國政府莫名其妙，不讓駐日大使館直接給我護照和簽證，政府等於逼我回台辦手續。我既不回台灣，被迫只好老老實實留在東京念大學。	P146,三,4
26.	日本上流社會的特徵	日本戰前是階級社會，有所謂的「華族」，封有爵位。上流階級為表現他們的高位子，自然會發展出他們的象徵，日本是連言語方式都可以辨別出談話者的階級背景。	P149,一,3
27.	回台時的落寞心情	我有很多唱片和書，以前不能帶那麼多東西上飛機，所以，我搭船回台灣。1957 年，日本已逐漸從戰後復甦，工商發達，所以我上船的	P151,二,1

		神戶港燈火通明。經過四天三夜，靠近台灣時，卻只是一片黑暗，只見基隆港有阿兵哥巡邏的身影。突然間我非常後悔，後悔為什麼要把自己丟進這個黑暗的島嶼，但也已經後悔莫及，只得往前走了。	
28.	進新聞局的原因	我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台灣各方面都很黑暗，我一定要想辦法出國。幾位朋友建議說，想出國的話進外交部和新聞局兩個公家機關，才有較大機會。但是外交部官僚化比較深，新聞局則於 1945 年元月在台恢復設置，還算新機關，去新聞局好些。	P152,四, 1
29.	考試錄取的原因	我沒有太多猶豫，馬上去教育部詢問留學生回國如何能進新聞局服務。教育部說，要考英文。那是根本沒有留學生回台灣，戰後第一代留學生也還沒出去，所以考試時，只有我一人在教育部應考。成績及格，就分發進新聞局。	P153,二, 1
30.	黨國裡的台灣公務員	那時的新聞局，全局上下五、六十人，除我以外，台灣籍只有三個。一位是前新聞局副局長、前駐以色列代表鍾振宏，時任聯絡官。另一位前新聞局副局長黃老生，當時和我隔桌對坐，都進新聞局不久，頗有難兄難弟的味道。另一位是廖昭雄，1961 年獲美援會獎學金赴美留學而離職。	P154,二, 1
31.	評價 1960 年代的中華民國	不過，由此可見，處在台灣政治專制的時代，負責國際宣傳事務，分外辛苦。來訪的新聞記者，甚至旅行雜誌記者常常會問我，國民政府的政治如何，我的回答往往會變成那位記者文章的一部分，這使我陷入兩難。但我又想，台灣明明獨裁統治，卻要自稱 Free China。來訪記者不是傻瓜，硬生生要為政府粉飾，更增添他對台灣的嫌惡。於是我想出一個辦法，坦誠告訴他們，我有兩個立場。我絕不勉強說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我會說明，中華民國雖是獨裁國家，但這是過度時期，沒有辦法。我們會一步一步改進，希望有一天成為民主國家。	P158,三, 1
32.	反省台灣的人權概念	拿台灣曾經發生的鄭南榕自焚事件來對照，有人可能會笑他傻，或者冷漠說一句「何必如此」，甚至有人會更殘酷說鄭南榕活該。……一個人願意為抗議政府而結束生命，一定有其原因，政府和人民都應該深深反省檢討。	P160,二, 1
33.	首次抵達美洲	依我的個性，當時一點介意也沒有，更不會去跟長官鬧脾氣，反而陸以正有所虧欠，覺得應該彌補我，後來就選派我去加拿大進修學習紀	P166,二, 1

		錄片。所以，人生不需要計算得太厲害，許多福氣可能由看似吃虧的事帶來。	
34.	與蔣孝文聊天	我問蔣孝文：「你有沒有什麼台灣人朋友？」他說：「有，黃朝琴和吳火獅」。黃朝琴是前省議會議長，人在官場，跟蔣家第三代相識，不教人意外，然而，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乃一介商人，關係能打到蔣家官邸，可見他的政商手腕非比尋常。	P171,三, 1
35.	告密栽贓文化與白色恐怖	巧克力我是帶回來了，馬上交給部下，依地址寄去東海大學。副局長邱楠忽然找我去問話，怒氣沖沖說：「你是不是有一盒巧克力糖？馬上給我調回來！」我趕緊以新聞局名義，打電話到郵政總局，請東海大學郵局，把「寄錯」的包裹寄回新聞局。好不容易追回巧克力糖。原來有人密告我帶嗎啡進來。檢查結果，巧克力糖就只是甜甜、好吃的巧克力糖，和嗎啡一點關係都沒有。	P174,七, 1
36.	會做事的冗員	我的新職是紐約新聞處新聞專員，好久以後有一天，太太突然問我，這個新聞專員做什麼？老實說，我也答不出來。是什麼職等職級，我也弄不清楚。我太太在一次聊天場合就問陸以正：「有沒有Orgnization chart?」他隨手拿起筆，就畫紐約新聞處的組織圖；第一層一個人，就是處長，另外二十幾個人統統在第二層，通通直屬於處長。職員工作的內容並不特定，一切由陸以正彈性指揮與調派，像我主辦影像和電視宣傳，但因為我是處長以外唯一有私人房車的人，也做庶務，例如每周去一次機場拿外交郵袋。職務內容既然不那麼清楚，基本上就是等待上面來的指示命令，有心工作的，就要自己發掘工作。	P178,二, 1
37.	中美斷交搶到應變時間	(1978 年) 台北十五日半夜，紐約是中午，Cronkrite (媒體業大老) 打電話來，叫著我的英文名字 C.Y.說：「something' s cooking」又說白宮此刻好像面臨「heavy traffic」，非常忙碌。我們平時聊天很多，我了解他意旨中美要斷交。為求慎重，我把電話轉給陸以正處長，請 Cronkrite 再和他說一遍。陸以正馬上打電話回台北，找外交部長錢復，讓台北立即磋商應採取哪些應變措施。過了幾年，錢復見到我，就說：「超英，你這個電話不知道對我們幫助多大！這七、八個小時	P184,二, 1

		非常寶貴。」	
38.	蔣經國在紐約遇刺，陸以正當機立斷	當天演講照常進行，我們也馬上打電報回台北，說明經國先生無恙。會後召開記者會，外國記者問蔣經國當時有什麼反應？講了什麼？陸以正回答說：「他說『Anybody got hurt?』(有人受傷嗎?)」這句話成為隔天報紙的頭條，陸以正就是這麼聰明，蔣經國是否真有這麼說，只有天知道了。	P189,四,1
39.	退出聯合國的另類解讀	千鶴與我坐在記者席上，聽到投票結果，先是愣了一下，一時無言。旁座的外國記者向我們看了一下，伸出手來握手示意，不知道是安慰或惋惜。等曲終人散，齊步走出聯合國時，千鶴問我：「從今天起，世界公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真正的中國，台灣被排除在外，那就是等於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了。我們應該高興才是呀?!」千鶴很自然地伸出手來，握住我的手，我們相對會心一笑。	P192,三,1
40.	獨立奮鬥的身影	1967 年底，我就只是賣掉中山北路的一棟房子，把錢換到美國，其他別無所帶。年輕時比較不會打算，帶去的錢就只買了一部汽車，繳租房子的保證金，在買家具，所剩已經不多，接下來日常生活都要靠自己。我的月薪三百五十美金，付掉房租兩百三十元，每個月只剩餘一百多元工一家五口之用。	P200,二,1
41.	愛的宣言	千鶴出身富裕的世家，她能跟我一起度過初到陌生地的困窘，並且常保持樂觀開朗和理性，熱愛工作，我一輩子感念在心。	P208,一,1
42.	遠距離戀愛	我常約她去咖啡廳聊天，也會去海邊游泳，或去台中公園散步。後來，我天天南下找她。火車不好買，偶爾也會忍不住動用特權，說是外賓訂票，如此順利去台中。我記得很清楚，我搭「觀光號」，三小時可到台中。每天下午做五點半的車到台中，往往逗留到晚上十一點離開。離開台中時，山線末班車早已開走，我就先轉去彰化，再從彰化搭海線夜車回台北迎接隔天的晨曦。清晨到台北，也不回家了，就直接到新聞局，到洗手間刮鬍子，才進辦公室上班。	P211,二,1
43.	台獨對台灣有利?	辜寬敏問我：「要不要參加台獨？」我說：「我台灣人，台灣人應該做的我都會做，你不要講，我也會做。」我又說：「第一，我參加與否有什麼差別？第二，你有什麼辦法，確實把握可以保密？否則，我何必冒這個險？」他們都能諒解，並沒有勉強我，也沒有失望之意。其	P216,二,1

大亞之國讀本

		實，他們都了解，我去見他們，已冒了大險，如果被發現，回台灣，沒有第二句，一定送去火燒島當政治犯。	
44.	評國民黨	在海外的台灣人知識份子，不論是主張台獨或親共，基本上都是被國民黨的專權腐敗逼出來的思想出路。我青少年在香港時期已開始懂得民主自由，不可能認同共產主義，對台獨則深深同情。雖然我在國民黨政府做事，但拒絕加入國民黨，心裡始終念著自己是台灣人，要盡可能為台灣做點事，而不是為國民黨賣命。	P218,一, 1
45.	職業學生傳統	新聞局駐外單位都是正規辦事，不可能有專業的間諜；若有，也只限突然而來的「空降部隊」，政策性派駐國外，潛伏在新聞處。另一種做情報工作的人是所謂的「職業學生」，或拿政治津貼的窮學生，或有自己的政治企圖。	P219,二, 1
46.	省籍情結	大約 1973、74 年，總政戰部副主任王昇到紐約來。王昇從江西贛南就跟著蔣經國，地位非同小可。紐約新聞處沒有司機，陸以正叫我開車送王將軍回旅館。 在新聞處電梯間，他很客氣問：「你府上哪裡？」我回他：「台北」。他又問了一次：「不是，我是問府上哪裡？」我只好再回一次：「台北」，忽地他才恍然大悟一般說：「喔！你是台灣人?!」接著就沒話了。	P219,四, 1
47.	官夫人看「中」美建交	千鶴的談話內容非常不像台灣政府官員的太太，她說：「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對中國和美國有正式邦交沒有意見。但台灣的將來，應由住在台灣的一千六百萬來人來做決定，而不是由美國或中國來代為作主。」	P226,三, 1
48.	少棒球場上的立場游擊戰	當天台灣巨人隊大勝，美國的晚間新聞播報少棒結果，特別強調「Team of Taiwan, not Republic of China」，第一次在全國電視網這樣播出，感覺真是痛快。因為本來就是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P231,三, 1
49.	結識台獨朋友	1973 年的威廉波特，除了寄信抵制暴力，我也建議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鎰，雇用私人小飛機，機尾拉著布條。果然張燦鎰租來一部小飛機，布條正反面各寫著「Go Go Taiwan」和「台灣獨立萬歲」。當飛機一直在球場上盤旋時，引起現場一陣陣騷動，美國電視台也攝影下這幕鏡頭。對於宣達台獨理念，這項行動算很成功。當然，國民黨政府又氣急敗壞了。	P234,二, 1

50.	族群歧視	既然要被調到東京，我心裡想，台灣人在政府做事，像我這樣資歷的人不多，我一定要替台灣人出一口氣，不要叫別人瞧不起台灣人。早幾年，我的外省籍同僚經常會講：「你們台灣人沒有人才。」或者用反問的口吻說：「你們哪裡有人？你們台灣人怎麼做嘛？」我心裡忿忿難平，但不願意去多論辯。有骨氣，就去做，不是跟否定你的人逞口舌之快。我只放在心裡想：「你們怎麼知道沒有！沒有哪一個人天生下來就堪稱大材，足以當總統或部長？不給台灣人機會，又說台灣沒有人才，這是一種族群歧視。」	P240,一, 1
51.	貴族日語	辜振甫的父親是貴族院議員，從小讓他接受很好的教育，他說一口流利的貴族日語。在我所知道台灣的官員或社會賢達中，辜振甫的日語是最好的。 日本戰前在皇室之外還有華族，階級社會會以各種差異來彰顯各階級的不同，貴族的日語和一班人說的日語有顯著不同。辜振甫說的日語就是貴族日語。 已故的板橋林家林衡道教授，他的日文造詣也很好，但還稱不上貴族日語。他的岳父杜聰明和我祖父交情深，我父親年少赴京都讀中學時，祖父曾託杜聰明照顧父親。家父母結婚的媒人也找杜聰明。我和林衡道也熟，他蜜月旅行到上海就是住我家。 李登輝總統的日語有濃濃的台灣口音，這與他在台灣念公學校及中學有關係。不過，李登輝讀書多，可以掌握意義很深的字；從這方面說，他的日文算是很好。	P241,二, 1
52.	名片鬧笑話	稱處長、主任都無所謂，但名片上印「組長」銜，就大有問題。「組長」兩個字在日文是「流氓頭」的意思，每次我把名片拿出來，都尷尬萬分。很不願意給日本人。.....我把問題反應上去，赫然發現自己好像撞上一片冷冷地牆，沒人當一回事，沒人覺得有必要改。.....我們的外交人員讓別人誤認為黑道頭頭，這種堅持形式的性格，毫無實質意義。但外交部不改就是不改，到今天仍沿用「組長」這個頭銜。	P242,二, -1
53.	產經新聞的侷限	國民黨政府只和遙遙落居末位的《產經新聞》維繫關係。國民黨讓《產經新聞》出版蔣總統祕錄，《產經新聞》也是唯一特准進台灣的日本報紙。問題是，《產經新聞》在日本是少數右派支持的報紙，我認識	P244,一, 3

大亞之國讀本

		的人，多數家裡沒有訂閱產經新聞，政府卻只和產經新聞交情好，這讓日本真正的實力人物反而瞧不起台灣。	
54.	文化優越感	同事也說：「超英，《朝日》和《讀賣》捧中共都來不及，怎麼可能理你台灣！」當時的政治環境的確困難。但每次開記者會，來者盡是主流記者或文化流氓，逼得我不服輸的個性難過，想到自己的國家被如此對待更難過。	P244,二, 3
55.	從東亞看鴉片	永井柳太郎拓殖大臣任內，主管殖民地事務，知道了我父親反對日本的鴉片政策，被總督府視為異議分子，他卻認為我父親的反對態度，情有可原；亞洲人為了鴉片戰爭，身受其害，身為亞洲人應該體念中國人的痛苦，怎麼還要在台灣施行增加鴉片人口的政策。我祖父及外祖父因此相偕赴日本向他道謝，兩家開始有往來。	P246,二, 1
56.	與永井家的四代交誼(一)	我家保存一張 1935 年的大合照，盡是知名歷史人物。依《灌園先生日記》記載，這次聚宴由林獻堂出面邀請，主客是永井柳太郎和他的長子明雄。座中陪客有歷史上所謂的抗日派，也有親總督府的人物，他們會碰在一起吃飯，頗值玩味。	P246,四, 1
57.	與永井家的四代交誼(二)	永井道雄和我都非常珍惜世誼，幾十年從未斷過音訊。1954 年，他與美國著名日本文學家唐納德·靳(Donald Keene, 1921~)來台灣，住過我家。我們初到日本任職時，我太太戰前念過小學一年級，說日文的能力尚待加強，就請永井夫人全當日文導師。永井夫人也出身名門，祖先代代是岡山城主的首席長老(按，長老一職為城主的最大家臣)，為城主的最大家臣。我的兒女也和他的子女交往，所以兩家可謂有四代交誼。日本人不同於中國人，不會單單為了金錢利益就幫你做事。他們講究「義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注意故舊的情義，所以和日本高層社會人士交往，比台灣社會更需要依靠關係。	P248,二, 1
58.	稟議	日本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在所有人都同意之後才敲定。具體說，基層科員簽公文上去，一路上大家都寫同一意見，最高決策者就會批准。下屬當然會體念老闆的意思傾向來簽意見，但是，如果部屬真覺得不對，也不一定會隨波逐流。日本社會不願意因	P251,二, 1

		辦事的過程有歧見，最後產生一個極端的人來，所以，即使身為龍頭，通常都會、也必須要體念眾人的總意。	
59.	午前樣	日本有個特殊的名詞「午前樣」，直譯成「早上的先生」。日本太太若對人家說：「我先生是午前樣」，他的神情必然為笑中帶著驕傲。日本的會社生活一定要應酬，有應酬的先生才是公司的一號人物，沒有應酬等於注定沒有前途。一有應酬，往往就晚上十二點鐘以前回不了家。我太太聽得直苦笑，有些不相信，以為我在開玩笑。有些不相信，以為我在開玩笑。	P252,四, 1
60.	二次會	在日本，他們稱續攤為「二次會」，多選在酒吧，真正談事情的時機都在此時。在美國交際請吃飯很簡單，也很便宜，請一個午餐，頂多三十美元就打發了。在日本請吃飯都是一整群人一起請，東京物價又高，一夜的交際費非一千美金不足以解決。二次會的開銷又必須我自己付，真是吃不消。	P253,一, 3
61.	改造《中華週報》	我也改造宣傳雜誌《中華週報》。《中華週報》雖不是駐日代表處掛名的正式刊物，但眾所皆知，週報出自代表處。之前的《中華週報》全是反共八股文章，言論部分，常摘引中央日報的社論，講一些「中華民國萬歲」之類自我安慰與自我麻醉的話。新聞消息部分，「匪情」約占三分之二，台灣自己的消息反而只有三分之一。我把它改變成三分之二報導台灣消息，大陸消息佔三分之一。	P255,二, 1
62.	台灣人日本兵賠償問題	台灣人日本兵遺族請求撫慰金一事，是 1980 年代台日關係的大事。很不幸，駐日代表處一開始反映保守冷淡。副代表林金莖就和我說：「我們不能向日本人要求這個賠償，如果要這個賠償，日本人在台灣的財產也要歸還。」他完全依照中日和約來判斷此事，態度當然不積極。	P256,末, 1
63.	力求簽證公平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欺負人的藉口，實際上，簽證手續根本全程在台北辦理。政府官員和有辦法的人跟日本交流協會打個招呼，一樣可以迅速取得簽證。沒有特權的老百姓才要受折騰，必須一大早五點鐘去排隊，還怕排不進當天受理的人數限額。.....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政策就改弦更張了，簽證時間(從兩周)縮短為兩天。	P260,三, 1
64.	責無旁貸的	拍攝完成要播放前，字幕問題不能再迴避。我一而再，再而三問日本	P266,三,

	名稱問題	電視，會不會依約打出「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的字樣，他們都承諾會。中共大使館方面卻一再「關切」。據說，日本人跟中共說：「我們已經花了兩、三百萬美金……」言下之意，字幕非打不可。但到播出前一刻，故宮仍未看見片尾，只看過中間的節目內容。我很擔心，若沒有字幕，我的工作將前功盡棄。日本電視台最後想了一個對兩邊都勉強交代得過去的辦法。字幕是打出來了，就是契約上規定納九個字，但在前後，各加了引號。我很難挑剔它，日本電視也因此有足夠理由去說服中共，辦法頗為高明。	1
65.	宋楚瑜的獎勵	我邀請小林社長來台訪問一事，雖屬秘密訪問，但意義重大，宋楚瑜局長因此簽報我為當年新聞局保舉最優秀公務員。過去，極少駐外人員能有這項榮譽，新聞局特別出公費，讓我飛回來受獎。跟隨宋楚瑜局長這樣的長官，心裡會受鼓舞，你有一點功勞，他馬上想辦法獎勵你。跟他做事的經驗，感覺不錯。原定總統蔣經國親自授獎，聽說身體不好，改由孫運璿院長頒授。	P266,末, 1
66.	駁斥一國兩制新聞戰成功	(1981年) 九月中旬，我打了一通電話到北京，此舉在當時非常大膽，與匪接觸就等於叛亂。我的同僚若知道這事，不嚇得視我如麻瘋，大概也會去參我一本。不過，我總是不願多想後果，多慮周密往往就是怯懦不前。在重要當頭，我的思考點只有該不該做，對台灣是否有利。……日本記者又在這裡，日文稿子不能等。宋楚瑜、戴瑞明副局長和我三人就在酒會場外的櫃台上研擬稿子。宋局長口頭裁示說，英文稿還是要送院簽審，日文部分，他當場向日本記者說明，由我即席翻譯成日文。隔天，日本報紙一攤開，葉劍英的聲明和宋楚瑜的反駁就在同一版。	P269,一, 1
67.	政府仿如朝廷	宋楚瑜的爸爸宋達從擔任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起，就跟在部長蔣經國身邊，蔣當退輔會主委，宋達當他的副主委，算得上所謂的「近臣」。臍帶和裙帶關係長期是國民黨的用人標準，整個政府仿如朝廷，家天下的氣氛滯留三、四十年之久。宋達去世前，曾託考試院副院長劉季洪，多多照顧他的長子宋楚瑜，蔣經國於是刻意栽培他，先拉到身邊當總統秘書，接著放到新聞局當副局長，這個位子絕大多數公務員流	P272,二, 1

		血流汗一輩子都坐不到，但當時的政治環境就是這樣，大家並不意外，甚至頗以為理所當然。1980年，台美斷交隔一年，宋楚瑜更迅速晉升新聞局長了。宋楚瑜深受蔣經國總統偏愛，任何人都一目了然。	
68.	助政府知日	客觀情勢上，如果外省人持續當權，外省人仇視日本的傳統心態，並不利台灣與日本關係的長遠發展，而台日關係對台灣卻又是那麼重要。宋楚瑜是年輕一代外省權力人物，且已搭上接班梯隊的直升機，這樣的政治人物既想來日本，我認為可以善用機會，讓他深入日本。早一輩台灣人曾被日本統治，多了解日本也等於多認識台灣人，對台灣的未來一定有助益。	P274,一, 1
69.	村八分	日本文化裡的團體主義也是根深柢固。小孩做錯事，中國父母的反應可能把小孩關在自家房間或廁所，但日本不同，他們給小孩最恐怖的處罰夢魘是喝令小孩站到屋外。日本傳統文化有所謂的「村八分」，若違背村子的共同利益，將被逐出村外，不再隸屬原先的團體。對小孩來說，在屋外罰站無異被家人宣告「你不再是我們家庭的人」，這才是最恐怖的夢魘。	P275,二, 1
70.	鹿兒島與花蓮	鹿兒島出身的名將西鄉隆盛對明治維新居功厥偉。西南藩的武士推倒幕府，還政於天皇以後，溪南各藩的武人退隱，讓大久保利通等文人掌權。後來與政府對朝鮮問題意見相左，西鄉隆盛進行兵諫，發動所謂的「西南戰爭」。西鄉的軍隊兵敗於途，西鄉本人自殺。殘餘的鹿兒島軍人即跑到台灣花蓮，據說圖謀反攻日本本土。所以，花蓮人有許多是鹿兒島人的第三代、第四代。	P277,一, 4
71.	從廣島看二戰	為了要了解戰後日本對戰爭觀念的改變，我們也到了廣島原爆點。這個悲劇死了幾十萬日本人，但日本發動戰爭，讓更多的中國人和亞洲人犧牲，日本一直不願反省。多少日本人是接到政府的「赤紙」而上戰場，為天皇而戰，但戰後昭和天皇不僅保住皇位，對這些犧牲者的遺族並有正式道歉過。在在顯示日本人多麼要面子。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把二次世界大戰歸因於英美和日本的利益起衝突，而不認為軍國主義是始作俑者。	P278,末, 1
72.	最大地方報	普通日本人家裡一定訂地方報，而知識分子則訂兩份報，一中央報，一地方報。地方報的重要不可言喻，我就特別安排訪問著名的全日本	P279, 末,-1

		地方報紙龍頭《河北新報》。.....除了與地方報人建立關係，仙台本身是中國和日本文化交流的起點。日本佛教屬大乘佛教，日本和尚被派到中國，又派到西藏，又到印度，再回日本研究出自己的大乘佛教。仙台即大乘佛教發祥地。日本三大景之一的仙台松島，海邊有許多迷你小島，島上有許多山洞，很多和尚就隱居在這些山洞參禪。	
73.	宋楚瑜的用心	我建議宋楚瑜，細川家族從第一代細川藤孝開始，到十八代的細川護熙，歷代家主都文武雙全，對漢文深有研究，將來可考慮送細川護熙《四庫全書》。沒想到宋楚瑜當了國民黨秘書長，還記得這件事，果真送細川一套《四庫全書》，記憶力真有過人之處。據我所知，1993年細川當上首相，宋楚瑜時任省主席，也曾打賀電去。	P283,三, 2
74.	日劇的精髓	宋太太也變得非常喜愛日本，對日本事務抱著很高的觀察與了解的興趣。前經濟部長李國鼎 1982 年訪問日本，我安排他去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談台灣經濟。會後，李國鼎告訴我：「看日本電視劇才能看見真正的中華文化」，對當時國民黨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頗為反感，他很直率地要我反映給新聞局上層，說日本連續劇才是中華文化的縮影，那才是真正中華文化的教育。我真的把話告訴宋太太，她也真的開始看日本連續劇。	P284,末, 1
75.	幻滅重生浴火鳳凰	2000 年他角逐總統大選失敗之初，曾到美國散心。他到那天正是陳水扁就職典禮當天，我太太到甘迺迪機場，見面第一句就質問宋楚瑜：「你怎麼今天來？！」我太太認為他應該參加陳水扁的就職典禮，才有風度。.....記得餐桌上，我還很天真，半安慰半開玩笑他說：「輸掉選舉，比較有空」宋楚瑜無言望著我的表情，彷彿在說：「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事後想起來，我可能並不完全了解宋楚瑜。.....幾十年來，我一職期待宋楚瑜以他的外省背景、他對台灣的胸懷和他在政壇的地位與實力，能夠擔任台灣內部本省、外省人的橋樑，但是 2003 年以後，我開始覺得失望，想來頗為無奈。	P285,四, 1
76.	東亞視野的說服	我向氏家齊一郎遊說了一連串理由：「實際上，我不覺得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非常好。日本並沒有強烈企圖要了解台灣，一心只看中國；但	P289,二, 1

		是，台灣對日本有重要地位。日本船貨物百分之六十要途經台灣海峽，一半的飛機需要經過台灣上空。台灣方面也有不好，為了抗日戰爭八年，有反日情結，高層政府官員也仇日。到這個時候，要補救這個關係，我自覺身負拉進台日關係的義務。而宋楚瑜先生將來會領導台灣，我一望他了解日本。宋楚瑜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過中曾根的理念……」氏家副社長並沒有立即答應安排雙方見面，他只說，還要想一想。我最後刻意強調：「假如不行，我也不會介意。但是兩國關係不是我們兩個私人的問題。」	
77.	密會計畫	不久，氏家社長回報好消息：「好了，可以見面。但總理後面隨時跟著好幾十位記者，如何擺脫記者，不叫記者跟蹤。得知總理私會台灣官員，只有一個辦法。過幾天在輕井澤，中曾根要召開黨幹部會議，會議結束後隔天早上，安排打高爾夫球，只有進了球場，記者才不會跟進去。」氏家繼續說明細部計畫：「中曾根預定在九點半進場，我們九點鐘提前進球場，記者不會察覺。第九洞處有個茶室，在那裡，我們假裝不巧遇見中曾根。」	P290,一, 1
78.	不夠周到的地方	我與《產經》沒有私人恩怨，不會故意和他們對立。依我的良知判斷，國家利益在前，不能老鎖在固有的感情裡，否則只有死路一條。我的態度是寧願切斷和《產經》的關係，也要拓展日本三大報的溝通管道。	P295,二, 1
79.	離職仍珍惜日本關係	鍾振宏接替我的位子，重作馮婦，再度回任駐日新聞處處長。馬樹禮希望我能幫忙鍾振宏，介紹認識各大媒體的記者。我就安排《朝日》、《讀賣》、《每日》、NHK 的國際部部長在聘珍樓吃中國菜，馬樹禮做主人。席間《朝日》的外信部部長白井健策質問馬樹禮：「馬代表，有個事想請教，是不是貴國的政策改變，對日本不再重視嗎？」馬樹禮答說：「沒有，我們很重視日本關係。」白井健策接著問：「為什麼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把這個重要的張先生換走？」通常日本人不會話說得這麼直接，白井的直言，讓馬樹禮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P296,三, 1
80.	母親財產助事業第二春	當時兩萬五可以在紐約買到一個簡單的公寓，以我在紐約工作的積蓄，實際上並沒有這筆資金。指示在此之前，剛好外祖父甘得中遺留的一塊地被徵收，換得一筆錢，阿姨來信問我擁有的一份該怎麼處理。我想那原屬於媽媽的財產，捐給他的母校彰化女中最有意義。彰	P299,二, 1

		女據說沒有游泳池，我就主張捐建一座游泳池。阿姨跟彰女校長表示捐贈的意思，但很快發現學校無力籌措後續的水電等維護費，不敢接受。恰好這時候動了投資 RG Video 的念頭，我就請阿姨幫忙把錢匯過來。	
81.	公共電視初期的省籍結構	當時的公視人事結構未能回應台灣民主化的需求。公視裡面，外省人佔七成，台灣人佔三成。新聞局長邵玉銘是外省人，籌委會執行長王曉祥是外省人，副執行長由新聞局調來，也是外省人，因而，節目製作、新聞、紀錄片的主管自然多是外省人。問題雖然沒有表面化，但我認為公視人事結構未顧慮省籍比例相當，不足以探究台灣社會的心聲底層，所做的反應經常要失去準頭。	P317,三, 1
82.	四度任公職的初衷不變	要或不要回任東京新聞處長，我先思索自己能否有益於台灣。1985年我選擇提前退休、離開新聞局，當時蔣經國仍大權在握，台灣還陷在強人的獨裁統治裡。現在既已逐步民主化將來一定是台灣人當總統，台灣將更趨自由民主。我們需要讓日本人更認識台灣，再提升台日關係，而我自忖與日本關係及對日本的認識，台灣沒幾個人能超越我。	P319,末, 1
83.	人生觀	我對人生的看法很簡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年三千六百天，八、九十年的人生，大概總共有三萬個日子。前一萬添，忙於學習，為人生做準備。第二個一萬天，衝刺事業，養兒育女。最後一個一萬天，我認為要去做一些事，讓揮別人生的剎那，不會哀嘆：「啊！真後悔那件事沒做。」當我問自己，不去東京會不會後悔時，一個強烈的回音告訴我：「會！」然後，再沒有太多思考，放下欣欣向榮的公司，我決定接受新職，回鍋任東京新聞處長了。	P320,二, 2
84.	從做記號認識李登輝	我向他提報一份對日新聞工作要點。他逐條逐條批示，一邊嘴念著：「這個可以，這個不要」，一邊打「√」和「○」。這種標記法正是日本人的習慣。現在台灣老師給學生批改作業或考卷，對打「○」，錯打「×」。日本人是用「√」來表示答錯。我發現，李登輝對日本的情勢非常了解，幾乎不需要多加說明。	P321,三, 1

85.	中國打壓又一例	豈料，日本外務省迫於中國壓力，轉向亞奧會主席、科威特的親王阿罕穆德，要求他撤回邀請函。1994年九月，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向阿罕穆德發出抗議，抗議政治力介入體育。台灣忍受中國荒謬與粗暴的壓迫，以不是一天、兩天，台灣能做的就是永遠不被打倒，在有限的空間，做最大的推擠，為自己推開更大的空間。最後，李登輝不能去，我們改託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雖然中共依舊得寸進尺，繼續抵制，最終徐立德仍代表出席廣島亞運。	P324,三, 1
86.	經驗老到的公務員	的確，因總統被迫不能成行，徐立德出席亞運比奧會本身激發出更大的新聞張力。他一到廣島機場，我第一次看見這麼多記者，來自全世界和日本的記者，大概三、四百位。但是徐立德一下飛機，日本官員就帶他逕往側門出去，避開媒體。日本政府一定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不願有關徐立德的新聞大作，免得被中國囉嗦。側門前面有幾十公尺寬的停車場，成排的車輛遠遠隔開記者。我心裡暗叫不好，那新聞還做什麼？當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拉徐立德走往和記者可以握到手的位置，從記者面前，像閱兵一樣走過去。徐立德隔天便以充滿尊嚴的姿態登上報紙頭版頭條，而不是向被日本官員押走的小人物一般。	P325,四, 1
87.	日本人看李登輝	第一位安排訪問台北的是日本電視公司社長氏家齊一郎先生。李登輝在總統府正式接見。氏家在讀賣新聞集團地位數一數二，又擔任「日本民間放送連盟」會長。他回日本後，我們見面聊天，他太太禁不住讚美李登輝：「你們台灣人真幸福，有這麼好的領袖帶領國家。但願日本也有這樣的領導人。」李登輝總統留給訪客深刻的良好印象，不是臨場隨意發揮，李登輝很用功，事前會要求了解訪客的背景，準備和訪客談話的主題。他飽學多聞的學者形象常讓訪客讚嘆不已。	P329,三, 2
88.	東亞關係(日中台)速寫	對日本來說，日本雖然討厭中國，卻需要中國的市場，而中國的市場遠大於台灣，台灣不該繼望日本會在兩岸間做取捨，中國的地位必然重於台灣。反過來，台灣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應該了解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從中找出跟日本建立外交關係的切入點。	P335,末, 1
89.	辜振甫的付出	我把辜振甫拉出來見媒體六次，有專訪，也有記者會。再三、四天的會議中，可以安排如此高密度的媒體採訪，恐怕很少見。雖然我	P338,四, 2

		很積極，辜振甫的雍容大度，來者不拒，才是主因。辜振甫曾經跟我說，他真的很累了，我還是硬拉他出來，她卻一點斥責我的意思都沒有。現在回想起來，有點歉疚，卻也讓我見識到一位長者如何為國家鞠躬盡瘁。	
90.	從諾貝爾和平獎看政府國際化程度	諾貝爾和平獎是相當封閉的競項，大約七、八人就決定得主。諾貝爾獎委員會主要在國家設有推薦人，像日本就有一位推薦人。除了這些推薦人外，歷年諾貝爾獎得主也有權推薦。當全世界的推薦名單進去以後，決定者不可能一一訪見每位被推薦人，他們憑恃的是書面。最基本的書面便是一本自傳，再佐以世界公認的重要報紙對他的報導。	P350,末, 1
91.	李登輝的待客之道	前後六次陪同江口見李總統，總覺得他有一個不同於常人的態度。江口先生為了《台灣的主張》這本書，包括採訪、修稿、再就修正稿進行訪問，面見李登輝六次，每一次我都陪同，每一次我總覺得，李總統待客的態度，從未有客套的寒暄，諸如「飛機上如何？」、「日本目前如何？」、「吃得怎麼樣？住哪裡？」或「順道去看什麼地方嗎？」的話題，非常與眾不同。我覺得他似乎當總統太久了，覺得別人幫他做一些事是理所當然。.....這樣的性格，讓底下做事的人多少有點心冷。	P362,末, 1
92.	版稅是一種誠意	最後一項工作是談江口的版稅。我義不容辭當翻譯，安排江口和王文榮雙方談版權的問題。我對台灣的出版界談不上熟悉，透過朋友介紹，才約到王文榮。王文榮早先已聽聞過李登輝總統的日文自傳，所以我們沒有多費口舌，隨即進入主題。那一天約在忠孝東路的來來大飯店十七樓，在座有江口、王文榮和我夫婦四人。王文榮是商人模樣，很直接丟出價碼：「一百萬。」江口愣了一下，只問了一句：「日幣或台幣？」經我翻譯後，王文榮以閩南語回答說：「好啦!好啦!台幣。」江口看了我一眼，而後淡淡地回應，勉強答應了。.....事後才知道一百萬台幣的稿費，跟江口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實在不相稱，我對江口先生深深感到愧疚。	P366,二, 1

參考書目：2016，陳柔縉著，張超英口述，《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麥田。

十、 外省人篇：從《巨流河》看中華民國的台灣

編號	主題	引文	章節	頁碼
1.	選擇國民黨的原因	那時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和共產黨人李漢俊、詹大悲、耿伯釗等人也曾聚餐談話，參加他們野外召開的群眾大會，聽各黨派演講，仔細閱讀他們的宣傳小冊，認真思考後，覺得國民黨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對中國實際狀況是最穩健的做法，黨員水準高，形象清新，一九二六年底，在上海加入了國民黨，並不是投奔任何人。	第一章 第 5 節	P47,二, 6
2.	鄉愁植物	那是一間小小的新房子，對面有一大片空地，長滿了高大的槐樹，初夏時開著一串串淡黃色的香花，是我終生的最愛，和芍藥花一樣，給我強烈的家的幸福感。	第一章 第 7 節	P54,四, 1
3.	地方觀念	父親面見蔣委員長，建議將初選合格的一百多名東北青年全部錄取，使多年來只有地方觀念的青年能有國家觀念，成為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革命種子。	第一章 第 10 節	P63,一, 6
4.	青年從軍的理由	信中，他也說明從軍的理由：「我已經十九歲了，畢業時超過二十歲，到時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學。日本人把我們逼成這樣，我也沒有心情唸書或等待一個沒把握的未來。我家有三個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願考進了空軍官校，可以真正報效國家，為我父親復仇。」	第二章 第 8 節	P95,七, 1
5.	被拋棄的難民大軍 (兼論國民黨失敗的理由)	我們（抗戰初起時）實行焦土抗戰，鼓勵撤退疏散，然而對忠義的同胞沒有作妥善的安置，對流離失所的難民沒有稍加援手，任其亂跑亂竄，自生自滅，這也許是我們在大陸失卻民心的開始吧！我從漢中長途行軍回援貴州時，發覺滿山遍野都是難民大軍鐵路公路員工及其眷屬，流亡學生與教師，工礦職工和家眷，近百萬的軍眷，潰散的散兵游勇及不願作奴隸的熱血青年，男女老幼匯成一股洶湧人流，隨著淪陷區的擴大，愈裹愈多。他們對敵軍並無殺傷力，對自己的軍隊卻礙手礙腳。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敵軍的前面，其前鋒卻老是阻塞住國軍的進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樣的車輛從手推車到汽車應有盡有，道路兩旁的農田也擠滿了人，踐踏得寸草不留，成為一片泥濘。	第二章 第 11 節	P102,二, 11

		車輛不是拋了錨，就是被壞車堵住動彈不得。難民大軍所到之處，食物馬上一空，當地人民也驚慌地加入逃難行列。入夜天寒，人們燒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夾雜著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與兒童啼饑號寒的悲聲，沿途到處是倒斃的腫脹屍體，極目遠望不見一幢完整的房屋，頃生人間何世之感，不由得墮入悲痛驚愕的心境，剛勁之氣隨之消沉，對軍心士氣的打擊是不可低估的。		
6.	痛恨日本	我們心中燃燒著對日本的痛恨，這樣的心情，是我生長歲月中切實的體驗，很難由心中抹滅。長長的八年，在自己的國土上流離，沒有安全感，連藍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懷？	第 三 章 第 4 節	P123,三,
7.	15 歲躲空襲經驗	我們兩個來自中國極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敵人的轟炸下結成好友，那種真正患難相共的感覺，是 太平歲月中長大的人無法想像的 。尤其是夜間空襲時，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緊急警報聲中，靠月光找棲身的小沙丘，牽著拉著，互相喊著名字，坐下後聽遠遠近近的炸彈，看三十里外城裡的火光，兩個十五歲女孩分擔著不可解的恐懼。解除警報時多半已是凌晨兩、三點鐘。解除警報是長長徐緩的長鳴，好似在長長地吁氣，慶幸我們還活著。數百人因為徹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興致抬頭看剛剛帶來死亡威脅的天空。月亮已經落下，星光燦爛，而我那時並不覺得星空美麗。 (粗體為我的強調，以下同)	第 三 章 第 4 節	P125, 一,5
8.	教育的堅韌	每天早上升旗典禮，老師們總會說些鼓勵的話，南開給我們的這種「敲打的教育」，深深影響我們。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連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淨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裡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第 三 章 第 5 節	P128, 二,-5
9.	陳納德將軍事業第二春	陳納德和中國空軍的關係，似乎只能說是一個緣分，他是在美國空軍一次競技小組的飛行特技表演時，受到中國空軍代表觀禮的毛邦初注意。一九三七年，陳納德已經四十五歲了，沒有	第 三 章 第 12 節	P156, 四,1

		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顧問之聘，乘輪船在中日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抵達上海。		
10.	仇 日 大 爆 發	終於，這些狂炸我們八年的日本人，他嘗到自己家園被別人毀滅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災禍降臨的恐怖了。.....我也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像一千八百架轟炸機臨空時遮天蔽日的景象，似乎聽到千百顆炸彈落地前尖銳的呼嘯，爆炸前灼熱的強風，房屋的倒塌和焚燒，地面土石崩濺的傷害.....啊，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盤旋，降下，無處可以躲藏，.....那些因菊花與劍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樣保護那些梳著整齊高髻，臉上塗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著更花的腰帶，穿著那種套住大腳趾的高蹠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背袋裡，火海中。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	第 四 章 第 9 節	P194, 三,1
11.	第 一 次 稱 偽.....政府	抗戰時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國共合作的，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曾在重慶。毛澤東本人曾被選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伯苓任副議長，當年任議長之汪精衛竟於一九四〇年一月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不久去南京組成偽國民政府!)	第 四 章 第 11 節	P201, 三,1
12.	因 階 級 友 誼破滅	我一直認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課外書，寫牆報，辦活動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這麼一大步，竟然從不曾給我一點暗示，臨行也沒有一句告別。直到武大這讀書會我才漸漸瞭解，傅綺珍是不可能告訴我的。她們也許早就參加讀書會之類的活動，被左傾團體吸收，成為「前進份子」，而「幼稚」地癡迷文學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況趙曉蘭這新交。	第 四 章 第 11 節	p202, 二, -5
13.	因 階 級 被 當眾羞辱	在我收拾行李和書籍搬房的時候，侯姐姐用她慣有的大嗓門，不指名地說，「有些人家長在重慶作高官，還每個月領公費，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臉皮厚!每天口中念著雲雀夜鶯的，不知民間疾苦，簡直是沒有靈魂!」其他的人都低下頭假裝看書，沒有說話，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第 四 章 第 11 節	P203, 二,1
14.	文 化 菁 英 的委屈	詩句的背誦和我青春迸發的詩思，與那樣的季節那樣的天地融合成一種永遠不能淡然處置的人生情懷。在當時曾被同學嘲為	第 四 章 第 12 節	P209, 一,2

		「不食人間煙火」的恍惚者。於日後漫長的一生，卻轉為一種無法解釋的不安現狀的孤僻。		
15.	文中是哪三江匯流	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鍾靈自古聞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捨，如眉山的蘇東坡，樂山的郭沫若。	第五章 第2節	P226, 二,1
16.	台語、下江人	孫家誘先生剛從英國回來，.....她是位很壯的女子，用渾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念了大約兩星期，把我們震懾住了——用一句今日台語來形容是「鴨子聽雷」。.....不到三堂課，突然老師請了病假，她和我們再也沒有回到英國文學史那門課，然後大家都「復員」回下江去了——四川人稱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第五章 第2節	P228, 二,3
17.	仇共或許要止於80年代	學潮在全國各大學擴散，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大學校園充滿了政治動盪與叫囂，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佔據全國，之後的四十年，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成為政治工具，學術傳授及專業標準近於切斷。.....在我所親身經歷的學潮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西南聯大的聞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教授。他是著名詩人。其感時之作《死水》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葬歌《也許》是當年文藝青年爭誦之作，我至今仍能記憶《也許》十六行的全文，仍很受感動：	第五章 第4節	P235, 二,1
		中國詩人 聞一多 《也許》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夜鶯不要咳嗽， 那麼叫夜鶯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撐一傘松蔭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須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著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18.	對共產主義的誤解	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	第五章 第4節	P238, 二,1

		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19.	外省觀點的中國革命	後來我自己明白，原來我不屬於任何政治陣營，如果我不積極參與活動，永遠是被擠到路邊的那種人。如果我敢於在任何集會中站起來說，「我們現在該先把書讀好」，立刻會被種種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選擇了一個輕一點的罪名，「醉生夢死」。 半世紀後，隔著台灣海峽回首望見那美麗三江匯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襤褸、長年只靠政府公費伙食而營養不良的同學力竭聲嘶喊口號的樣子，他們對國家積弱、多年離亂命運的憤怒，全都爆發在那些集會遊行、無休止的學潮中，最終拖塌了抗戰的政府，歡迎共黨來「解放」。他們的欣喜。事實上，短暫如露珠。開放探親去大陸回來的同學說，當年許多政治活動的學生領袖，由於理想性太強，從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貶，得意的並不多。我們這一代是被時代消耗的一代。從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災荒所迫，挑著擔子，一家或一口去墾荒，希望是落戶。而我們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卻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聚散飄泊或淹沒。五十年後我回北京與班友重聚，當年八十多個女同學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〇年後，進修就業稍有成就的甚少，沒有家破人亡已算幸運，幾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犧牲了。	第五章 第5節	P243, 一,1
20.	新中國的胎動	當遊行越來越頻繁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仍然從女生宿舍走到文廟去看看，有時有佈告，有時沒有。課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著些人，有時老師挾著書來了，學生不夠;有時學生坐得半滿，老師沒有來，所以一半的時間沒有上課。全校瀰漫著渙散迷茫的氣氛。期待多年，生死掙扎得來的勝利，卻連半年的快	第五章 第5節	P244, 三,1

		樂都沒享受到。		
21.	青 春 最 後 一把火	他(俞君)問我。你這麼憤憤不平是為什麼呢?我告訴他，張大飛自十四歲至二十六歲悲苦、短暫但是虔誠的一生，至死未見救贖。(或許他自有救贖?)他又問我。你為何在他死後受洗?我說希望能以自己信奉體驗基督教義，瞭解我自幼所見的各種悲苦，當年堅持投考哲學系也是為了尋求人生的意義。我這番述志中，有一個明顯的思念對象。他後來告訴我，他無法與一個死去的英雄人物「競爭」。他連真正的戰爭都沒有看到過，自覺因沒有「壯志凌雲」而比不上那種男子氣概。在我那種年紀，作此告白，犯了「交淺不可言深」的大忌，自己並不知道，而最初也以為與他僅只友誼而已，大家在樂山都只剩一學期了。接著各自天南地北，並不曾想到後果。	第 五 章 第 6 節	P247, 四,1
22.	南 京 也 是 故鄉，國仇 即家恨	南京是我記憶中最接近故鄉的地方，除了在那裡讀完小學，最重要的是我看到父母在南京重逢，母親經營一個舒服幸福的家，三個小妹妹平安地誕生。家中充滿歡笑。寧海路齊家，曾是黃埔軍校無數思鄉的東北學生星期天來吃道家鄉菜，得到我父母關懷的地方。因此，一九三七年初冬我們倉皇地逃離，國破家亡的悲愴和日軍進佔後的南京大屠殺，不僅是我的國仇，也是我的家恨。	第 五 章 第 9 節	P257, 一,1
23.	無緣俞君	漸漸地，他每天晚上寫些長長短短的工作環境的信息，寫他去參加的 parties 和朋友，開始生活在一個我完全不知道的上海了。而我生活在一個他完全無法想像的大家庭裡。很少有獨處的天地。我們在北平那大宅院，隨著東北戰況的惡化，漸漸變成了親戚、朋友、地下工作同志們出山海關的一個投靠站，一批又一批狼狽的逃難者，無數淒愴的故事。我們的信漸漸缺少共同的話題，不同的生長背景，不同的關懷，對未來有不同的期待。我們終於明白，也許傾三江之水也無法將我融入他在上海的生活。我不能割掉我父母的大關懷。	第 五 章 第 10 節	P263, 三, -4
24.	朋 友 的 家	當他們研究「前進」的女兒楊靜遠攻擊現狀時，做父親的娓娓	第 五 章	P276,

	庭個革命 (兼論中華民國的好壞)	相勸，「固然現在政府缺點很多，可是轉過來想想，如果現在沒有它，我們還能好好地在這裡過日子嗎？日本人早把中國滅了。國民政府雖不好，我們完全靠它撐持，才打這七年仗。而且要說它沒有做一點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國以來已經有相當的建設，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這進步。」女兒回說，「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專門讀書有什麼用？一點不能和現實結合起來。」父親說，「一個人不讀書怎麼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麼曉得分辨對與不對？人對於問題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腦筋來判斷，而腦筋不經過讀書怎麼訓練？」	第 13 節	二,3
25.	六 一 慘 案 (職業學生傳統)	左傾教師如聞一多等，在各校園中煽動青年人反政府的效果，遠勝於共軍初期的兵力。當年在校如有人敢反駁他們的煽動言語，先會被嘲罵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以後會有更實際的侮辱。到了一九四七年「六一慘案」發生之後，男生宿舍的同學已有人拳腳相向了。...六月一日武漢警備司令部進入武大校園逮捕共產黨師生的行動。	第 五 章 第 13 節	P276, 三,4
26.	英 語 不 夠 好，乾脆來 台灣	因為《時與潮文藝》的孫晉三先生的關係，我向南京的中央大學外文系申請助教工作，但他們已留了自己的畢業生。在上海教書，我不會上海話，實用英語也不夠，想都不要想，所以也沒去申請。何況我不喜歡上海那種虛妄的繁榮。	第 五 章 第 15 節	P286, 三,1
27.	又 因 為 階 級被罵了	我坐了兩次，秀桑一路用日本話（他們不懂中文國語）對我表示感謝之意。我「就職」後，把米、煤、配給票都給他，還引起同住馬家的一對助教嘲諷「擺闊」。我第三次坐院長座車時，「行駛」在新生南路的田野小路上，突然警覺，幼年時父親不許我們坐公務車的原則，立刻下車走路。	第 六 章 第 1 節	P293, 二,1
28.	初 遇 真 正 的日本人	每晚除了新聞、音樂，多為日人留下的古典音樂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間聽《荒城之夜》，在音樂中忘記它是日本歌，有時會想起逃難時，荒郊寒夜的風聲犬吠，想想那數百萬死在侵略中國戰場上的日本人，雖是我們痛恨的敵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們回家吧。初到台灣時處處仍見待遣送的日本人，看著他們瑟縮地跪在台北街頭擺地攤賣家當，心中實	第 六 章 第 2 節	P299, 二,2

		在沒有什麼同情，但是也知道他們不是該償還血債的對象。		
29.	愛的宣言	他信上寫人的理想，應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甚至於無意義的交談亦應當盡量減少。 這樣的人生態度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這樣的宣示，伴隨著強烈的愛情語言，在當年仍是文藝青年的我讀來，是「很不一樣」，甚至很有趣的。將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後，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時重讀，才恍然明白自己當年對現實人生之無知。在我們相識之初，他已清晰地寫下他處事為人的態度，和我敏感、好奇，耽於思慮，喜好想像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夠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處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別人的理智與堅強，甚至是願意得到那樣的保護吧。	第 六 章 第 4 節	P304, 二,2
30.	逛台北	看熟了台北開埠的商業舊街，和在湖南、貴州、四川逃難時所見的城市很不相同。台北的店面比較小，緊緊靠著，很少門洞、橫匾之類的間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後半段以乾貨為主。有時，我們會走一半路右轉到圓環，開始喜歡肉羹和炒米粉。但這些吃食和東北人的餃子一樣，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當飯吃的。我們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廚房燒飯煮個湯才像個家。	第 六 章 第 4 節	P307, 三,2
31.	讀 北 一 女 不用考？	大陸是回不去了，爸爸在台灣的朋友幫我兩個妹妹辦台北一女中插班手續。寒假後，寧媛上初三，星媛上初一，比後來的人早一些安頓。京滬漸漸撐不住了，政府遷至廣州辦公，事實上已作遷台打算。爸爸直到大勢已去才搭最後飛機來台灣。	第 六 章 第 4 節	P308, 四,1
32.	居 住 正 義 (板橋配給 房子)	這一年我父親終於來到台北，哥哥隨《中央社》到廣州，與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後來台，在我陋室落腳一陣子後，父子合力以十多兩黃金(當年約 28 萬台幣，人均 GOP 78 元；2017 年約 500 萬台幣)在建國北路小巷內「頂」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兩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給的板橋自強新村一戶水泥平房，將建國北路房子「頂讓」出去，所有錢投入遷台後《時與潮》復刊，他仍然樂觀地	第 六 章 第 5 節	P310, 三,1

		認為奮鬥必有前途。		
33.	外省人也有回中國的	共匪說解放台灣之時，不降者北經淡水跳海，中部去新竹跳海，南部去鵝鑾鼻。這時，我在武大團契的契友彭延德在台灣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裕昌和我送他去基隆碼頭搭船。那艘船上擠滿了人，連船尾都有人用繩子綁著自己的身子半懸在外，只求能回到上海，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對變局。我們有穩定的工作，已經決定留在台灣，把僅有的六個銀洋送給他作盤纏，分別時未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見。	第六章 第6節	P314, 一,1
34.	日式台灣腳踏車文化	唯一自己能調度的是腳踏車（我的嫁妝裡有一輛菲利浦腳踏車，在那時很帥，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車一樣），若遇到工程有急需，從景美到台北站需騎半小時，會耽誤公事。台北段近百里鐵路，實在責任太大，所以他不贊成搬到台大宿舍。他的意見，我父親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台灣前已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第六章 第7節	P316, 一,1
35.	齊世英遭開除黨籍	一九五四年底，齊世英在立法院公開發言反對為增加軍費而電力加價，令蔣總統大怒，開除他的黨籍。這件事是當時一大新聞，台灣的報導當然有所顧忌，香港《新聞天地》的國際影響較大，標題是（齊世英開除了黨籍嗎？），認為國民黨連這麼忠貞二十年的中央委員都不能容，可見其願碩獨裁，而蔣先生不能容齊，不僅因為他在立院的反對，尚因他辦《時與潮》的言論較富國際觀，灌輸自由思想與國民個人的尊嚴，對確保台灣安全的戒嚴法不敬。	第六章 第8節	P320, 三,1
36.	外省人的人權奉獻	梁肅戎先生（一九二〇~二〇〇四年）……當選遼北區立法委員。……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獄，但他在中外記者採訪及有關人士百餘人旁聽的法庭上侃侃為自由人權辯護。寫下台灣法制史的新頁。後又慨然擔任黨外前輩彭明敏教授之辯護律師，並且協助彭離開台灣前往美國。他為法制人權挺身而出的膽識與情操，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可惜彭明敏在民進黨成立後回到台灣，竟然因為梁肅戎堅守國民黨體制內改革的立場，而否認梁對他曾做有效協助！統獨之辯起後，梁甚至成為他們的敵人	第六章 第8節	P322, 二,1

		了。		
37.	中 央 與 東 北的矛盾	一九四六年春，蔣經國以東北外交特派員身份由長春致私電給蔣先生，謂東北黨部不受約束，有反共情事，影響中俄外交(署名「兒經國叩」)。蔣先生下令給組織部，謂不受約束即押解來渝(重慶)，並附上電文。組織部把它交給我父親去「約束」，過去二十年服膺三民主義思想、抗日以求復國的地下工作者，在各個分佈遙遠的革命據點接到命令，全然迷惑不解;他們不懂為什麼苦盼到勝利了，竟然眼睜睜地看著老毛子 (俄國人) 來家鄉劫收，甚至姦殺虜掠。老毛子走了，中央派來的軍隊對東北多年的痛苦卻毫無體恤。	第 六 章 第 8 節	P323, 三,2
38.	齊 爸 的 男 兒淚	他去世前兩年，我因車禍住院，他看到傷兵似的我，竟然哭泣不止。從此以後，他的淚庫崩潰了，我一生懂得，他每滴淚的沉重。那男兒淚裡巨大的憾恨，深深的傷痛。	第 六 章 第 8 節	P326, 四, -1
39.	結 交 台 灣 人朋友	陳家小孩兩男兩女與我孩子一起長大，陳太太張瓊霞女士，和我成為共患難的好朋友，五十年來分享了生兒育女、為丈夫擔驚受累的年輕歲月，也一起看到他們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帶我們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許多電務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認識台灣的風土人情。	第 六 章 第 9 節	P331, 二,5
40.	中 央 行 車 控 制 (CTC) 任你玩	在鐵路幾乎是唯一大量運輸工具的時代，車站上貨物堆積如山，貨車和客車同樣重要。淹水後又逢調整班次，CTC 總機無法「自動」時，就得退回舊制用人工指揮，貨車停在中間站等候的時間往往比行走的時間還長。.....這些時日中，工程檢修人員，車站，列車的人都在嗓門比賽，調度室輪班四小時下來，人人聲嘶力竭，七厘散 (潤喉中藥) 不離身，回家休息。有時夢囈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時那一批人幾乎沒有家庭生活，總局最初反對改革的人也認為電務部門自不量力，讓大家丟臉。報紙上 (幸好尚無電視) 每天責備，冷嘲熱諷，有一張漫畫上畫一位乘客，下車打著雨傘走路，比火車早到車站。	第 六 章 第 9 節	P334, 二,5
41.	躲 避 球 的	那十年間，我在那大操場邊上看了無數場躲避球賽，那種球的	第 六 章	P336,

	俳句	打法，對我是新鮮事，至今我總覺得它對人生有嘲諷的況味。我上過那麼多小學都沒有看過這種球，它似乎不講究球技，只以擊中敵人數目定輸贏，是一種消極的運動。好像在擁擠的地方消滅過多的人，自己才能生存。我心中一直凜然於躲避球的人生觀，悲傷地看著那些孩子在操場的塵土裡四面躲避，以免被擊中出局。我希望普天下的孩子平安穩定地生長，不必為躲避災難而培養矯健的身手。	第 10 節	三,1
42.	台中一中的人才人間蒸發了嗎？	吾台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蓋自改隸以來，百凡草創，街莊之公學，側重語言，風氣既開，人思上達，遂有不避險阻，渡重洋於內地者。夫以彪齡之年。一旦遠離鄉井，棲身於萬里外，微特學資不易，亦復疑慮叢生，有識之士深以為憂，知創立中學之不可緩也。歲壬子，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征，蔡蓮舫諸委員，乃起而力請於當道..... 募捐二十四萬餘元，林家捐地一萬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裡以台灣子弟為主的中學:即使為了維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經多年奮鬥。這樣值得驕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極為尊敬，在那裡執教五年，成為那可敬傳統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榮。台中一中，讓我時時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開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輩創辦東北中山中學，不僅為教育「以髫齡之年，遠離鄉井」的家鄉子弟，並且要在國破家亡之際引導他們，在顛沛流亡路上養護他們。.....台中一中能秉持創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穩定發展，風雨無憂，校友多為台灣社會中堅分子。這樣以憂患精神立校的學校，都有相當自強自信的氣氛。那時日本殖民者離去不到十年，幾乎所有教員都是由大陸歷經戰亂來到台灣，大多數出身名校，教學水平與熱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第 七 章 第 1 節	P345, 二,1
43.	一九六八台灣無省籍問題？	印大那時有大約三百個中國學生，十分之九是台灣去的，香港和東南亞的約佔十分之一，尚沒有一個大陸學生。那一年他們的文革噩夢剛開始，台灣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	第 七 章 第 7 節	P381, 四,1

		單純，互相照顧。		
44.	學歷夢碎 學術啟航	我且回到開花城去參加碩士學位考試通過，只待再修六個法文課的學分即可得碩士學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學位。交換學者簽證到期之時。我仍在猶豫，要不要再申請延長半年。這時，我父親來了一封信。他說，裕昌工作繁重辛勞，你家中亟需你回來。簽交換計劃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諾的話即須遵守。	第七章 第7節	P382, 三, -2
45.	外文系成為第一志願的原因 (缺教授)	外文系最困難的是師資。那時全台灣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數不多，英美文學博士仍是「貴重金屬」，漸漸有少數學成歸國的，到了台北就被台大、師大、政大、淡江、輔仁等校留住了，不願到「外縣市」去。同在台中的東海和靜宜有他們自己的修會師資來源，國立大學有較嚴的資格限制。這個問題就是理想與現實的最大差異之處，我在過去那些年，侈言文學教育的重要時，並未預想到。	第七章 第8節	P384, 二,3
46.	日本時代台灣的英文人才去了哪？	他們指點我，在台中有個美國國務院訓練外交官中文的使館學校 (Embassy school)，好多學員是具有英文系碩士以上學位的人，另外一處是台中水湳的清泉崗空軍基地，那時是越南戰爭期間，借駐的美軍數目很大，有不少醫護和通訊等文職人員，他們的太太有些是美國合格的教員，也許合於我們公立大學兼任的資格。	第七章 第8節	P386, 四,1
47.	愛台灣的枷鎖	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認識了真正的台灣，驗證了高等教育在台灣「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熱情。我們招待國際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員林的玫瑰花園，場主張君的妻子，後來當選為玫瑰皇后。初見那麼大規模的花園和科學化養殖法，聽著他們講新品種的動聽的命名，大規模推廣及外銷的展望……那時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台灣」？	第七章 第8節	P391, 三, -1
48.	台灣文學主流史觀與1978年	初期十年的作者，剛剛遭逢家國巨變渡海來台後喘息未定，作品中充滿了割捨的哀痛與鄉愁，如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褶裙》和《燭》，孟瑤（楊宗珍）《歸途》和《歸雁》，潘人木（潘	第八章 第1節	P404, 三,1

之 前 的 中 華 文 化 自 信 心	佛彬)《哀樂小天地》,彭歌《臘台兒》等,藉小人物的故事寫新舊制度間的衝突、對故鄉與往事的懷念,與毅然接受現實的心情,他們那個時代深入骨髓的憂患意識與後繼者當然不同。稍晚十年,一批少年隨軍來台筆健如劍的青年作家,對他們曾捍衛過的家國河山有一份更為強烈的懷念與熱情,如朱西寧《破曉時分》和《狼》,司馬中原《紅絲鳳》和《山》,段彩華《花彫宴》等,描寫大陸鄉土故事更有一份豪邁、震撼,動人的力量。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施叔青《喬布的末裔》、林懷民《辭鄉》等短篇小說出版於六〇年代初期。為小說創作開啟了另一種風格與境界。他們敏銳地觀察了本省鄉里生活在傳統與工業化衝突之際所產生的急劇變化,塑造出的人物常似剛從輪軸飛轉的機器房裡出來。立刻投入傳統的祭典裡,或者回到古城的窄巷裡,與迂緩的歲月擦身而過。這些戰後出生的青年作家,一面冷靜客觀地批評祖傳的生活形態,一面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鄉土根源的眷戀。他們作品另一個重要特色是使用了一些台灣方言,使寫景和對話更加生動,增加了真實感。 第一套有規模的英譯選集,出版之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轉來十六篇評論文章,幾乎全是肯定的讚譽。最令我們欣慰的是A·R.Crouch的書評(ChinaNotes, Summer, 1976),其中有一段說:「譯文是流暢的好英文。所選的作者都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或許有人認為這是局限一地的缺點(limitation),但這些作者並沒有受到政府壓力而寫作宣傳文章,這是他們的長處。除了兩、三首詩以一九二的國民革命和越戰為題材外,選集中很少有表達政治意識之作,與當前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單調宣傳形成顯著對比,是一種令人愉悅的解脫(a welcome relief)。」對於我們這些非母語的英譯者而言,這篇評論讓我們格外喜悅(special delight)!	
------------------------------------	--	--

大亞之國讀本

49.	改革中國 國文教科 書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	第八章 第2節	P409, 四,1 P414, 二,1
50.	為台灣文 學請命溝 通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第八章 第2節	P420, 二,1
51.	國文課本 20年後回 響	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有一篇報導。標題是「老教科書總複習，網絡正發燒」，許多網友在網絡上回味中學時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他們也記得《木蘭詩》，尤其以白居易《慈烏夜啼》獲得最熱烈的討入而。 還有一篇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孤雁》也選人課本。沙洲上一隻孤雁，為一對對交頸而眠的雁兒守更。蘆叢後火光一閃一閃，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夢中驚醒的雁兒發現無事，以為孤雁故意撒謊，如是兩回。第三次，獵人拿著香炬矗立眼前，孤雁飛到空中，拚命的叫喚，瘋狂的迴旋，但酣睡的雁兒毫不理會。眼睜睜看著獵人伸出殘酷的手，將一隻隻熟睡的雁兒放進了網羅。從此，孤雁多了起來。 二十餘年之後，柯慶明（一篇序文，二十年歲月齊邦媛老師在編譯館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後閱台大研究生入學考試的作文卷，題目是「影響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許多人寫的竟然是《孤雁》，讓他感動莫名。	第八章 第2節	P422, 三,1

52.	批判李登輝陳水扁不厚道	一九六七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一九九〇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第八章 第3節	P431, 二,1
53.	外省文人的心靈總結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曲雲南去香港，來台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	第八章 第3節	P434, 二,1
54.	社會學楊國樞的批判性不見容於當時	我記得《當代社會問題》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要出版時，特別邀請楊國樞先生寫篇總序，楊先生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寫了一萬字的序。序文寫到「現代化」是對過去舊社會的一種挑戰，從清朝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因各種原因積弱到民國，現在我們開始做現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觀念克服積弱的原因，使台灣經濟起飛。因為王天民館長已經離職，換了印刷事務起家的熊先舉館長，也是原來的教科書組主任。新館長看了之後，說楊國樞一直 不是很忠黨愛國 ，覺得這篇序文把中國舊社會說得好像一文不值。我說現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時代。熊館長說，「我不跟你辯論國策，我不能接受，換個人寫。」我說：「他專為這兩本書而寫，我不能退稿。」他說：「我不能接受，反正不	第八章 第4節	P439, 二,1

		能印。」他非常堅持。我知道「現代化叢書」已經做不下去了。		
55.	維多利亞 (理性主義) 時期作為 烏托邦的 紐西蘭	我對這時期博特拉《烏有之鄉》(Sammuel Butler, 1835-1902, Erehwon or Over the Range, 1872)曾做了些研究。書名「Erehwon」實際上是「Nowhere」的反寫，這本書是受緩夫特《格理弗遊記》(Jonathan Swift, 1667-1745, Gulliver's Travels, 1726)後二章啟發所寫的諷刺文學。那個位於渺茫海隅屬於英國殖民地紐西蘭的烏托邦，一切典章制度、語言行為皆是新創，反諷當時被熱烈爭辯的達爾文學說。許多新穎的創見。如對疾病的懲罰、未誕生者的世界、生命與死亡以及何者為始何者為終等等，都是極有趣的探討.....	第九章 第3節	P457, 二, -5
56.	中國=中華 民國=台灣 的三位一 體	「談談台灣」，這看似輕鬆的題目，卻是最複雜的考題。常常和我同組，也是唯一來自南韓的教師高玉南自我介紹時，只要說「我來自韓國」(I am from Korea)，全場都完全瞭解她的身份。那時美國剛剛打完韓戰，全國都是南韓的「盟友」；而我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卻已不在中國大陸。我家來自滿洲，我們現在的政府在台灣，隔著台灣海峽，距上海六百餘里.....。接下來就 不甚好講 了，我必須很自信地說:「我們在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保持中國文化的高水平，追求富足與和平。」那時，這些話並不僅是口號和宣傳，而是 全民的企盼 ，在這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島上，將近一千萬的人口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靠這個想法活著。一九四九年前，檻樓疲乏的「棉被兵」和他們倖存的眷屬，多數仍在臨時搭建的眷村中，懷鄉念舊，同時也盡量教育子女安身立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了，政府已喊盡了反攻的口號。走下心來全力建設台灣。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到九年，大約是老蔣總統下的最後一張，也是最具有永久影響的 手諭 。台灣文壇也漸漸傳出一些清晰的聲音，能幫助我回答外面那些問題，諸如:「台灣是怎樣的地方?人們怎樣活著?心裡在想什麼?將往何處去?」	第十章 第1節	P478, 二,1
57.	指1970年	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霧中奔跑，	第十章	P479,

	代無省籍	找尋屬於自己的園子，最早的年輕作者和讀者並沒有太大的省籍隔閡，大家讀同樣的教科書，一起長大。日治時代的記憶漸漸遠去；大陸的牽掛和失落感也漸漸放下，對「流亡」(exile)一詞也能心平氣和地討論。	第 1 節	四,1
58.	本省作家 僅黃春明 一位	從那年起，我那小小的書房裡漸漸有相當齊全的台灣文學作品。譬如黃春明的《鑼》，扉頁有作者寫給我的話，就和《英國文學史》八世紀第一篇初民史詩《貝爾伍夫》並排而放；司馬中原《荒原》、《黎明列車》與朱西寧《破曉時分》、白先勇《台北人》，這些初版於一九六、七〇年代的小說，隨我自上海帶來雪萊、濟慈全集的珍藏本並列齊觀。……。我往返於兩種文字，樂在其中，有助於我寫評論文章的視野與層次。	第十章 第 1 節	P480, 一,7
59.	自詡比中國還中國	這本會議論文集大約是「台灣文學」定名的開始。我編英譯選集時，不僅台灣的作家大多數認為我們是承襲發揚在大陸因政治而中斷了的「中國現代文學」，世界漢學界二十年間也如此認定。正因為我們是主流的延續，因此可長可久。	第十章 第 2 節	P483, 四,1
60.	從宏觀的角度省思台灣文學？	(.....我以宏觀角度省思「台灣文學」的定位與定名。)......是什麼樣的警醒力量，使這二十多歲的紅衛兵在那樣血腥的浪潮中，游向人性的岸邊，對自己參與的暴行提出控訴？是什麼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真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纍纍，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 夏天的夜晚，走在紐約街頭，真不知人間何世！我清晰地記起自己二十歲的時候，躺在武大女生宿舍閣樓的斗室中，仰望滿天的星斗，在三江匯流的水聲中，為侯姐姐罵我沒有靈魂而流淚，只因為我不願隨她再去讀書會，讀那些俄國階級鬥爭的書，唱那些幼稚的「東方紅，東方出了個毛澤東.....」我記得在樂山狹窄的街上，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一九四七年，我若沒有來到台大看到那兩屋子書而留下來，我的人生會是怎麼個樣子？	第十章 第 3 節	P486, 一,2

61.	外省人的台灣情	我們台灣去的會友，每晚都沿著海邊散步，步道離海只有數尺，浪潮輕拍海岸，海水下還埋著一些百年前的沉船和骨骸吧……海景美得令我歎息，恨不能把這月光打包帶回去！這月亮，一百年前清清楚楚地見證了台灣的割讓。 百年之後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灣的海邊，往北望，應是遼東半島的大連，若由此坐渡輪去，上岸搭火車，數小時後可以到我的故鄉鐵嶺。但是，我只能在此癡立片刻，「悵望千秋一灑淚」，明天一早我們要搭飛機，經香港「回」台灣了。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台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間望著回不去的土地。 雖然彼此認識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但是「他們」和「我們」內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誠如佛斯特《印度之旅》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	第十章 第4節	P490, 一,2
62.	本省作家作品較多了(三本)	我上課的教材以小說為主，有賴和《一桿秤仔》、吳濁流《先生媽》和《亞細亞的孤兒》、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編的選集作品之外，還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譯的作品，包括袁瓊瓊《自己的天空》、蕭楓《我兒漢生》等。按照學校的要求，每週上課時發一張授課大綱。我用英文上課，書名人名必須載明中譯名。	第十章 第5節	P493, 三,1
63.	人道主義的格局	……德國投降時，蘇俄坑殺降卒二十萬，埋在由漢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廣島、長崎毀於原子彈，兩國都認為自己災難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災難的豈不是死了數百萬的猶太人嗎？其實，災難是無法比較的，對每個受苦的人，他的災難都是最大的。	第十章 第5節	P496, 二,2
64.	中國排擠台灣又一例	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	第十章 第6節	P503, 二,1

		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 節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外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瞭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65.	推薦 潘人木遺作	潘人木惜墨如金，《撻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藝創作》月刊社徵文的二獎，雖是「反共小說」，卻以真正的沉痛寫抗戰時期青年的憤怒和熱狂，政治的巨浪在一個女孩人生舉步之際捲走了她，淹沒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學、遠走延安，再歸來已家破人亡。過了三十年再寫《馬蘭的故事》，以精煉的文字寫鄉土風光。人物內心的反響，佔全書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雖不濃烈，全書卻是藝術之作。 她後來繼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哀樂小天地》之後，十年間只創作一、二篇短篇小說，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襪》以及二〇〇六年逝世前兩個月創作的《一關難渡》。堪稱藝術精品。	第十章 第 7 節	P508, 二,2
66.	日本文學對台灣的影響被低估？	台灣文學以中文寫作，以沈光文結束吟詩社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長達三百餘年。中間雖經日本佔據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語，台灣人以日語創作之文學流傳至今，且得到中譯與多方面的研討者，賴和、吳濁流、龍瑛宗、楊逵、呂赫若等，	第十章 第 7 節	P510, 四,1

大亞之國讀本

		都已獲得尊榮定位。		
67.	精準掌握 現代台灣 文學的特色	天生萬物，生存奧秘之美，在三、四十歲這樣年輕作者的筆下，充滿了詩意的關懷，不僅出於熱切的保育觀念，更是目睹所謂文明對生態破壞的無奈。這樣的寫法，也許只有現代台灣才有。台灣地少人多，文學對土地之愛常充滿了感謝與珍惜，而這種溫柔的、悠閒的心情，只有安居歲月才有。我認為近幾十年的山嶽、海洋、生態保育的作品是現代台灣文學的特色。	第十章 第8節	P519, 二,4
68.	體力不行 提早退休	雙親俱逝之後，在層層的失落感中，我掙扎奮鬥，游不出他的淚海，我的血液繼承了他的飄泊之淚。第二年夏天我自台大提前退休——車禍之後重回講壇，保持自己教書風格，連續兩小時站立已感辛苦，下課提著書本和試卷等等資料，由文學院走到大門口，寒冷或炎熱，站在新生南路口攔不到出租車時，已無法走回家去。這是我該坐下來，想和寫的時候了。	第11章 第3節	P550, 二,1
69.	同為殖民地 的東北 及台灣	當日在紀念會發言的尚有高玉樹先生，談他一九五〇年代參加籌組「中國民主黨」（當時一般人稱為「新黨」或「黨外」）的往事。梁肅戎、康寧祥、杜正勝、劉紹唐、郭冠英等人出席談話，認為當年組新黨如成，今日台灣政治對立或可避免，不致如此突兀生澀。胡佛、張玉法先生更由歷史看台灣與東北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影響，兩地民間對自己命運的挫折感與希望。	第11章 第4節	P557, 二,1

參考書目：2009，齊邦媛著，《巨流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十一、光棍村：中國農村「剩男」的哀歌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535521

小莊是我一個來自安徽阜陽的農村朋友，年前他跟我說想逃離春節。原因是他經濟條件較差，雖在廣州打工，但自己現在存款不到 10 萬人民幣，還沒能在自己農村老家周邊的城裡買房。他的大哥家庭經濟條件較好，已經結了婚，不僅在老家周邊買了房，去年又在老家又建了樓房。相互比較下，他感覺壓力頗大，因為沒能買房就很難結婚，沒能結婚，春節在老家就會被疲勞轟炸。

他的談話反映出身為「剩男」的苦衷，稱呼「剩男」更為通俗的話就是「光棍」。光棍問題已經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光棍多半發生在農村，有些農村甚至被稱為「光棍村」。據香港《新報》網站 2015 年 6 月 26 日報導，廣西東蘭縣有個貧困村莊台中屯，是典型的「光棍村」，村莊只有一個姑娘嫁給同村人，別的全嫁到外地，嫁入這村的女子卻一個也沒有。按當地習俗，年滿 22 歲男子就應該結婚，而 22 歲後未婚男子共有 87 人，占成年男子三分之一。類似這樣的狀況在中國中西部農村與來愈普遍。「光棍」之所以成為農村的一個現象，與中國內部的政策、禮俗的變遷和全球化有著高度的關聯。

計畫生育下男女比例的失衡

計畫生育做為中國政府控制人口的手段，卻在中國人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下造成對女嬰墮胎的後果，形成男多於女的人口結構。在正常的情況下，每出生 100 個女嬰，應該相應有 103 至 107 個男嬰。過去 20 年來，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高於 115，成為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國家。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2014 年末，1980 後出生的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 136:100，1970 後出生的非婚人口男女比則高達 206:100，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而當女性稀缺與男性過多，光棍問題便產生。專家擔憂，到 2020 年，預估全中國 20 歲至 45 歲的男性將比女性多出 3000 萬人左右，光棍危機將全面爆發。

由於男女比例失衡，也促使女方在婚嫁上對男方的要求愈來愈嚴苛。小莊跟我提到他們村裡的狀況。在他們農村，過去女孩子嫁到大家族是有面子的事，但今年相親的形勢很不同，只要女孩一聽到對方家裡有 2 個兒子，更別說 3 個兒子，連見都不見。女方現在要的是獨子、有錢、父母年輕健在，因為若是獨子和父母年輕健在的話，父母還能勞動，賺得錢都歸獨子，還能幫忙帶孩子。可見男性過多女性過少的結構愈來愈讓女方予取予求。

流動性下生成的光棍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雷根和柴契爾夫人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間段相似，當中國搭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列車，內部便透過跨區的地理流動性，來促成豐沛的人力進入城市進行資本積累，為此，計畫經濟時期地理僵固性的城鄉二元結構因而被打破。

當農民可自由流動進入城市工作，流動的民工中可是男女大不同。整體而言，女性在流動中融入城市的機率遠大於男性，因為女孩子一旦到了城市，她們大多想留在城市，畢竟城市比農村有著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她們因而緩解了較發達地區男性過多的婚姻擠壓問題。20 世紀末，用傳統的方式嫁到鄉間的女子越來越少，農村女孩不是嫁到城市，就是嫁到離農村較近的城郊，有的甚至出現寧可當坐檯小姐也不願回到農村嫁人。這樣的狀況讓原本已稀缺的農村女性在農村中更為稀缺。

相對的，對於無法透過教育進到城市中的農村男性，在城裡就比較難找到工作，或者大多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且低收入的工作。他們常處於一個尷尬的狀態，那就是不管是出去還是留下，他們都將面臨婚姻的窘境。他們留在城市，只能面對當地已經處於婚姻擠壓嚴重的婚姻市場，還要受非城市戶口的歧視，許多農村男人在大城市相親，對方總會問從哪來，非本地戶口的農村男人常遭拒絕，因此多半成為光棍。也因為這樣，很多男人最終只能回到農村，然而一回到老家，面臨光棍的命運又難以避免。

變相的禮俗

除了結構性的國家政策與全球化的宏觀影響外，農村當地習俗的轉變也促成光棍增多。就婚禮中男方給女方的彩禮而言，它原先只是男方表達對女方的謝忱之意，也僅是一種禮節性的表達，並無買賣性質，其數額也可以隨男方家庭經濟狀況的高低而決定。然而，改革開放後彩禮性質卻完全變調。當「一家有女百家求」，婚姻的買賣性質浮出檯面，女方父母對男方的彩禮漫天要價，變相的婚姻牟利就此助長。

2015 年，中國央視以《隴東婚事》為題，報導了甘肅慶陽高價彩禮的狀況。節目提到，有的彩禮高達 15 萬元人民幣。這對當地農民年收入僅約 5 千元人民幣來說無異是天文數字。然而，婚姻大事在農村的熟人社會中，彩禮這一關是一定要過的，在送彩禮上太過吝嗇或者送不起彩禮，一般會被認為是家裡太窮或父母太過小氣，而被暗地裡議論。

然而，一樁婚事要辦完，不是只有彩禮這項開銷，女方家庭還有許多要求。年後，小莊跟我聊到，過年期間他們村裡的家長們聊天聊最多的，就是關於結婚所耗費的驚人費用。兩三年前他的表弟結婚，彩禮約為 10 萬到 12 萬人民幣，今年已經漲到 15 萬到 16 萬。甚至有一戶高達 20 萬。不僅彩禮鉅額的開支，有些女方還要求「三金」（金項鍊、金耳環、金戒指），今年又變成了「四金」（增加的是金鐲子）。不僅如此，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也要齊全。這些開銷最少十五、六萬，多的得

二十一、二萬。但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沒房子，在農村要娶老婆連想都別想。房子已成了女方家庭安全感的表徵，這也是丈母娘考驗女婿極重要的一關。有些農村的光棍身體精神都好，既健康又勤勞，但卻沒有女子願嫁，主要原因就是家庭貧困，在鄉里、縣城沒房子。但買房對這些貧困家庭來說根本是無法承受之重。

農村父母的負擔

在農村，為了完成孩子的婚禮，車子房子以及高額的彩禮時常都由父母負擔。因為農村是傳統的熟人社會，在那樣的社會中，面子非常重要。評價一個家庭能否體面地生活下去，通常會看父母能否圓滿地完成孩子的婚姻大事。

許多父母以貸款來籌措兒子高昂的娶妻費用。有兒的父母在支付完這筆費用後，成了「孩奴」。若有兩個兒子以上的家庭，父母負擔更大。常發生長男娶得了妻，但老二、老三無法娶妻的窘境。

也因為面子在農村這樣的熟人網絡中格外重要，攀比便成了常態，婚禮比的是排場、房車的大小。攀比成風的「面子經濟」當然就推高了結婚費用。這也讓有兒的父母負擔愈來愈大。

又因為高額彩禮所造成傳統禮俗的變質，更助長了「人情經濟」的理性盤算。有句話說，「三年不過事，變成窮光蛋」。意思是說，一個家庭如果三年還不辦一場酒，就會虧得一塌糊塗。為了平衡已支出的人情費用，農民會想盡名目辦活動，像是孩子考上大學、孩子過 7 歲生日、城裡新居落成、老人去世等。透過這些活動，設法回收支出於他人的人情費用。

婚姻詐騙橫行

不僅如此，男女比例的失衡也提供詐騙集團操作的空間。2010 年《中國的性別比失衡與公共安全：百村調查及主要發現》這篇文章提到，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激發了騙婚、買賣婦女等犯罪行為。接受調查的 364 個村莊中，有約 30% 曾發生過騙婚。騙婚不僅有外地新娘，還牽涉到外國的新娘，著名的事件發生在 2014 年 11 月，河北邯鄲數十名越南新娘與背後的詐騙組織在收下農民的彩禮後不久集體逃跑。光棍們自此人財兩空，債臺高築。警方偵查後證實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跨國騙婚案。

傷害不僅於此，騙婚案件增多又加深了農村本地人對外地人的芥蒂。當外地媳婦跑婚機率高，這又會加劇本地男性在婚姻市場中對本地女性的競爭，本地女性在婚姻市場的要價也越來越高。

農村光棍：經濟、社會和全球化發展下的受害者

光棍現象反映出中國本土脈絡（計畫生育政策、重男輕女觀念、傳統熟人社會的人情牽絆、面子經濟、人情經濟）遇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流動性、城鄉差距拉大、消費物慾提高）後所折射出的

社會現象。計畫生育所種下的惡因，讓市場化與商品化助長經濟理性計算，潛入了面子與人情經濟的運作，讓重視人情的農村傳統熟人社會，比起以契約運作的陌生人都市社會還要功利。對女方家而言，高額的結婚清單反映出農人窮怕了，總要在既定的人情禮俗中製造新的彌合機制，透過婚事大撈一筆回來，以消弭被剝奪或過度貧窮所產生的不安全感。這些行為的出現，與其說是農村道德的墮落，倒不如將之視為是農民活在熟人社會既無法擺脫傳統禮俗，但卻又害怕失去傳統地理穩固性下的安全感所表現出的行為，或許更為貼切。

此外，全球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穩固性，資本過度集中於城市的發展而磁吸了農村人口與人才，造成農村邊陲化、空洞化與貧困化。雖然近來出現些微「逆城市化」的回鄉發展現象，有些地方政府也開始積極建設農村，但畢竟不是主流，農村的邊陲化依舊是不爭的事實。跨區流動的頻繁讓全國性的婚姻市場逐漸形成，同時全國性的階層分化也進而浮現出來。面對著階層分化和社會地位競爭的壓力，農民一方面既憧憬著城市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害怕失去安全感而呈現出焦躁。為此，婚姻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對於農村女性而言，婚姻由目的變成了實現階層競爭和向上社會流動的手段，但這卻讓婚姻資源向男性的經濟強者集中，相對的，經濟條件的弱者便快速地成為光棍大軍。

為此，農村剩男是計畫生育與人情經濟的受害者，也是中國區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犧牲者。他們的經歷無法呈現全球化與中國社會、經濟光鮮亮麗的一面，反倒呈現出另一幅悲傷的圖像。他們鳴唱著邊陲者的哀歌，也道出經濟、社會和全球化的無情。

十二、端專訪：如何打敗 ISI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20-international-howtodefbeatISIS/>

作者：周軼君、楊靜

人人都在談論「為什麼是巴黎？」、「伊斯蘭的本質是否邪惡？」、「下一個被襲擊的城市會是哪裏？」一個更為直接的問題卻少有人說出來，更少人能夠回答：「如何打敗伊斯蘭國（ISIS）？」

研究伊斯蘭宗教史的紐約學者、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執教的傅健士（James Frankel）博士，願意回答這個問題。雖然他打趣說，如果自己馬上能開出一個打敗 ISIS 的方案，「就發家致富了」，但他從歷史、宗教的敘述中，指出了伊斯蘭國的致命弱點。

ISIS 領袖巴格達迪自稱哈里發，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正統繼承者，正一步步實現《可蘭經》關於「末日之戰」的預言。由此推理，一旦 ISIS 不能用教義圓滿闡釋自己的行為，或是無法兌現對信徒許下的承諾，那麼就很容易失去支持。擊潰 ISIS 的關鍵，是理解它背後的一整套意識形態，理解它對信徒的宣傳方式。既要攻城掠地，軍事打擊 ISIS，也要戳破它對教義的曲解，奪回被 ISIS 佔領的心靈。

中斷《末日之戰》的演繹

Dabiq 是 ISIS 的電子雜誌，排版複雜精美，傳播廣泛。事實上，Dabiq 是敘利亞一座城市的名字。它在《聖訓》（先知穆罕默德言行錄）的預言裏出現過：那些活得夠長的穆斯林會看到，末日審判到來之前，會有一場鬥爭。屆時，有穆斯林與非信徒結為密友，背叛自己的宗教，但真正的信仰者會組成軍隊，奪回聖城麥地那，並在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邊境城市 Dabiq 迎戰羅馬軍隊（注：這裏「羅馬」或許指意大利羅馬，也可能指「拜占庭」，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舊稱）。贏得 Dabiq 之戰後，勝利的穆斯林將一路攻入土耳其，擊敗「偽救世主」。然後，世界將由轉化為穆斯林的救世主耶穌領導，享受和平與公正。

所以，ISIS 攻下 Dabiq，對它的信眾來說，末日之戰已經上演，ISIS 就是那支「真正信徒」組成的軍隊。Dabiq 之外，ISIS 佔領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大幅疆域，這兩地正是伊斯蘭文明鼎盛時期的中心。和基地組織、尼日利亞「博科聖地」等原教旨勢力不同，ISIS 控制了伊斯蘭世界核心區域的勢力，面積和整個英國差不多大。這使得它在信眾眼中格外有吸引力。

傅健士認為，對於宗教教義的闡釋很多時候取決於闡釋者的理解和目的，甚至可以說，人們總能從教義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張的教條。但是，對教義的遵從，恰恰是 ISIS 的立足之本。如果有選擇地攻打他們佔下的、具有宗教意義的城市，把預言裏的歷史名城從 ISIS 手上奪回來，就是沿用 ISIS

的方式戳破 ISIS 對於教義的壟斷演繹。拿回這些城市，除了可以讓 ISIS 演繹末日之戰的企圖破滅，也可以打破 ISIS 的成功形象。畢竟，不少被它吸引的人，是希望在末日戰爭到來前，站在勝利者一邊。

儘管目前各國還未就是否出動地面部隊、由誰出動等等達成一致，傅健士強調，軍事打擊和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爭奪，必須雙管齊下。也就是說，軍事行動外，必須在穆斯林中，進行反 ISIS 的宗教宣傳。

不過，他遺憾地指出，歐美國家政府意識不到宗教、歷史敘述的重要性，只是簡單地將 ISIS 貶低為「野蠻人」、「邪惡的力量」，那樣做無法讓跟隨 ISIS、同情 ISIS 的人意識到問題的本質：ISIS 並非正統繼承者。

巴黎恐襲違背教義

巴黎恐襲之後，有 ISIS 支持者在網上歡呼：「這是神蹟！」然而，根據傅健士的說法，在《可蘭經》中你找不到任何支持殺害平民的教義，巴黎，這座城市，也沒有出現在與末日之戰相關的預言中。

相反，這場恐怖襲擊，處處違背教義。例如，《可蘭經》禁止殺害平民，哪怕是異教徒的平民。而諸多 ISIS 襲擊受害者中，有婦孺，甚至有穆斯林。這些都是教義不容許的。

另外，伊斯蘭教教義從未鼓勵過自殺，更不用說自殺式襲擊。法國總理剛剛宣布，有情報顯示，ISIS 可能動用生化武器，但伊斯蘭教教義實際上禁止「投毒」等非常手段。

ISIS 在巴黎得手了，但同時也暴露了它的弱點：它並不像自己標榜地那樣遵從真正的伊斯蘭教教義。

拒絕吸收難民對 ISIS 有利？

傅健士認為，ISIS 策劃巴黎恐襲的目的，首先是恐嚇西方，但同時，它也想截停那些湧向西方的難民。

襲擊過後，美國和歐洲不少國家出現聲音，拒絕繼續接收敘利亞難民，這正中 ISIS 下懷。要知道，數以百萬難民逃離 ISIS 統治區域，去歐洲求生存——這原本對 ISIS 來說，是非常恥辱、尷尬的事情。如果在 ISIS 統治的領域，生活真如宣傳得那麼美好，穆斯林應該大量從歐美國家移出，接受哈里發的保護才是。

如今，當西方對難民關上大門，指責難民是恐怖襲擊的元兇，ISIS 可以重複它的宣傳話語：看哪，非信徒痛恨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他們才不管穆斯林的死活，只有加入我們才是出路。

ISIS 的自然死亡？

除了從宗教教義的角度，打擊伊斯蘭國的自我宣傳，傅健士認為，ISIS 遲早會令支持者幻滅。

儘管外界對它內部的日常管理所知甚少，但可以想見，目前的領導者未必具有行政管理經驗和資源。「只見到關於嚴苛酷刑的報道，如違背教義要剁手等，但真正的哈里發國，要主持公平正義，要保證人民生活富庶，這些目前都看不到，」傅健士說，外界對伊斯蘭國的打擊與孤立，將逐漸令追隨者失望，「當然，我們不能坐等伊斯蘭國自然死亡，但在實施軍事打擊的同時，需要保持耐心。」

獵殺伊斯蘭國頭領並無幫助

目前美國及盟軍空襲的對象，往往是伊斯蘭國頭目。打擊這個組織的領導層，當然是一種必要策略，但在傅健士看來，直接打死伊斯蘭國所謂「哈里發」巴格達迪——就像當年擊斃本·拉登一樣——未必能從根本上消滅恐怖威脅。

「就像神話中的惡龍，你砍掉一個腦袋，它會再生出十個來。殺掉本·拉登，伊斯蘭國冒出來，打敗伊斯蘭國，還會有其他新的恐怖組織誕生。」

他反覆強調，伊斯蘭國並非「近年新生事物」，它的歷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要放在「薩拉菲運動」的脈絡裏解讀。唯其如此，在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

「薩拉菲主義」是遜尼派穆斯林運動，主張回到源頭，嚴格遵從先知的主張，追求純正的伊斯蘭生活，顧也稱為「原教旨主義」。

伊斯蘭文明曾經擁有輝煌歷史，但到了 13 世紀，蒙古入侵、攻破巴格達後，漸漸衰落。歷史上第一個薩拉菲主義者，是 13 世紀侵略戰爭倖存者伊本·泰米葉。他認為穆斯林落敗就是因為伊斯蘭信仰在墮落，應該回到早期純潔的生活方式。與伊本·泰米葉主張一脈相承的，是瓦哈比派、穆斯林兄弟會、本·拉登，現在輪到伊斯蘭國。薩拉菲主義者相信，只有恢復早期穆斯林生活，才能重振伊斯蘭文明的榮光。

這正是 ISIS 吸引西方年輕穆斯林之處。這些人在現實生活中，常常覺得受到排擠，無法融入當地主流社會。他們希望獻身「有價值的事業」。而巴勒斯坦哈馬斯抵抗組織，不過是一個地區性勢力。「基地」更像一個跨國集團，商業軍隊，不斷需要金主募捐。只有 ISIS，是唯一能把「伊斯蘭」和「國家」擺在自己的名字裏，而且擁有石油和領地，「不要低估這樣的品牌效應，」傅健士說。

ISIS 對於歐洲穆斯林，可能比對美國的穆斯林更有吸引力，因為前者的社會融入程度更低。法國穆斯林大多來自北非，住在巴黎或其他大城市的市郊，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也低，還面對着很高的失業率。傅健士分析，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是民族國家，民族意識比較強。而美國和加拿大是移民國家，

那裏的穆斯林不乏中產階級，社會地位較高。

由此可見，也許有一天，ISIS 這個組織真的被剿滅了，但是持有同樣意識形態的勢力會崛起。年輕人會繼續加入那股勢力，除非全球各國為這些年輕人展示另一種可能，讓他們有歸屬感。無論在美國、法國，還是在中國、俄羅斯，只要穆斯林覺得自己是被關心、被照顧的，那麼他會慢慢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個國家的。這才是根除恐怖主義的辦法。

延伸閱讀

傅健士認為，目前市面上以「伊斯蘭國」為名的書籍，大多是匆匆新作，真正理解 ISIS，還是要從理解薩拉菲運動入手。於是，他推薦了以下三本相關書籍：

1. Richard C Martin; Abbas Barzegar, 2010, Islamism: Conteste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Islam 《伊斯蘭主義：關於政治伊斯蘭的對立觀點》,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當我們在公共領域談論伊斯蘭時，我們在談論什麼——這本書可算是由一場十四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學者參加的辯論，寫作者就「伊斯蘭」、「伊斯蘭主義」等詞彙在公共討論中的內涵和外延作出各自的解釋。

2. Roel Meijer, 2013,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全球薩拉菲主義：伊斯蘭的新宗教運動》,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書邀請多位歐洲學者從宏觀和圍觀層面深入探討全球薩拉菲主義，力圖為讀者呈現這支當代伊斯蘭流派在具體社會文化情境之內的狀態。

3. Henri Lauzière, 2015, The Making of Salafism :Islamic Refor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薩拉菲主義的形成：20 世界伊斯蘭改革》,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本書將薩拉菲主義置於去殖民主義歷史進程之中，展示在整個 20 世紀中，薩拉菲主義如何被定義、利用、質疑，又如何被用來分析他者和定義自己。

十三、【中國|評論】浙江小城見聞錄

<http://www.davidwin.net/?p=21732>

作者：葉志輝

父親的老家在浙江的玉環縣，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鄉下城鎮，我曾在 2008 年回去過一趟，很快的時隔七年，再一次陪同老父親回家探親，這一次也讓我見識了許多不可思議的現象。

大家都知道像是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這類一級城市，城市的建設早已屬於世界級，物價也直逼世界排名前列，而我返鄉的玉環只能算是四級城市，連火車站都沒有，必須開車 55 公里到溫嶺的火車站，真的可以說是非常鄉下的地方。然而，呈現在我眼前的畫面卻深深的讓我感到不可置信。

首先，滿大街的名貴汽車，雙 B 轎車到處是，就連在路邊的海鮮餐廳吃飯，門口停的都是 BMW 與 Jeep，大飯店門口還有藍寶基尼與瑪莎拉蒂，天啊！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四級城市』？七年前的玉環只有一間玉環大酒店算是星級酒店，現在國際連鎖的喜來登（Sheraton）酒店都在此建起了豪華的五星級設施！

我好奇的問：就咱們這小鄉鎮，開這麼高級的五星級酒店，有人來嗎？

『生意可好著呢！玉環人的民風不同，本地住客反而佔大宗！我們喜歡包個房間，大家來聚聚、打打牌、聊聊天什麼的。』中國市場果然神奇，不同的地方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消費習性，只有真正能夠『接地氣』的人才能做好中國市場！

由於經濟的發展，各種類型的工廠林立，也有許多外籍人士來到這個小城市，不論是設廠還是擔任顧問，這個小小的城市透過工業與世界接軌，也讓人民的生活水準年年高昇。浙江人擅長做生意是有名的，知名的浙商名聞遐邇，從大小通吃炒房高手的溫州人、包山包海小商品的義烏人，到創立阿里巴巴橫掃全球的馬雲，浙江雖然有這麼多小的縣級城市，在過去一份中國 Top100 財富城市排行榜中，浙江的城市竟佔了 20 多個！

其次，小小玉環下還有不同的語言！大部分區域講得是太平話，一種類似吳越軟語的地方話，而坎門區域說的卻是閩南話。不論如何，在這裡生活，說普通話反而是最不方便的，所幸從小聽父母親對話，所以太平話沒問題，台灣長大的背景，閩南話也能輕鬆應對。

再來，玉環人的好面子與好客也是出了名的，親朋好友每天都要請客，不讓請還會生氣，覺得沒面子，而每一餐都是大魚大肉，真令人吃不消。飯席間每個人都能從口袋掏出『中華煙』（一包要 80 人民幣的昂貴煙），然後不斷的請煙，飯都沒吃完，我的桌邊已經堆了快 10 隻煙，真要入境隨俗的話只怕早就肺氣腫了吧？

但是物質上的富裕還沒有帶來相對的素質提昇，在玉環的這幾天裡，我見識到了依舊不可思議的交通狀況，明明是你的車道卻永遠有車輛逆向而來，不停歇的喇叭聲讓人心情浮躁，三不五時任意穿越的行人與機動車簡直比電玩還刺激！但也正是親身體驗過四級城市與一級城市的對比，才能更進一步的認識這個國家在各方面的落差。

中國很大，許多的機會未必僅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裡，這趟的浙江小城市之旅，讓我感受到了在不同的角落城市中，只要有心都能發展出不同的面貌，當然，前提還是你必須能放下身段，真正的去認識與融入。

十四、書評：君子之道與台灣人

作者：王竣霆

這是我第一次讀余秋雨，很慶幸是在此時。如果早個十年，我一定會被洗腦；若只早五年，我一定會看不下去。關鍵在於台灣人的自信，有它，讓我理解東亞台灣的獨特性，過去殖民地經驗所帶來的文化翻譯能力，深刻體認余秋雨所謂「中國人」的侷限性。所以就在此時，一切是如此剛好。

余秋雨是中國人，也是個文化中國論者，他的文化觀至今仍信奉者眾，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文化定義敵我，以文化救國、治國、興國、建國的理路，受到台灣部分文化界人士的推崇。他愛惜羽毛，憂讒畏譏，視野宏大，立論確實高遠，卻還是毀譽參半。此時他出版《君子之道》一書，抒懷胸臆，也聊表對中華文化的一份心意。

面對文化中國、大中華、大中國的呼喚，彷彿刀鋒上之行走，中道細如髮絲，一失足便血流成河，不能不察。余先生指陳中華文明最深的缺陷，在「名譽分配」之不公，使得中國成為流言社會，言論自由與法治精神從不存在。所以「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仗義執言是重要的。

然而，余先生身體力行的結果，卻令人納悶。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時專文呼籲災民，切莫上訪興訟，切莫受反華媒體之扇動，要「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所謂動人的氣氛，在今天看來，早已模模糊糊，使人忘卻。流言社會卻還是流言社會，九年之間，幾乎什麼都沒有改變。

余先生在《君子之道》論述：「寧肯容忍社會上存在一些流氓、貪官和竊賊，也絕不容忍全民性的告密、誣陷、造謠和起鬨。」此言不差。特別，在他深受「大批判」攻擊的當下，對中國社會的未來，仍念茲在茲，確實表裡如一，堅守文化興國的立場。子曰：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

余先生進一步詮釋「矜」在北京話裡是「派頭」、「腔調」、「范兒」的意思，意味著君子不能顯得窩囊、潦倒，像孔乙己，要講格調。君子必須乘載中國的文化責任，目的是為靈魂尋找故鄉。

在地理學的傳統中，故鄉是一個地方化的概念，所謂地方，是認識世界和抵抗霸權的基礎。全球化的當代，已經很少有完全封閉的地方，不論中國或台灣，都牽連在更大的社會關係裡，無法單靠懷舊和內部經濟獨活。

然而，閱讀余秋雨最大的危險，便是忘記自己的故鄉在台灣。中國是余秋雨的魔神仔，神主牌，它無所不能的召喚了全世界使用漢字的人。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澳門，甚至是果敢、新加坡、馬華、印華的各城市。只要你會讀漢字，只要你略知儒家經典，只要你會講一點，甚至只要聽得懂普通話，你都應該可以是中國人。這就是帝國主義，以文化教化之名，行殖民掠奪之實，還抱怨這是

黃種人的負擔。

這種格調文化，在北京處處可見，假古蹟、面子工程、共創文明社會的標語甚囂塵上，身為台灣人的我實在無法接受。

台灣話說一個人有點「矜」，意味著他雖然謹守社會規範，自我約束，素行良好，卻少了一點人性，過於注重名相，放不開，不近人情。孔子的「矜」，在台灣，涵義就算不全是貶，也絕對不會是褒。

孔子兩千五百年前講過的話，究竟有多少中國人身體力行？身為台灣人的我們，該如何更恰當地翻譯孔老先生的智慧？余先生所展示的君子之道、生命情懷，在佛教經典裡的修行之路，確實令我動容、佩服。但台灣不是流言社會，君子之道不是四海皆準，時光荏苒，中國文化始終是一顆擦邊球，時不時地盜壘這後殖民的台灣。